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高 原 朴永子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长沙市德和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期刊登记证第125号

*

198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550×1108 1/32 字数: 173千字 印张: 7.2

印数: 1—5000 定价: 1.25元

242511/13

编辑说明

一、我省文史工作近年有较大发展，各地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已达数十种之多，其中不乏优秀篇什，弥足珍贵。但由于这些选辑大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作用的发挥，所以，将一批质量较高的史料选编成辑，公开出版发行，就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二、本辑荟萃了二十八篇文章，均系“三亲”史料，分军政、工商经济、文化、宗教、人物等五个部分，并在文尾注明了出处。

三、限于篇幅，本辑不可能将所有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一一选入，所刊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篇目，并不全面。

四、选编者对部分文章的标题（包括小标题）作了适当的改动和调整，在文字上对所有文章也进行了必要的修饰或删削，并订正了部分史实错误。

五、本辑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各地政协文史机构的支持与协助，在此特致谢忱。

目 录

军 政 史 料

- 湘潭镇压劣绅晏容秋始末 龚业光 (1)
- 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记略 陆承裕 (4)
- 对日俘的处理—对汉奸的惩办—沦陷区游击队和别动
军的结局—王耀武在接收日军物资中的贪污情况
- 衡阳抗战纪念城定名的由来 罗铁怒 (10)
- 我在邵阳当县长 徐君虎 (14)
- 除旧布新—拒绝党团干政—遣散饥民回乡生产—恢复
县城秩序—整顿发展教育事业—选贤任能—剿抚兼施
消除匪患—永和金号参案—严禁赌博—逮捕陈光中—
炮兵学校特务营贩烟案—惩罚地主田顺生—横行乡里
的李老太爷—国大代表选举纠纷—反对内战—拒不征
兵建碉堡—上瑶山—平冤案—邵阳乡村工业示范组—
我亲自处决的案犯—惩罚一批嫖客—告别邵阳
- 参加组建江南地下第四军的回忆 言乃克 (32)
- 回忆湘西事变的前前后后 彭煊容 (49)
- 事变序幕—姑息养奸—血酒结盟—“三·二”浩劫—
风波未平—接受招抚—绥靖会议—酝酿应变—沅陵受
训
- 一九四九年冬黄杰入越纪实 老 兵 (62)

工商经济史料

- 八十年瓷业生涯自述 荣庆祥 (71)

- 涉足瓷业—初见成效—探索长石质釉—改进“紫金釉”—研制工业瓷—精心授徒—老当益壮—寄语同行
- 城陵矶海关忆述 董舜卿 (87)
- 华晶玻璃厂的经历与变迁 易正文 (89)
- 由学徒到老板—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战争造成的不幸及其后—企业走上了新生之路
- 外商在岳阳的经营概况 钟敏政 (97)
- 外商在岳阳销售煤油业务情况—外商在岳阳销售车糖业务情况—英商英美烟公司在岳阳经营情况
- 我是怎样经营雄磺发财的 陈少泉 (106)

文化史料

- 回忆《正中日报》在衡阳时的往事 叶 浓 (110)
- 《正中日报》的创办和组织机构—访问白崇禧和蒋廷黻—田汉同志的教诲—与黑暗进行斗争
- 一个女艺人的遭遇 尚星云 (116)
- 两次拜师学戏—艺无止境—与田汉的接触—落入大恶霸柳森严的魔掌—新生
- 我与巫家拳 黄振祥 (127)
- 拜马道人为师—巫家拳的历史和特点—拜师学戏—继续习拳—用巫家拳惩罚恶老恶少—逃脱了贺屠夫的魔掌—解放后的几段经历

宗教史料

- 我的出家 刘绍宗 (138)
- 出家的原因—自在庵的形式—寺院的人事系统—寺院的生活及制度—寺院的节日和盛会—自长沙回湘潭—

湘潭沦陷时期——和天主教的矛盾——解放后的生活

人 物 史 料

- 忆父亲白石老人的几件事 齐良末 (150)
- 教育家瞿方书生平 瞿国倩 (154)
- 府试名列前茅——从事民主革命——致力于教育事业——严
 于教子
- 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传略 周祖谟 余淑宜 (159)
- 回忆马宗霍先生 马积高 (166)
- “读书略识字”——戒“陋”——强调读和写的基本功——
 严中有宽
- 我所知道的美籍华人姜逸樵博士 袁政德 (172)
- 回忆画家张一尊 吴佩君 (177)
- 忆张平子先生二三事 田翠竹 (184)
- 我与谢冰莹 谢荆霄 (189)
- “湘西三杰”之一周朝武轶事 徐君虎 (195)
- 我所知道的陈渠珍 孙锡华 (200)
- “保境息民”效法阎锡山——扩充军队——交出军权——在
 抗战中建设湘西——结束语
- 伯父龚浩事略 龚应红 (210)
- 回忆父亲刘岳厚 刘笃平 (214)
- 与何键分道扬镳——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创办
 《开明日报》——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湘潭镇压劣绅晏容秋始末

龚业光

一九五六年九月，全国政协致函湘潭市政协，因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湘潭杀了劣绅晏容秋”，询问有关晏的罪恶历史。为此湘潭市政协邀请部分知情人进行了两次座谈。现根据记录，并参看有关材料整理出以下内容。

晏容秋出生于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其父晏汉生曾在湘潭城内开设晏立成钱庄，兼营粮食业，并勾结县衙门的胥吏承包田赋。清代征收田赋，完全由胥吏和劣绅豪强操纵，鱼肉人民，弊害极深。特别是所谓“劫粮”，即派差进乡，借口催收未完纳的田赋，或尚拖欠的尾数。每当差役进门，农民就得称肉、打酒、杀鸡……仿佛是一场横祸。常有比应缴田赋数额增缴数十倍仍不能了结的事。其实此项所谓欠缴田赋，已由承包商代缴，取得赋券，等到限期一过，再勾结胥吏，遣差役横征暴敛。这种苛政，一直延续到土改时，才得废除。晏家就是凭这种手段致富的。晏容秋继承了这种封建剥削的传统，比起父辈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国初年，晏立成钱庄歇业，晏容秋以律师的名义活动于社交场所。他勾结官吏，颠倒是非，欺害善良的老百姓，并在各

* 龚业光建国前曾任湘潭县政府主任秘书，现年八十六岁，为民革湖南省委顾问。本文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根据部分当事人的座谈回忆整理的。

项公共事务中，极力扩展其个人势力。他当上了县国防局长，并管理县劝学所和文庙的教育经费，以及育婴堂、普不忍堂的慈善事业经费。一九二三年，杨昭植和彭公达在湘潭设立湖湘学校和平民夜校时，晏容秋就在经费问题上多方刁难。一九二五年六月间，革命浪潮已波及湘潭，杨昭植等策动泥木、人力车、理发、染织等业工人筹组总工会，晏容秋唆使商人反对，又勾结县政府出面干涉，致使总工会未能及时成立。一九二六年七月，晏容秋与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向寅亮等组成湘潭县农会预备会，企图阻扰正在酝酿中的县农会的成立。由于各乡农民不予响应，阴谋未能得逞。

晏容秋利用国防局长的身份勾结土匪，坐地分赃。他有个亲戚住在乡下，被土匪抢劫，特来县城找这位国防局长帮助破案，并住在晏家。晚上，这位亲戚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他看到一大批人给晏家送来了不少东西。次晨，他走去一看，原来这些“礼物”中，有许多竟是他家中被劫去的财物。他目瞪口呆，不敢声言，一直到晏容秋被镇压后才说出此事。

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湘潭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一九二六年秋，湘潭锡箔业工人成立了锡箔业工会。在县总工会的领导下，他们向湘潭县政府控诉晏容秋残酷迫害工人的罪行。晏容秋于一九二四年雇用江西工人私设锡箔工场。因亏损，强迫解雇工人，却不肯按照雇用合同规定期限发足工资，引起纠纷。晏容秋又勾结官府，派差押送工人回籍。工人遭受冤屈，沿途备受虐待，多有死亡者。根据省工农代表大会提交省政府公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判处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的规定，迫使县政府将晏容秋关押。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湘潭县总工会和农会，在湘潭县城内学坪，召开公审晏容秋大会。各工会、农会代表，扛着红旗、梭标、马刀，拥到会场，四通八达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先

由部分工农纠察队到县署迫使县长田镇南将在押的晏容秋交出，并到会场主持公审大会。当晏容秋被押出县署时，署前空坪中已聚合群众数千人，并搬来方桌三张，架叠起来，将晏容秋跪在上面，高呼“枪毙晏容秋！”最后纠察队力排众怒，将晏容秋押至学坪会场。

大会由田镇南主持。首先由锡箔工会委员长张吉生上台控诉晏容秋欺压迫害工人的罪恶事实。接着，许多工人愤怒揭发晏容秋的罪行。当时“打倒土豪劣绅！”“正绅站出来！”“枪毙晏容秋！”的愤怒吼声，震撼了整个湘潭城。

当群众一致要求立即枪毙晏容秋时，田镇南却推说要先请示省政府。这时大会总指挥阎应侯在台上向群众宣布：“已向省政府请示，省府批准判处晏容秋死刑，就地执行。”一时群情鼎沸，口号震天，群众将晏容秋推拥到学坪中，执行了枪决。

晏容秋被镇压后，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县总工会和农会，向湘潭县政府建议召开各界座谈会。会议由田镇南主持。杨昭植在会上介绍了当前的革命形势，镇压土豪劣绅的意义，以及正绅站过来的政策精神，鼓励大家同心协力，站在革命事业的一边。至此，湘潭的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的高涨。

（原载《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

在湖南接受日军投降记略

陆 承 裕 *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十五日日本政府命令侵华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就地缴械投降。蒋介石命令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负责湖南区的受降任务。八月十五日，王耀武派其副参谋长罗幸理率第三处课长蔡仁昌及翻译、工作人员、警卫、报务员等十余人，为受降先遣人员，持王耀武要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立即缴械投降的命令，从芷江机场飞往长沙与日军协谈受降办法。十六日，王耀武偕同美国派驻第四方面军司令部联络官主任伍任德少将（译音）、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陶富业及工作人员十余人，乘美机飞往长沙，并令第十八军就近迅速进驻长沙接管城防。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向王耀武举行了投降仪式，递呈了投降书，接受战犯管制，并指定其参谋长一知川少将担任与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负责办理投降的具体事宜。第十八军到长沙举行了入城仪式后，接替了长沙市的警备，日军全部放下武器向长沙市郊外集中。

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后续人员及直属部队经洪江、祁阳徒步到衡阳乘火车至长沙后，立即成立了受降组，由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为组长，第二处处长陶富业为副组长，下设三个股，由二、三、四处派课长及参谋人员、兵站司令部人员共约

* 陆承裕曾任国民党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处课长，参加了当时的受降工作。现任随州市政协副主席，民革随州市委主委。

二十人负责处理对日俘的接收工作。我当时是第二处课长，现与陶富业共同回忆受降工作的经过，概略记述如下。

对 日 俘 的 处 理

在湖南投降的日俘总共二十四万余人，分布在衡阳、长沙、湘阴、岳阳、常德等五个集中管理区，都在交通线上，对尔后迅速遣送日俘较为方便。各管理区都设有日俘管理处，由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委派主任及工作人员十余人，负责点收日俘的武器装备（马匹、车辆等军用物资，交由兵站司令部保管），按对战俘的供给标准发给补给品。各管理区都派有正规部队警备，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各区日俘都派有联络官到日俘管理处担任联络。至于日俘内部管理工作，则按其原建制自行管理，日常活动不得超出我军的警戒范围，少将以上的战俘另行集中管理，由第四方面军的调查统计室管理（调查统计室系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

总共收缴日俘各种轻重武器十七万多件（包括大小炮，不包括战刀、指挥刀），各种弹药、工兵器材、医疗器械、药品、被服装备及其它军用器材无数（当时都有验收表册，具体数字已难记忆）。还有铁道装甲车二列，汽车2800多辆及很多配件，骡马5000匹（乘马、驮马均在内）。日俘中的技术人员，如火车、汽车司机，修理人员，电厂技工，医师等等，均择优抽调出来作短暂的留用人员，后仍如数遣还。也利用过部分日俘修复公路和铁路。各地日俘逐步转到岳阳附近，从长江水道被运往上海遣送回日本。

当时，投降的日军中还夹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被日军抓夫或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编入部队（后勤部队最多）搞粮弹运输或战场抢运伤兵等艰苦劳动，所以日军称他们为“苦力”。其中有工人、农民、

士兵、小商贩、小孩，以湖北、湖南人最多（部分是武汉的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夫），都根据他们本人的要求遣回家了，但也有少数人不想回家，要求补入部队当兵的。这些“苦力”只是一些幸存者，过去被日军杀死、拖死、累死的不可胜数，尤以老年人遭受的虐待最惨。

此外，日军中的顽固分子，接到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之后，有放声痛哭者，有破坏火炮和焚毁汽车者，有捣毁枪枝或将枪枝投入河中者。集中后也发生过日俘强奸妇女和杀人事件，这些人都受到了惩处。

对 汉 奸 的 惩 办

日军投降后，各地维持会组织亦已瓦解。湖南省维持会长唐天德被逮捕。唐天德的父亲是湖南省有名的大恶霸地主。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何键的基本部队第十九师当过骑兵连长，不久离去。抗日战争时期投奔汪精卫集团。湖南沦陷后，日军要他做湖南维持会长，他干过不少坏事。唐被逮捕后，平日与他沆瀣一气的人给他当说客。当时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等出面，要求释放唐天德，担保他不会逃跑。王耀武也就利用唐天德暂时担任日军联络官一知川与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受降组之间的特别翻译（一般翻译工作则选用了—个台湾籍人担任），翻译任务完成后仍交调查统计室关押，不能自由行动。省内其他沦陷区的市县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维持会，大多数汉奸都被捕了，先后受到惩处（判刑或枪毙），也有潜逃或勾结地方官吏而逍遥法外的，有的直到解放后镇反才归案法办。

我们对日俘中的台湾人一律以同胞对待，区别于日俘和汉奸。愿回台湾者遣回籍，不愿回者另安排职业，或留在军队中暂时当翻译官，懂得一定技术（如开汽车、治病等）而又不愿回去的，则留作汽车司机或医生。但也有极少数人愿去日

本的。

沦陷区游击队和别动军的结局

当时在沦陷区有许多打着抗日招牌的游击队，名目繁多，情况复杂，有确系保家卫国组织联防的，有乘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有借敌后游击为名实则是打家劫舍的。日军投降后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或整编为县保安大队，或收编后补充到正规军中去，大部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都解散了，不服编遣的则作土匪论处，予以剿灭。

在敌占区活动的是戴笠的一支武装特务部队——别动军，该部队武器精良，以敌后游击为名，防共反共是实，在沦陷区征粮征税，任意捕人，勒索财物，强奸妇女，沦陷区人民恨之入骨。“宁可日本人来杀，不愿别动军来扎”，是敌后人民最普遍的怨声。日军投降后，戴笠迅速将这些别动军集中改编成了若干个交警总队。

王耀武在接收日军物资中的贪污情况

王耀武贪污舞弊的手法是很高明的，既巧妙，又隐蔽。他不亲自出面，主要由接管物资的兵站司令郑希冉主持其事。郑希冉又名郑云岳，是王耀武的山东同乡，长期以来是王耀武的军需处长。王耀武的亲信左右有八大金刚，郑希冉就是这些金刚中最红、最重要的一员。在接收日军物资和采购军粮中，据我所知，郑希冉为王耀武做了如下几件事：

一、日军在长沙的大批汽车配件材料由兵站接收后，郑希冉秘密卖给了湖南的复兴银行（数量和价值不明）。又将所接管的大批汽车除部分配发各部队外，开始是将已坏的汽车零件拆下来，以后即使尚能修理可用的汽车零件也被拆掉由郑希冉经手盗卖了。经手人之所以如此为主子卖力，因为他自己也可

从中捞一把。

二、接收的日军四艘内河航运轮船，由郑希冉押运到汉口替王耀武开设了一个运输公司。又将接收的一批电动机和其他机器，替王耀武在汉口开设了一个锯木工厂。

三、接收的日军被服仓库，内存有大批黄军呢、军毯、布匹等，除给司令部及直属队的将校军官每人发一套黄军呢制服外，其余均被盗卖，尽饱私囊。

四、日军投降后，郑借口日俘及湖南过境部队皆需粮食供应，由兵站司令部组织粮食采购委员会，以原七十四军上校军需科长唐惠明为采购委员会主任赴安乡一带湖区采购。他们多报人数，超购大量粮食，运往武汉高价出售，获取暴利。经湖区人民向省参议会揭发，赵恒惕提请王耀武查究，王为了掩饰自己，就将唐惠明立即调回。唐调回时，自恃是王耀武一手提拔的，过去又有功于王，盗卖军粮也是受王的指使，所以若无其事。次日下午，王耀武召见唐惠明，并陪唐同吃晚饭，对购粮事一字未提。唐退出后一些老同事为唐担心，便询问召见情况。唐惠明说：“司令官并没有责难追究之词，只是脸色严峻，问了家庭情况，只几句话，未及其他。”次日，王耀武突然宣布枪毙唐惠明，这一新闻轰动了长沙，也震惊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局外人称道王耀武治军严明，但王的老部下却窃窃私议，慨叹唐惠明做了替罪羊，死到临头还不知有杀身之祸。事后传闻王耀武付了唐惠明家属一笔丰厚的优抚金，送其妻回安徽老家去了。

在长沙受降后，王耀武所指挥的十八军、七十四军、一百军、七十三军等从湖南先后调往江苏、京沪一带，进行部署，抢先接收。一九四六年一月，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奉蒋介石电令集中武昌，候机空运山东济南，改编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关于湖南区日俘的遣送任务，交由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

令李玉堂派部队接替，王的七十三军则集结岳阳附近待命。

（原载《株洲文史》第七辑）

衡阳抗战纪念城定名的由来

罗 铁 恕 *

抗日战争期间，衡阳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特别是衡阳四十七天的孤城苦战，两万壮士英勇牺牲，显示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捍卫祖国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把这光辉的历史铭刻在衡阳土地上，激励并教育子孙后代，抗战胜利之初，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先生根据本市各界人士的意见，倡议要把衡阳建为“抗战纪念城”。此议在市参议会一经提出，与会者莫不赞同。但以此举需巨大物力财力，而衡阳兵火之后，瘟疫流行，继以旱魃为虐，全市人民辗转呼号，早已救死不暇，重建城市，实难胜任。而省府财力有限，对此亦无能为力。唯有吁请中央，准予兴建抗战纪念城于衡阳，建设款项由中央拨付，问题始能解决。经研究决定，以市参议会杨晓麓为首，副议长欧炳堃、参议员王炽昌、万衡、王继武等五人组成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文，请求国府顺从民意，准如所请。

杨晓麓等一行于一九四六年冬抵达南京，首先拜访在京湘籍知名人士及新闻界朋友，请他们在舆论上予以支持，并商定一俟杨晋谒中央最高当局之后，再由湘籍国大代表就此事提出书面建议。于是杨晓麓就往谒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面陈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请由中央拨款事。继而湘籍名人左

* 罗铁恕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南京国防部政工局上校参谋，对“衡阳抗战纪念城”一事较了解，现任衡阳市政协委员。

舜生、胡庶华等人以国大代表身份提出：“衡阳为粤汉湘桂交通中心，在几次大会战中形成战略重镇，应先准定为‘抗战纪念城’，分令湘省府先行设计建设，并令行政院一次核发建设费”的书面建议。几经奔走，终于得到国府最高当局批准。除令行政院拨发建设复员经费暨救济物资（以工代赈）外，并令湖南省政府负责设计。经由省府派员会同内政部都市建设专家赴衡勘察。一九四七年春，杨晓麓再度晋謁国府最高当局，请求于举行命名典礼时颁发“训词”，并题颁“衡阳抗战纪念城”碑文，当即获允。杨晓麓旋即专程赴沪，再度与行政院长宋子文及行总霍署长宝树洽商拨发经费工赈物资事宜。

杨晓麓赴京请建衡阳抗战纪念城时，请求建设费用一共是二百亿元，但在内政部决定的是由救济署拨工赈物资八百吨。等到杨晓麓返湘，湖南救济分署已无物资可拨了。直到一九四七年七月行总霍署长及联总克利扶兰署长来衡视察，经衡阳市市长仇硕夫、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面请，始拨款二亿元，发工赈物资一百吨。以如此少量经费和物资，要从废墟上把衡阳抗战纪念城建设起来岂非笑话？经市参议会缜密研讨，衡阳抗战纪念城的建设，限于经费，一时无法进行。但可利用此有限经费及物资，先在衡阳保卫战中我军主要阵地，亦即日军两个师团曾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地方——岳屏山修建一些碑坊亭阁，为抗战纪念城命名奠基，勒石留铭，传诸后世。并按照如下设计进行施工：自山麓至山顶旧时石阶约二百余级已不能就用，应重新修筑，在山腰建一茶亭供游人憩息，茶亭之上竖一大石牌坊，石牌坊再上左右各建一“纪功亭”，亭后中央巍然矗立一块十七米高的长碑，碑上镌刻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题颁的“衡阳抗战纪念城”七个大字。碑后修建一座纪念堂，将国民党军政要员及社会贤达二十一人题辞，分别镌刻于二十一块石碑之上，嵌于纪念堂中（题辞摘录附后）。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所颁“训词”里说：

“至是年（按：一九四四年）六月下旬，衡阳四邻各县，先后失陷，我第十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四十八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地方人士所以请定衡阳为抗战纪念城者，其意在此。昔者孟子言仁者无敌，又言浩然之气，集议所生，至大至刚。我中华民族所恃以生存，所资以兴立者，岂非数千年来仁义之教所沾被既深且远欤！今当举行命名典礼，爰举此义，以告国人，并示来兹。”

岳屏山上各项建筑于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全部竣工。此虽仅为抗战纪念城一点标识，但其意义颇为深远。

一九四六年冬，以杨晓麓先生为首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一行来到南京，杨与我家世代相好。当时，我在南京国防部供职，杨等一行抵京后，他本人就在我的住处（南京太平路安乐酒家125号）下榻。因此我对杨两度来南京为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的活动情况，了解一个大概。四十年前的往事，有些回忆不清，请知情者予以教正。

最后将国民党党政要员及社会贤达为“抗战纪念城”的题辞摘录如下。

“船山尚节敦儒素，
老彭刚直矢不苟，
化为南强期可守，
不道无道期荡寇，
巍巍名城跨九有。”

（章士钊）

“南天屏障”

（吴铁城）

“中流砥柱”

（王世杰）

“三湘保障”

（陈立夫）

“贯日丹心辉楚乘

参天黛色峙衡峰”

(梁寒操)

“九霄日月销兵气

四塞山河护国魂”

(王宠惠)

“民族圣战，喋血湘衡，精忠报国，白刃短见，四十八日，世界闻名，金城永固，葆此光荣。”

(白崇禧)

“船山之风，历劫尔贞，九面瞻岳，众志成城，气吞东海，力控南荆，万古雄峙，不亏不崩。”

(王云五)

“古来战迹，前称涿鹿，歼彼蚩尤，保我民族。九千年后，倭夷逞毒，肆其凶残，兵临衡麓，我武维扬，我民不辱，偕城存亡，誓与角逐，卒操胜利，降伏其图，唯此衡阳，战功卓越，予以名之，纪念无忒，经之营之，永光史牒。”

(张厉生)

“伟哉重镇，曰楚衡阳，地连百粤，势控三湘。岛夷构患，凶焰猖獗，孤城纓拒，战血玄黄。绵历二月，暴骨盈岗，有敌无我，与城共亡。八季抗战，重固金汤，正义克申，上格苍苍。勒此贞珉，永志勿忘，为民族范，为国家光。”

(张 群)

“衡阳形势，馆穀西南，民秉节义，篤宗船山。岛夷入侵，逞彼凶顽，守军□□，力抗□□。五旬鏖战，血润草殷，丁壮掘塹，老弱壺箪。巨弹轰轰，烟尘无完，风雨玄黄，天地易颜。寇氛甫靖，灾祸重干，假草为雉，斃其断残。吁！请中樞，哀此凋哀，输粟发金，万遗辑安。抗战名城，元首锡颁，以伸壮节，以旌忠升。湘清山峻，虎踞龙蟠，我名其原，试告人寰。”

(王东原)

(原载《衡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我在邵阳当县长

徐君虎*

一九四六年秋，我在新宁县长任内刚完成战后工作部署，忽奉令调任邵阳县长。邵阳是一个大县，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加以当时党团争权夺利，官绅鱼肉人民，赌博成风，土匪遍地，商业凋零，农村萧条，饥民成群乞食于市。我以才疏学浅，实难胜此重任，但又不愿知难而退，希望尽力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因此，到任之后，依靠广大群众，树正气，扫邪恶，虽不能救民于水火，但求稍苏民困。时经两载，建树无多，然亦有可纪述以供参考者。

现就荦荦大者述其梗概如次。

除旧布新 拒绝党团干政

解放前，县长上任，多援例悬一张红榜，公布县府组成人员名单。我到邵阳时，当地国民党、三青团以及特务分子，为了争权夺位，把持县政，事前纷纷来信请托，既要求保留原有人员，又要推荐新人。尤其是三青团的团方头目、军统特务、邵陵中学校长、省参议员黄甲，来信形同一纸命令：某某要提升，某某也要任某职。我决心除旧布新，整顿吏治，拒绝党团干政。党团分子除择其陷得不深，平日比较正派的少数几个予以录用外，其余一律洗刷。红榜贴出，黄甲大发雷霆，发誓不进我的衙门，并扬言：“看他做得几天县长！”

*徐君虎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湖南省委主委。

健全政府机构，整顿吏治，清除官僚作风，为当时首要任务。我在就职典礼上郑重声明：“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廉洁奉公，爱护百姓，不畏权势……”我宣布废除传达室，撤去县政府门卫，让老百姓可以直接找县长和各科室负责人。把过去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改为“衙门大打开，人人可以进来”。

采取这种措施，老百姓自然高兴，下情既能上达，即使有不肖官吏，也不敢作奸犯科。我在接见群众时，先后破获了不少案件，受理了不少纠纷。我的作法引起一些好事之徒的议论。他们议论我的背景，我的派系，我公开答复说：“我是老百姓派，我的衙门是老百姓的衙门，我的背景是广大的老百姓，只有老百姓的利益在我的行动与思想中高于一切。”

遣散饥民回乡生产 恢复县城秩序

因日军侵略，乡土沦陷，田园荒芜，所以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到处闹饥荒，邵阳自难例外。

当时，设在美国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是邵阳（现属邵东县）人，对邵阳的灾情比较重视，拨来救济物质较多。附近各县饥民闻风而来，群集城区，有数万人。他们风餐露宿，坐卧街头，病疫流行，死亡人数日增。我问救济总署派驻邵阳之李丽莲女士：“城区救济物资发到何时？”她说时间不会长。我说物资有限，饥无已时，一旦救济停止，数万饥民何以为食？乃建议一次发放救济粮，遣归农村生产。她要求我保证饥民去而不来，才电报总署。蒋廷黻复电同意。于是，我带领一大批工作人员，晚上对饥民进行清查登记，发给遣散证。凡领了证的在他耳后点一点红色药水为记，以免重领。同时电催总署赶快运物资来邵。不久在大祥坪凭证领取应得面粉等食物时，人人喜形于色，荷粮归去。城区恢复了秩序，农

村增加了大批劳动力。当时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将无法以善其后。

整顿发展教育事业

在旧社会，人民很少有就学机会。农村绝大多数人是文盲。

为了提高全县人民文化水平，我首先对全县学龄儿童，进行了一次调查，提出了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同时采取四项具体措施：办好中心学校；积极发展国民小学；扶植奖励私人捐资兴学；严惩贪污侵占学产的不法分子。

在大力整顿保护原有校产不受侵占的过程中，处理校产案件达三百余起，撤换了一批不称职或品质恶劣的中心学校和保国民小学校的校长，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劣恶霸，为巩固发展国民教育和端正学风，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财政极为困难，对发展国民教育极其不利。但我们仍多方设法筹措资金，扩建了邵阳县中校舍，并为学校充实图书仪器。增加了青少年升学的机会。

选贤任能

如前所述，我到邵阳后，不容党、团插手政事。在用人方面，也唯贤与能。

当时，在近二百万人口的邵阳，公私学校不少，县府教育科的地位颇为重要，教育科长一职，为各方所力争。友人赵浩生之弟凡生，大学毕业，写作不错，思想进步，曾对左翼作家田汉等发动的爱国救亡运动多所襄助。我特邀请他来邵阳担任教育科长。上报到省，为CC派所阻，说赵没有十年以上教龄，不够资格。

但我却认为赵凡生德才兼备，年轻有为，是一个难得的人

才。乃不管教育厅的批示，任命他为代理科长，协助我主持教育行政。他任劳任怨，成绩斐然。邵阳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点滴成绩，是与赵分不开的。赵在清查校产中，有人先后两次向他行贿，达数千元，他都拒绝了，表现出大公无私的品德。

邵阳是大县，美国救济物资多，虽然饥民已经遣返，配给各乡镇的物资还是源源而来，必须有一位廉洁公正的人来管理。我查访到洪桥（现属新邵）寒士刘完（寿侨），曾数任县长而两袖清风，当时他在农村舌耕度日。我写信请他来城，说明请他做点好事，来管理救济物资，他以恐难胜任，一再推辞。几经恳请协商，才允任事，但求一中学教师待遇，并要带一个忠实可靠的公丁。刘到差后，忠心耿耿，将每一批到县物资，由各公法团体会议分配给各乡镇，然后将分配数字油印公布。拆下来的木箱板子、钉子、铅丝，也和公丁搜集起来公开拍卖，做到点滴归公。当时各县因侵吞、挪用救济物资，控诉扯皮等事件不胜枚举，邵阳能做到公平合理，人无怨言，刘完之力也。

在选贤任能上，我经常违反“下级服从上级”的常规，也不怕“得罪于巨室”。不少人在省里请客送礼，弄得一纸警察所所长的派令，兴高彩烈来到邵阳上任。我拒不接纳，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派令”。我说：“这个派出所的上级是我呀！”顶了几次，省里也感到自讨没趣，不再下派令了。

邵阳士绅、国大代表周磐，向我介绍了几个人，我一个也不用。有次是介绍一个要当警察所长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当所长！他说：“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还欠了许多债……”这事，县议长谢煜涛也亲眼看到。当我辞职要离开邵阳时，消息传出，各方具呈挽留。谢煜涛将呈文请周磐盖章时，周犹记恨不肯盖章。谢把当时对答的话告诉了他，说：“那样的人，能任用吗？顾得你的面子，会害了老百姓！”周磐才勉强盖章。

剿抚兼施 消除匪患

抗日战争时期，邵阳多匪患，劫车、吊羊、掳掠、杀人等匪案，无日不有。如宝善乡廖家冲贫民谢成章一家七口都被土匪杀害。公路汽车乘客经常被劫持。为维护公路交通，我首先派便衣兵卧伏车顶或杂坐乘客中，遇匪劫车，立即枪击。不到旬日，车辆都能安全行驶。

邵阳与祁阳的边境上，有枪匪五十余人为患。我认为土匪是个社会问题，其中也有良莠之别，固然有的是积匪，大部分实为生活所迫，或者为官绅豪劣及乡保长抓兵而被逼上梁山。因此，我首次出巡到五峰铺时，即设法找到了土匪的一些亲属，对他们进行教育，要他们上山做劝降工作，他们欣然答应。据说其中有些土匪，抗战时曾逃难到过新宁，知我言而有信，更晓得在我管辖的地方，是不容许土匪捣乱的。不久这股以任某为首的土匪全部下山缴械自新了。我分别同他们谈了话，大家泣不成声，诉说了各自被逼上梁山的痛苦经过。我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自新者的处理结果，并勉励大家共同维护治安，努力生产。

同时，将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联保队长粟日初逮捕，押回县城法办，一时民心大快。

经过一段时期的剿抚兼施，地方匪患基本平息。惟甯扰东乡廉桥附近的匡国钧股匪，有短枪二十余支，勾结豪劣，出没无常。我乃亲驻徐家铺剿办，白天搜山，晚上布哨守卡，使其行动艰难，面临困境，内部分裂。匪部中坚分子陈布啰嗦首先向我投诚。于是，我以匪剿匪，除匡国钧与二三人逃跑外，其余皆迅速解决了。

至此，邵阳匪患基本肃清。

永和金号惨案

关于永和金号惨案，我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现合编本第2集）上写了一篇《记邵阳永和金号惨案》可供参阅。这里不再赘述。

严禁赌博 逮捕陈光中

赌博为盗贼之源。到邵阳后，我严厉禁赌，以正民风，而弭隐患。

我的第一张布告，明文禁赌禁烟，各方反映甚好，经学家刘固岩老先生，感而给我一封长达十余页的信，既抒发老人爱乡之情，又鼓舞后辈进取之志。

原国民党六十三师师长、大恶霸陈光中，打着省政府顾问的招牌，在邵阳仗着国民党、三青团和帮会势力，无恶不作，诸如侵吞别人的田地，无偿榨取农民的劳动，霸占良民的妻女，制造一起又一起的人命案件……。而地方官，或与陈沆瀣一气，或慑于陈的淫威，莫不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使受害者上告无门，抗拒乏术，只有饮恨吞声。

我到任不久，有人向我反映了这些情况，并善意地提醒我：“为政之道，不得罪于巨室。”地头蛇是惹不得的，《红楼梦》里的葫芦僧说得好，“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罢职，只怕连性命都会难保的”。

我并没有被吓倒。有次我出巡隆回返县，一中学老师李怡民来告密，说陈光中在昭陵路李保长家大肆聚赌抽头，强邀富庶商民参加。当晚，我亲率警察两队包围赌窟，将陈光中等赌犯数十人全部捕获，无一漏网。次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处罚陈光中法币三亿元，作为修公园之用。后由一家大商店保释，其余从勿议。陈被捕后，他的跛子女婿扶杖而来，许我

五千光洋，求我释放陈，被我臭骂一顿而去。陈因此案，恨我入骨，纠集数百退役军人进城闹事，组织流氓贴标语捣乱，甚至企图暗杀我。我有广大群众拥护，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

回忆离邵阳前夕，原国民党师长黄华国以“陈三爷（指陈光中）说，你是一只鸟，也要你飞不出邵阳”相告，我笑着回答他：“徐君虎，不是徐君猫！”本来我是准备悄悄离开邵阳，以避免群众欢送，因为陈光中的威吓，我加强了警戒，偏要在众人欢送下告别邵阳。

炮兵学校特务营贩烟案

国民党政府禁烟，从来是不彻底的。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但公开叫卖鸦片烟，倒是少见的奇闻。

抗战胜利后，许多军政单位迁回南京。蒋军炮兵学校特务营，由贵州回南京，路过邵阳，携带大批烟土，公然在市上兜售。东关派出所颜所长向我请示，我在电话中指示他“要抓”。但是，两名执行任务的警察反被该营捉去了。

我闻讯即调集驻城警察向东塔一带高地布防，对该特务营进行包围，同时令颜所长前往该营交涉：（一）交出版毒犯；（二）释放被扣警察；（三）将所带毒品全部交出，否则一切后果由该营营长负责。这个营长由于人地生疏，加上老百姓对他虚声恫吓，说这个县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现在城里集训警察人枪数千……他吓得胆战心惊，于是接受了所有条件，于深夜向长沙开拔。

该营到达南京后诬控我以禁烟为名企图将该营缴械。省政府奉令派员来邵调查。我将保存在县府仓库尚未销毁的烟土给他们看，都是用炮兵学校讲义包裹了多层（收购时是湿的），铁证如山，真相也就大白了。

惩罚地主田顺生

邵阳有名地主田矮子，叫田顺生，称为邵阳十大“奇人”之一。奇就奇在善于剥削他人，极端的自私自利。一天我步出衙门，一对衣衫槛楼的母女向我跪下。我将她们带到办公室。原来她们住在郊区，以二十串钱作押金，种得田矮子两丘田。日本鬼子来了，一家三口逃往外地，丈夫不幸又被鬼子抓去了，至今生死不明。

日本人投降后，母女讨米回家。田矮子就向她们逼租谷，没有种田，哪有谷子交租？他就将田收回自耕，押金也不退还。村子里的人看不过眼，又奈何他不得。秋收之后，大家鼓励母女俩在他田里种一季麦子，由于勤耕细作，长得很好。不料田矮子带领儿媳来到田里，把胀胎的麦子砍倒作肥料。母女俩痛哭地诉说了她们的遭遇。次日拂晓，我前往查勘。割下的麦苗，铺满田中，村里人都表示愤恨，并告诉我田矮子在村里还有一仓谷。

我回到县府，马上传讯田矮子。我指责他没有人性，罚他二十石谷，赔偿佃户母女的损失。他有恃无恐地说：“县长，这是民事案件，应由法院管辖，你无权处理。”

我说：“我到邵阳来的第一张布告，就是提倡生产。你破坏生产，我就要严办。你不量谷子，我把你送进牢房，叫在押犯人把你这个为富不仁的东西活活打死！”并随令警卫将他押往监狱。他看到狱卒开锁，才害怕起来，表示愿意具结赔谷。

此一事件，打击了土豪，为佃农出了一口气。

横行乡里的李老太爷

新化大名顶顶的李老太爷李主一，儿子李文是驻防北平的

十六军军长（后为兵团司令）。他在邵阳投资开设面粉厂、绸缎店等企业，买了刘制台花园客厅一座，以为金屋藏娇之所，带着姨太太寄居在那里。儿子李文给他一辆吉普车，四名武装警卫，常招摇过市。

他发现邵阳公产管委会，接管宝庆府遗下考棚街一大片前清考秀才住用的房子，为五属（新化、新宁、武冈、城步、邵阳）贫民所占用，无法管理。他设法以贱价买得，想改成铺面，但是无法使住户迁出。于是他想在我身上打主意，他带领警卫来到县政府，对我进行了一次礼节性拜访。第二天，又送来一份“光临寒舍”的请贴，客单以我为首，一大批士绅依次列为陪客。届时怕我不去，又请谢煌涛议长来邀。酒席特别丰盛，主人频频举杯向我敬酒。饭后，一位士绅代表发言：“今天李老太爷办了一盅光酒，承县长放驾，不胜荣幸。有一件事要请县长帮帮忙，即本城考棚街一大片房子，被五属地痞流氓所霸占，他们认为是五属的公产，科举制度虽废，产权仍在。邵阳公产管委会一直无法管理，只得议价卖与李老太爷。请县长派警察将住户通通赶走，以便修整……”我沉思片刻，微微一笑，对在座的士绅说：“我们应当帮助李老太爷做好事，不应帮助他做恶事。老太爷前人做了好事，才有儿子当军长，应当把好事继续做下去。那些住房的都是城市贫民，衣食艰难，屋也破烂。我是父母官，不能把他们赶到露天的地方。我建议老太爷将屋整修好，还是让他们居住。如果要我派警察去驱逐，恕我不能遵命……。”我说罢马上起身，说有几件紧急的公事要处理，打一个拱手便告辞了，弄得他们啼笑皆非。他图谋已久的一笔财产，也成了泡影。那群贫民自然皆大欢喜。

国大代表选举纠纷

一九四七年国大代表的选举，实为害国害民之一大闹剧。

各地搞得乌烟瘴气，寝犬不宁。邵阳竞选者为周磐与杨继荣，各组竞选班子，拉拢豪劣、党团分子以及乡镇人员，串联在乡退役军人，为他们拉选票。为了多得选票，战胜对手，还准备打票箱，搞武斗。许多善良的人向我告密：“县长，此次选举，城里两个票箱你可能保护得住，乡里的恐怕都要打烂，定会打死打伤许多人……”

于是我派人深入调查，得悉双方联系的退伍军人，纷纷准备手枪，想在选举之日，打烂对方选票最多的票箱。如不采取措施，势必造成流血惨案。因此，保护人民的生命，维护地方的治安，是我的职责。我想了一个办法，设席盟华园（我从来不请客，这次破例），将双方的“轿伕”请来分厅而坐。我问周磐的“轿伕”，估计选票能得多少。他们说大大超过对方，但闻对方将以卑劣手段，想打烂我们选票最多的箱子，使选票作废，我们也准备反击。我要他们绝对遵守选举法，只要票数超过对方，我负责保证当选，他们都同意了。我问杨继荣的“轿伕”，预计能得多少票。他们坦白地说：“与对方比差得很远。我们有一个好办法，凡对方得票最多的箱子，我们就打烂……”我说：“这是最愚蠢的办法。我不忍我的朋友受到法律制裁，更不愿眼看你们帮倒忙……”有一位“轿伕”异想天开地向我提出要求说：“县长，我们同意遵守选举法，不打票箱，但票箱进了县府之后，准我们圈写一些票放进去。”为了避免农村的一次大动乱和大流血，我开了一张不兑现的支票，口头上允许了。

选举之日，我要电话总机时时联系各乡，询问有无纠纷事端。同时派一部分武装到可能出事之处应变。由于采取了措施，选举没有出现乱子。次日，票箱相继护送来县，我不能真正让人弄虚作假，就示意县参议会写信向我建议说“历来选举，多是县府舞弊。为了杜绝物议，以示大公，应由各公法团

体派人驻守县府，共同看守票箱，并由法团代表加盖私章把箱口加封。”我当即“采纳”执行，我的口头支票作废了。第三天开箱唱票，周以超过杨一倍的票数而当选。

反对内战 拒不征兵建碉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为了搜罗炮灰，大肆征兵。农村丁壮为逃避兵役，有断指以求免的，有跳水以自尽的，有举家外逃的。请客送礼行贿以求免的，更是常事。为了安定民心，我一方面严禁抓、捕、捆、押；一方面托士绅石达成致函廖耀湘（时任第九兵团司令），造一本邵阳籍士兵名册回来。我以名册为证向团管区、师管区要求抵额。

继任县长周自曾，怪我欠征兵数千。我要他不怕丢乌纱帽，大胆拖延下去，为人民做点好事。

国民党还企图用碉堡政策打内战。一九四七年，湖南省政府下令，要我在邵新（化）、邵湘（乡）、邵衡（阳）修建防共碉堡，我置之不理。

省府乃派干训团教育长赵可夫来查。我邀请各公法团体集会讨论，请赵出席。军界前辈雷飏、谢煜涛相继发言，当面指责省政府发疯。理由是邵阳过去钢筋水泥碉堡甚多，抗战时下令一律毁掉，免被日军占了不好反攻。现在又要修，东北、石家庄等地碉堡修得多，共军来了挡不住，邵阳修些碉堡就能挡得住，就能打胜仗吗？他们说，地方财政困难无钱修碉堡，不同意徐县长修。万一省里要修，请省里拨款修建。

会后，赵问我怎样办。我应付说待我慢慢说服参议会。事实上劳民伤财之事我不能做，直到我辞职挂冠，未曾新修一个碉堡。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因为一个县长，办事不从人民利益考虑，总是要遭到人民唾弃的。

上瑶山平冤案

在邵属隆回边境，有瑶民数千人，长期以来遭到汉族劣绅的愚弄与欺压，历来的县太爷从不过问他们的疾苦，从来不入瑶山。

我于一九四七年冬，带着一个警卫班进入小沙江瑶区。途中有人相告，山上盛产马铃薯，每户收入从数十担到百余担。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各地缺粮，常来挑运，衡阳一带则以马铃薯作制百合粉的原料。薯种系过去外国传教士引进来的。我上山一看，果然不虚。

山上道旁，有一客店，房舍数间，布置整洁。我问店主“来往行客多吗？”“不多。但是汉人与瑶人之间有纠纷，则请士绅来店住宿，吃喝评理……”原来此地豪绅有一种冠冕堂皇的敲诈分赃恶习，凡瑶汉有纠纷，即设席请士绅调处，甲乙双方竞相斗钱，由士绅乱议一番，作出裁判，输理的一方，钱被没收，给在场的士绅瓜分。从过去处理的事件看，理输的多是瑶民。

山上有一所小学，名曰“开化”，即有侮辱瑶民之意。校长兼教师魏桂堂（汉人），将学费收到手后，教一两个月书，便坐着轿子到邵阳城帮人做状纸打官司去了。

抗战时期，有一位联保队长胡万松（汉族），是当地一恶霸，贪污勒索，无恶不作。他加瑶民沈丫成以匪名，将其房屋猪牛没收，使沈全家到处讨米度日。瑶民缺乏文化知识，处处受人欺凌，想吃豆腐渣，则要黄豆换；养的牲畜，猎到的野物兽皮，常被小贩（汉族）卡价骗去。有一个瑶民被抓去当兵，因语言不通，竟被接兵部队活活打死。一幕一幕的悲惨景象，在我脑子里回旋，我感到失职——来迟了。夜深了，我独自一人在屋中徘徊，不知流了多少泪。

第二天拂晓，我派兵去抓胡万松。他听到我会来，便溜之大吉了。我马上召开大会，当众宣布：（一）限胡万松两月之内将沈丕成全家寻找回来，并发还他的家产，否则通缉法办。

（二）严禁以斗钱调处纠纷。（三）免除瑶民征兵服役。（四）不许奸商欺压瑶民。（五）撤开化校长魏桂堂职，另派人接管。（六）培训师资，挑选瑶族青年两名，送邵阳师范学校读书（一名叫步道德，一名是奉修平）。

我在瑶区蹲了三天，临别时，男女成群结队，夹道送行。尤其是上千名穿着花布背心的妇女，更流露出依依难舍之意（美国救济物资中有一批花布棉背心，在分配时，我说服各乡镇，全部分给瑶民）。瑶族兄弟还送给我一大包草药，我视为最珍贵的礼物。

返回邵阳县城不久，司门前派出所傅云腾所长来报告，说胡万松四处派人寻找沈丕成全家，已从芷江找回来了，并发还了他的全部家产。这就了却我一桩心事。

早几年，隆回县委统战部告诉我，沈丕成还健在，有一子五孙。

邵阳乡村工业示范组

上海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博士，热爱故乡，决定将“乡村工业示范组”设在邵阳。我十分高兴。邵阳农副业生产，在战后有一定的发展，烟叶、辣椒、黄花，甘蔗等年年增产。尤其是果树的培植与推广，成绩显著。有贺曼真创办的“曼真农场”，有园艺专家吕子哲办的“哲园”，有留德学生钟道龙办的“自力苗圃”，还有一位退休军官办的“归园”。据柳子明先生说，果木品种之多，在当时西南各省占第二位。养蜂业也一时兴起。但工业仅有一个“光明电灯公司”，一个面粉厂。因此，我倾全力以协助“乡村工业示范组”的成立。

他们需要一位懂英文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将县府建设科长（大学生）彭昌达让给他们。要建筑基地，我舌敝唇焦地说服金姓族众将祖坟迁葬，腾出沙子坡一大片土地。从绘图设计到施工，一栋一栋很雅致的办公室、宿舍相继建成，一辆一辆的小汽车从长沙接来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住了进去，还挂出首期要建立的十大工厂的牌子。我高兴得几乎难以入睡。尤其是年老热情的史通先生，他同我谈到邵阳城内没有自来水时，说示范组运来大批钢管，要我发动市民一夜挖好土坑，即可铺好。结果真的实现了。这更增加了我对乡村示范组的信任。

我的美好梦想，终难以成为现实。乡村示范组建厂工程进展非常之慢，那些人似乎已变成只拿高薪不做事的人。兼以内部分歧，互相摩擦，更阻碍了工程的进展。我一再催促，也无济于事。而国民党前方军事节节败退，他们预感到邵阳终非久居之地，积极性更小了。截至一九四八年九月我离开邵阳，共建成了九个不象样子的厂子（有化肥、榨油、机械、面粉、硫酸等厂）。但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

不久，“邵阳乡村工业示范组”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而寿终正寝。

我亲自处决的案犯

我在邵阳亲自处决的案犯有三起：

一、我视事不久，有五丰铺一小商贩来报，他挑一担布在城外朱家亭子，被两个土匪抢去了。我判断是城区的土匪所为，于是我问他土匪的模样。他说，有一个脸上有黑痣，见着能认得。我说：“你暂住城里注意来往行人，看清了，要站岗的警察协助你抓。”第二天晚上就将其中一个土匪抓住了。接着他说出了同案犯的住址。我马上派人去抓，并缴得一把手

枪，取回了被劫走的布匹。经审讯这是两个不事生产的惯匪，第二天拂晓，被押往朱家亭子枪决了。

二、有次我出巡到两市塘（现属邵东），老百姓纷纷向我密报，说一个姓李的土匪送了湘警大队长李谦三百元光洋，李就任命他为侦缉员，打单送挥（土匪恐吓勒索的一种方法），四处诈索。我命令乡长张极垣就近逮捕，关进碉堡。附近湘警大队驻有一个分队，闻讯前往营救。我接到电话，要张固守碉堡，等待援兵。湘警大队的人知道我是不好惹的，见援兵来到即行撤走。那个披着湘警大队探警外衣的土匪，当晚被解到两市塘，在受害人纷纷控诉之后，我同他扯了半晚谈，他承认了一切罪行，并想充当我的侦缉，立功赎罪。

第二天，我将他枪决在两市塘街口，为民除了一害。

三、我第一次出巡隆回，在司门前早餐时，忽有人来报，一位乘轿的中年妇女，在山坡上被土匪抢了，她提供了一点线索。我找派出所长傅云腾研究，认为派出所开除的班长伍某，游手好闲，行迹可疑。经一夜追捕，人、枪、赃物俱获。确实是伍某勾结两个枪匪干的。第二天，我令派出所将三个土匪一齐枪决。

我杀的土匪，多是以抢劫为生、民愤极大的好逸恶劳者。凡因饥寒交迫，或受人欺凌，被逼上梁山者，即被拿获，我也多令其亲属领回好好管教。我认为除害安良不能手软，良莠不分，治安难保。再说，广大人民在动乱的社会中也难安居乐业。

惩罚一批嫖客

烟、赌、娼是败坏风气，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娼的产生，我认为嫖客要负主要责任。他们凭借财势，玩弄良家妇女。

有一次，我带一个手枪班，深夜进入邵东廉桥，分住在各客栈。在我住屋隔壁，有淫秽之声不堪入耳。原来是一个收购黄花的客商，勾引附近农村少女行乐。我披衣而起，令手枪班长蒋云吉马上查夜，所有嫖客一律捕押碉堡，女的释放。共抓到十多人，都是在本地收购黄花的客商。第二天一早，商会会长即来求情。我的处理条件是两条：一要打扫街道清洁卫生，不许请人代替；二是廉桥要建闸门以防盗，所需经费全部由这批嫖客承担。我责成商会会长、派出所长共同负责执行。此事传开，人多笑我做了一件“恶”事，或谓之“恶作剧”。

告 别 邵 阳

邵阳自鼎革以来，据纪载，三十七年中换了五十三个县长，我任期最长（1946—1948）。下车伊始，即与封建势力、党团分子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坏人进行搏斗。在较长的时间中，我未遭杀害，未入牢房，是老百姓支持我，爱护我的结果，同时，我的一切无私措施，也赢得许多有正义感的士绅，如雷飏、肖莛、李泽民、贺曼真、戴岳、刘固岩、赵恒、岳森、赵宣、刘完等以及文教界不少有识之士的同情。

以前我在新宁执政时，即有人以奸党、赤化分子向南京、长沙控告我，终以“查无实据”而罢之。我默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句，盱衡大局，不能不暂行辞职另作良图。三上辞呈，始获批准，还来了一个可笑的电报：“辞职照准，着调绥署少将参议，按级支薪。”消息传出，邵阳各界挽留的电文似雪片一般飞向长沙，我决心已定，不能改变。县属九十三个单位遂组成一个庞大的欢送委员会，筹备欢送。九月三十日在县府举行交接典礼后，万人空巷，鞭炮齐鸣，锦旗招展，送我离邵。我与群众一道，缓步走上大街直趋西门河边。只见两岸人山人

海，情意依依。渡河后，欢送会以一部大卡车，装上一排武装士兵开道，以防陈光中骚扰。我坐着一辆小吉普车与善良的人民告别了。

行前，邵邑文人雅士，锡我诗文，有指责之词如：“高风彭泽今归隐，知否昭陵涕泣多”；“纵是故乡明月，忍教忧患满人间。”亦有赞扬之作，如东乡七十老人龙振泽所赠长诗中有：“苦心忧忆下车初，闾里萧条浩劫余。却费千筹与百虑，吾民始共获安居。……询民疾苦自亲巡，僻壤芒鞋独一身。剿匪除贪宽济猛，自新却又煦为红。贫民高利贷谷洋，剜肉当时只疗疮。幸逢生佛知救苦，减轻租利制豪强。……悯人穷困复怨天，未雨绸缪足食先。教种杂粮思预患，一耕立看是三年。博徒匪类共猖狂，共毙当途豺继狼。积虑颇思除大害，几回冒险试轻尝……。”

我在报上发表的《告别全县父老同胞书》中毫不隐瞒我的观点：“我平生认为人类中最可敬爱，而且应该敬爱的，就是一般勤俭劳苦，只知生产，没得享受的善良民众。那些食禄万钟，拥资无算，田连阡陌的人们，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是他们的血汗。怎奈这些劳苦功高的善良民众，不但没得到那些享受阶级的丝毫爱护，相反的只受到层层压迫与剥削。这压迫与剥削才是他们的报酬。说来真令人痛心！所以我既作了亲民之官，便抱着爱民之志。到任之先早已择定了这条道路，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目标。我为减轻民众的负担，我为打击欺压民众的恶霸，我为剿除危害民众的匪盗，我为扫尽敲诈民众的坏蛋，概以大刀阔斧砍去，决不顾个人的利害，更不顾人家对我的恩怨。”军统及其他特务分子，从我的言论与行动中，对我已看得一清二白了。可是，我不是共产党，只是共产党忠实的朋友。我一九四八年冬到达长沙，深夜被军统特务绑走了，关押在落星田一密室里，我估计自己将会遭到暗杀。幸而一个看

守我的邵阳人同情我，帮我送了一张纸条给长沙县长李惕乾，李复找省府秘书长邓介松，邓将保安副司令王劲修请来，他指责了军统特务的不法行为。事已暴露，他们不得不将我释放，王同李一道到落星田将我接了出来，我又得救了，俗语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其信然欤？

（原载《邵阳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参加组建江南地下第四军的回忆

言 乃 克 *

江南地下第四军，是解放前在湖南参加人数较多、活动地域较大、牵涉面较广的一支地下武装。为了保存这一部队当年组建经过及活动情况的史实，谨就自己亲身参与及各部汇报内容，回忆记述于后。

抗日战争后期，我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工作，愈接近上层，愈全面深入地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黑暗面，愈增强内心的愤慨与对国家前途的忧念。抗战胜利，我即脱离国民党，参加民主党派反蒋反内战运动。回到湖南，与周士仪、徐传真等人联系活动。

此时，民盟组织中的青年党、民社党受国民党拉拢，参加所谓“联合政府”，支持反动内战，被清除出盟，另由民盟中央委员汪世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已去世）、沙彦楷（建国后为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等人发起民社党革新整党运动，委托我负责湖南方面的工作。以后，民社党主席张君勱与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等人，都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湖南的民社党人黄维国、向构父、舒礼鉴等，也分别取得了省政府委员之类的官位，接着还有人当上了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省参议员等等。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民社党（革新派）在上海召开全

*言乃克曾任“江南地下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现任株洲市政协常委、省参事室参事。

国代表大会，公开清除右派成员。但会上没有树立明确的政治立场，只提出反对“联合政府”，反对内战，要联合国内各民主力量，争取恢复国内和平，并寄希望于美国对国民党的“压力”。这是当时流传的“中间路线”的论调。汪世铭还找我去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他的家中，出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寄来表示支持他的两封信，他信心很足。我不太同意他们的看法，曾根据在武汉、长沙分别与徐传真、周士仪研究的意见，在会上提出，要策动武装斗争，以军事行动配合政治宣传，才能给反动派以更有力的打击，产生更大的效果。可是会上只有少数年轻代表感兴趣，多数人并不重视。沙彦楷会外关照我：“代表中成份不纯，军事反蒋的话，不能公开提出，只能个别研究。”

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仍回湖南活动，经南京时，找到我的亲戚唐拔。唐也是株洲龙头铺人，大革命期间曾在国民党著名左派将领邓演达手下工作，以后转入粤系军队陈济棠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部长及海陆丰守备司令等职，因非蒋介石嫡系，常受排挤，当时正在办理退役手续。已往我们不曾见过面，只是亲友口头介绍过，互相都有些知道，这时两人见面，交谈十分融洽，他同意参加军事反蒋活动，约定等南京手续办完，赶回湖南，共同活动。

我回湖南，与周士仪、言碧清、陈奇迁等人组织民社党湖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周士仪为老同盟会员，有较广泛的社会联系，我们向民社党中央推荐他为主任委员，并以民社党革新派名义，清洗向构父等投靠国民党的一帮人，吸收新的党员。一面向外散发伍宪子在香港主办的刊物《人道报》周刊，进行反蒋反内战宣传，表明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合作的态度，以此作为掩护；一面与周士仪、徐传真、张威、言碧清等人秘密策划反蒋武装斗争。

张威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曾被国民党投入监狱，抗战开始，经党的营救，恢复自由，以后在民革主席李济深处工作，曾任李氏随从参谋，当时在湖南活动。

徐传真为工程技术人员出身，在工业生产方面有过建树。抗战前期曾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与共产党人接触较多，受到教育，有所觉悟。一九三九年即离开旧军队，当时与我认识，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武汉长沙一带活动。

言碧清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任资兴县委妇女部长，马日事变后与党失去联系，匿居湘潭经商，国大选举时，愤于反动当局胡作非为，在社会舆论支持下，故意搭起对台戏，从事竞选，并取得多数票，迫使当局毁弃选票，硬性圈派代表，更加暴露其丑恶面目。一九四七年秋，我得知这些情况，特去动员她加入民社党革新派，她也成了军事反蒋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一九四八年初，唐拔回长沙，他又先后介绍他的旧友唐桂同、女婿刘建中等人参加活动。

刘建中原任山东昌潍县长，该县解放后，经过党的教育，受指示回湖南。随后他又介绍从山东回湖南的中共党员杨建与我们联系。

此时，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集团中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平日比较右倾的人也都徘徊观望，不敢胡作非为。一般人员只是不明党的政策，心存疑虑，只要稍加晓谕，就有可能争取到反蒋行列中来。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株洲地区有一支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是由当地帮会分子组成，人数很多，成份很复杂，但其首领杨文熙很有些头脑。抗战末期，八路军南下支队经湖南时，曾与他有过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到国民党多方镇

压，他们被迫分散潜伏。一九四七年我得知这一情况后，设法找他联系，经过几次见面谈话后，他决定参加我们的斗争，暗地集中人员，取出隐藏的枪枝，听候我们的通知。

国民党衡阳师管区补充兵大队长伍长风，一九四〇年我在重庆搞中央军校同学联谊会时就认识，一九四七年他因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曾要我介绍他参加民社党革新派反蒋活动。这时我们要他设法转到郴州师管区，将来好利用湘南山区开展对敌游击斗争。

同时，由刘建中、唐拔介绍国民党军副军长唐伯寅、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由周士仪、张威介绍河东地区司令林芝云；言碧清介绍湘潭地区将级军官刘暗初、黄诚参加我们的活动，我都与他们见过面，建立了一定联系。

在活动过程中，大家都一致感到，搞武装斗争，必须受共产党解放军的直接领导和统一指挥。周士仪、唐拔建议我去香港找汪世铭，通过汪与中原解放军取得联系。因汪世铭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曾到湖南与我和周士仪等人见面，表示民社党革新派已放弃“中间路线”的想法，决定在蒋管区开展武装斗争，并带来中国共产党在蒋管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政策法令及党的城市工商政策、土地政策、东江游击根据地的经验等文件；又介绍他的堂弟省高级检察院检察长汪廉和侄婿检察官鲁兰馨担任联络和掩护工作。接着，汪世铭、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中央，遥电响应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五一”发出的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号召，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并由上海转移到香港。

我去香港找汪世铭，他谈了当时的情况，说他们已受党中央邀请，要由海道去东北佳木斯，转石家庄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并指出各民主党派在蒋管区的军事活动，已决定由民革主席李济深负责联系领导。他开了一份对香港皇后大道李氏的一

个参谋联络机构的介绍信，要我随时去联系。我认为这样仍要经过香港，鞭长莫及，不符合当时形势的要求，因此没有去皇后大道，匆匆赶回湖南，与唐拔、周士仪、徐传真等人计议，一面继续加强策反宣传活动，一面努力设法与党取得联系。

一九四八年秋，我与周士仪、唐拔、张威、徐传真、刘建中、杨建、吴家健、莫钧一、左雄等各方面负责人共十余人在长沙回龙山唐拔家会商，组成“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推周士仪、唐拔为正副主任，刘建中为宣传部长，张威为联络部长，杨建为军事部长，徐传真为后勤部长，我为组织部长，分工负责，继续扩大宣传和联络各处力量。除以联系的各部队外，又有刘建中、熊维汉等人联系的国民党三一四师陈达部，张威、戴剑虹联系的湘乡地区保安三团蒋琪生部，以及杨建、周士仪分别在长沙、湘潭、湘阴一带联系组织的力量。

为了寻找中原解放军的直接领导，同年九月，我由张威介绍去汉口找章裕昆同志。章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纪实》一书的作者，他以后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正在武汉工作。他向我了解了湖南方面的情况，高兴地引我去找当时江汉军区驻武汉的地下工作负责人，但已回解放区，只得约定等他联系好后再来长沙找我。

过了几天，章来长沙，进一步了解了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及活动经过，带来了党的一些有关政策文件，要我们扩大宣传，约定由江汉军区再派人来联络。同时，饶青华（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未暴露身份）在湖南省建设厅电台工作，长期为我们秘密收录新华社广播，今后可为我们向解放区直接通报联络。

我们联系好的武装，还分散在全省各处。开始行动后，其指挥中心，最好设在离长沙不太远的地方。株洲是长沙向南的后方枢纽，到关键时刻，如果能集中力量控制株洲，即可扼长沙

咽喉。唐拔和我又都是株洲人，情况熟悉，能在株洲附近山区建立指挥根据地，是很理想的。原株洲地区与我有联系的杨文熙，由于行动暴露，于一九四八年四月被国民党派兵包围逮捕杀害，其部下人员又四处逃散。此时我再回株洲，找到杨部骨干龙少云、贺光裕等人，重新集中他们的武装，先担任我们在株洲活动的警戒联络任务，再待命行动。

为了使分散各地的部队起义后便于指挥掌握，必须培训一批骨干人员，分配到各部队，作起义的中坚力量。一九四八年冬，曾在株洲河西刘家祠堂举办短期训练班，张威设法弄到一份公文证明，由我负责主持，计划每个部队抽调一定数量人员，并动员一部份知识青年参加，预定五十人。训练班开办不到一个月，只有周士仪、伍长风、龙少云等部送来二十多人及部分知识青年。我们初步作了形势报告，宣传党的政策，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这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由于当时训练班的武器太少，刘祠隔株洲太近，如果敌人偷袭，很难防范，想匆匆转移更会引起敌人猜疑追查，经大家研究，提前结束训练，将人员遣返各部，这些人在以后各部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言碧清了解到湘潭部份富裕商户，因不明党的政策，心存疑虑，打算挟资外逃香港，其中有前任商会主席黄政衡，这个人在湘潭商界威望很高，在长沙、衡阳、邵阳等地颇有影响，社会上称他为“升王”。只要争取了黄政衡，湘潭整个商场都能稳定下来。于是，通过言碧清，我秘密访问黄政衡，向他宣传了党的城市工商政策及对开明人士的政策，分析了他的前途，终于打消了他的顾虑，决定留下来协助我们活动。其他打算外逃的商人，见黄政衡不走，果然也打消了去香港的想法。

接着，黄政衡又先后介绍我会见当时商会主席王翰章及其使几个负责人和湘潭城关镇镇长陈健，警察局长温国纯，

约定由他们负责稳定社会治安，控制湘潭工商界，并在经济上支援地下策反活动。华中绥靖公署工兵营长陶怡，驻在长沙回龙山唐拔私宅内，经过我们反复做工作，陶表示坚决投向人民。

章裕昆从长沙回武汉后，解放军江汉军区曾派熊挺生同志来长沙，研究当前活动方式。接着，我们又让徐传真去武汉汇报。那时，武汉还没有解放，熊挺生已返回解放区，徐留在武汉等待，并参加江汉城工部工作，做出了一定成绩。

由于江汉军区不适宜领导湖南的地下活动，中共中原局三一三〇组织派邢文康、杨觉新与我们联系。随后，中原局社会部派宋声一科长来长沙传达指示，要扩大反蒋活动，成立地下武装，维护道路桥梁，支持工人护厂护矿运动，迎接解放大军南下。

一九四九年初，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推派刘建中、胡大钧去武汉汇报情况，请示工作；奉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委派唐拔为军长，张威代政委，徐传真为参谋长，我代政治部主任。军之下成立第十至十二师及两个暂编师。陈达为第十师师长，杨建为十一师师长；刘荣为十二师师长；周士仪为暂一师师长；蒋琪生为暂六师师长，戴剑虹代师政委。此时，徐传真仍留在武汉，地下第四军由唐拔、张威和我三人负责，迅速组成起义部队。另外成立三一三〇长沙第七总部，搞城市迎解准备工作，长沙方面由刘建中主持，并负责向上级联系；湘潭、株洲两地由我兼管。

当时决定，以国民党华中绥靖公署工兵营为基础，由陶怡率领成立军部警卫团；另以龙少云、贺光裕为正副大队长，成立军部突击大队；唐伯寅约定策动一部份部队，也参加军部的序列。

按当时形势和各部队具体情况，军部和第十师、第十一师，暂六师可以先行建成，开始活动。

约在四月上旬，一面约定唐伯寅、龙少云部在长沙南面与湘潭交界处的跳马涧以东的南大路会合，一面由陶怡假传绥署命令：工兵营向衡阳开拔。唐拔、张威随军同行。到达跳马涧时，唐伯寅没有来，龙少云、贺光裕已集结一部分人在等候。按原定计划，在神仙桥地方，由唐拔、张威主持召开大会，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成立，会上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起义的重大意义，指明有不同意的可以提出，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当时一致欢呼拥护，没有一个要求离开的。

部队开到郝家湾大屋进行编组，正式成立警卫团和突击大队。这时，侦察到驻株洲东部桂军两个营，向郝家湾方向进犯，唐拔决定率部赶到亭子前迎击，敌人措手不及，一经接触，即仓皇溃退，我军士气大振。不料当部队转移到八户后，由于陶怡某连个别排长平日对连长不满，这时串通少数人深夜哗变，枪杀连长，带枪逃跑，虽派部队追击，不曾追回。这一变故，使部队情绪受到影响，特别是警卫团的人员，心情很不安定，陶怡本人也心情抑郁。我闻讯赶回部队，与唐拔、张威研究，决定召开会议，向大家说明事实真相，检查了起义准备工作的缺点，并分别找指战员谈话，交换意见，稳定人心，部队移驻西庚岭。接着，三一三〇派倪格来任政治部秘书，并带来男女青年十余人，成立政治部宣传队，大力对部队和周围群众进行政治宣传工作。“五一”节又发动湘潭县商会进行节日劳军活动，慢慢人心安定，士气重新振作起来。

鉴于唐拔是旧军队将级军官，在当地有些名气，就决定常驻部队负责指挥，不再外出单独活动，因此以真名公开发布命令张贴布告，扩大了对外围的影响。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教师或平日熟悉唐拔的人如唐宗成、龙应明、文剑非、袁亮、唐祥盛、言虎明、文正西等人，先后自动申请参加工作。更有地方武装如周铁吾等率领人枪来投。附近乡镇部队负责人

周干等也主动来联系，愿意担任外围。唐拔、张威等人又亲到驻地外长沙、湘潭、浏阳附近地区，找乡镇头目交待政策，进行谈判，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约束，并负责征集军粮给养；又召开几次群众大会，扩大宣传影响。有一段时期，附近乡镇经常送来猪鱼之类，引起唐拔的重视。他认为，部队生活高于当地群众，将产生不良影响，还可能麻痹斗志。遂即发出通知，断然杜绝了这一现象。

在此期间，白崇禧驻长沙、株洲、浏阳各处部队，先后几次小规模进犯，都被我军击退。我们对外联系，除仍由饶青华通过省电台秘密进行外，另由杨觉新、温广义发展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长沙电台报务员朱家彦、魏若珍同时进行通讯译电工作。随后由三一三〇拨来电台一部，曾由饶青华、周世甲先后转移在明德中学胡子靖校长家，兴汉门济安米厂内及市警察局，拨上级颁发的波长呼号，反复进行向上级电台联系试验，准备迁入军部使用。

七月初，长沙嵩北联防大队长周干，派人密报：长沙县长黄光焘纠引白崇禧部，正分路向我进攻。因北路接近快，唐拔带领军部警卫武装，集中迎击北路。接火不久，其他两路也有枪声逼近，因在夜间，恐怕陷入敌人包围，只好转移。一部份由贺光裕率领化成小队，在株洲四周协助原已安排在田心机厂、董家墩兵工厂、白石港铁桥等处从事护厂护路的同志，进行活动；一部份过湘江，转入湘潭王十万、黄牛不出栏一带活动。

此时，第十师陈达（原国民党三一四师师长）率部起义，计划配合姜亚勋部在宁乡、望城一带活动。因暴露过早，在部队调动时，被国民党第一百军杜鼎部突然袭击，因敌众我寡，最后溃散。其中杨威等人，率部归到第十一师杨建部。起义虽告失败，但因地处湖南中心，接近省会，影响很大，动摇

了国民党各部军心士气，对湖南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十一师原名“湘赣挺进纵队”，由该师师长兼政委杨建等人秘密组成。一九四九年初江南地下第四军成立时，为统一领导配合行动，经中原局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一师，同敌人进行公开斗争。师下设三个团四个营九个连，副师长丁柏、李伯涛，副政委左雄、李健勋，参谋长曾会奇，政治部主任肖援华，六一团团长何绍鸿、政委李镇传，六二团团长李伯涛（兼）、政委王仲儒，警卫团长杨威、政委李德希。他们主要活动在长沙、望城、湘阴、岳阳一带，一面宣传一面作战。曾先后与敌人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战斗：一九四九年六月，分别在靖港、九峰山两次与国民党九十三军八十二团等部交战，打击敌人对靖港的骚扰行动。七月，在湘阴地下党领导下，在川山坪以南，破坏铁轨一段，翻毁敌军车一列，缴获各种武器数十件及其他军用物资。七月二十五日，在湘阴县工委指示下，争取县自卫队起义，支持地下党成立湘阴人民临时政治委员会，宣布湘阴和平解放。八月，配合人民解放军围歼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万少鼎部，活捉其参谋长项子成。同时配合解放军部队，追击了南逃敌军，保护了捞刀河等处铁道桥梁，为人民解放军南下扫清了道路。还袭击了敌掳用的“湘中号”汽船，捕获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头子胡欢及第十七纵队暂三师师长李澍等，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第十二师由师长刘荣主持，一九四九年六月在邵阳成立。他们策动国民党新八军尹立言部的副军长林栖、旅长邓成功起义，使尹部迅速崩溃，同时，联系了当地部份武装，直接打击了敌军在衡宝战役中的抵抗力量。

第十师起义失败后，军部派熊维汉等人策动国民党将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第一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焦达悌，接受新第

十师番号，控制该地区的武装部队及地方机构，收缴过境敌军，维持地方治安，迎接解放。

暂一师师长周士仪，利用个人的社会影响，与政委余建中，发动任克明、罗光泽、余成龙、单道俊、黄祥荫、陈端裔、周荫农、郑家祉、郑家佑等人作为师的骨干分子，在长沙、湘潭、望城一带，联系组织武装力量，策反国民党部队，建立师部及其下属部队。以王康奇为副师长，余成龙为参谋主任，单道俊为供给部长，王志恒协助工作，黄祥荫为政治委员并负责对军部及电台的联系。郑家佑为主任秘书，彭楚怡为书记，陈端裔为副官主任，罗健达为师长随从副官，组成了师的指挥机关。

师以下按当时部队及负责人实际情况，分别设旅与团。警卫团副团长任克明，曾于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率国民党军淞沪区第五团举行起义，失败后，逃回湖南，后参加湖南人民革命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策动国民党霍揆彰兵团支队长吕超起义，归附暂一师，仍以吕超为团长，编为警卫团，并分配周扬龙、傅世林等为营长，又派周扬龙打入蒋军新兵总队陶富顺部，公开招兵，充实力量。

前后派周荫农、罗光泽、陈俊龙、李仪荪为团长，在湘潭、长沙外围，组建部队。

由于暂一师各部都在城市郊区接近省会地域成立，易引起敌人重点围攻，接受第十师及暂五师张先正部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暂一师部队，没有给予公开武装战斗的任务，只是要求掌握好部队，维护地方治安，并以武力支持护路护桥及保护公共财产，扩大策反宣传，分化瓦解敌人。如陈俊龙团封存守护跃龙山粮仓，保住全部粮谷，供解放后支前急需；陈端裔在春华山袭击湖北保安旅，一次缴获步枪三十二支，机枪一挺、手枪一支；李仪荪部派人设法引诱驻守捞刀河炸桥的工兵班脱离驻

地，全部歼灭，起了护桥作用；黄祥荫奋力抢救长沙金井间的螺岭桥，使敌人炸桥阴谋不能得逞，为解放军进军长沙，作出了贡献。

暂一师部份工作人员配合三一三〇长沙第七总部，在长沙搜集敌方情报，策动敌军警人员反正，参加我方活动。余成龙配合张威，策动国民党总统府战地特派联络专员程远参加地下第四军，仍任命为军事专员，随敌军去四川，以后率两个团在峨嵋起义。又策动鲁道源兵团高级参谋姚芝生参加地下第四军，以后在南宁率一个团起义。策动蒋方特工组长刘克礼受我军节制，并派赵琪前往掌握，衡阳解放时，率全部人枪及电台起义。事后刘克礼又在我公安机关领导下，在武汉等地破获潜伏特务组织。任克明协助刘建中策划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起义，并与黄祥荫、唐炳乾等分几个层次，加强对警察局的联系与控制，获取情报，保证我方在长沙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黄祥荫曾及早获得敌方情报，通知我军部驻长负责人唐桂同等转移，并参加我军部电台工作。师长周士仪被白崇禧通缉期间，由周世甲结合饶青华负责掩护，潜伏在省电台，秘密传呼指挥各部活动。

国民党河东地区司令、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林芝云，由张威、周士仪策动起义，经军部研究给予该部暂一师一个旅的番号，集中全部人枪，并控制地方部队，抵制防范国民党部队在该地区的骚扰破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林芝云在湘潭活动时间长，湘潭沦陷时期，当过游击司令，曾有危害地方的行为，此时心存疑惧，徘徊不定。解放前夕，我们得到情报，林部四五百人集结在湘江以西雷打石一带，态度暧昧。我一面将此情况向驻株洲军管会主任袁福清同志汇报，一面只身赶到龙门寺，向林芝云及其主要干部，宣传形势，交待政策。他们一致表示，不再三心二意，坚决在原地待命。后被解放军一五九师

全部接收整编。林芝云本人又陪同人民政府干部及解放军一个排，到各地接管政权，接收地方部队，收到良好的效果。

国民党交警总队长张先正率部在株洲、湘潭铁道线上起义失败后，经三一三〇同意，由地下第四军以暂五师番号接受整编。

暂六师师长蒋琪生率领保安三团两个营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湘乡起义，展开游击活动。我军部成立后，派戴剑虹以军事特派员名义，前往领导，任命蒋琪生为师长，戴剑虹为政委，唐岱为副师长。戴剑虹迅速了解当地情况，会见湘中地工委书记章文，制止了蒋琪生、李方人等袭击我地下武装聂昭良部的行为，并执行地下党的指示，与聂部共同对敌。曾在谷水袭击湘乡自卫总队贺石渠部，并击毙清剿指挥官胡桂卿，在白路湾迎击国民党七十一军彭镗部，在娄底一带截击国民党鲁道源兵团一〇二军等部队，牵制了蒋军疾进邵阳一举消灭起义的企图，在这些战役中，前后缴获人枪千余。

原蒋军五十八师师长龙杰，曾于一九四五年与别动军第七纵队司令陈仕虎组织起义，失效后回湖南开办建筑公司。一九四九年元月，由唐拔介绍参加我们的活动。地下第四军成立时，受军部命令回邵阳，协助地下党策动邵阳境内地方武装起义。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与第一防剿副指挥官尹如奎，县自卫大队长伍厉忠率部起义，并配合地下党领导的伍魁元、李建中等部，组成湘中纵队，以龙杰任纵队司令，因声势浩大，七月六日，在双峰青树坪一带遭桂军纠合两个保安团围攻，经过激烈战斗，到七月九日，因所属匡国军叛变，接应敌军，杀害了尹如奎，两个支队全部溃散，龙杰突围到邵南，继续战斗。

伍长风当时已打入蒋军郴州师管区任桂阳团管区独立大队长，在永兴成立招兵站，公开召集人员，并曾派出部份军事骨干，参加我们在株洲河西举办的干训班集训。我军部成立时，曾

召伍长风来长沙，告知当时敌后武装斗争的任务和要求，任命他为江南地下第四军湘南支队司令，回邵阳积极筹划。不久又派李汭去郴州共同负责，伍长风的爱人谭慕英，我们在重庆时就认识，很有活动能力，她的兄弟谭天民也比较可靠，这时都协助伍长风工作，经军部决定，成立支队政治部，以李汭、谭天民为正副主任。

六月，徐传真奉十二兵团指派由武汉回湖南，侦察南下进军兵要地形，曾到郴州永兴与伍长风、李汭研究布置工作，要他们一面继续增添人员，一面尽一切努力设法取得枪支。因当时伍部作为招兵站，已有不少人员，但武装较少，缺乏战斗力，一定要改变现状，培养一支有力的战斗部队，在解放大军南下时，截击敌军后援部队，迎接解放。于是，伍长风组织班长以上人员，以喝雄鸡血酒的形式，共同盟誓，统一意志，策划打入国民党内警部队霍远鹏部搞枪起义，因与霍部接洽。当时霍部正在郴州桂阳一带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满心欢迎伍部投靠，但对伍又有怀疑，要求伍部到永兴龙兴集中，为达到取得武器的目的，伍长风决定将队伍带去龙兴市，霍指定伍部驻扎在霍部包围圈内，迟迟不发给枪支。

李汭留守在永兴城内，见伍部困在龙兴市，尚未取得武器，一时无法行动。由于距军部太远，联系请示困难，于是，他设法就近与郴州地下党领导的湘南游击队取得联系，并随时与伍长风互通消息，了解情况，研究行动计划。

八月初，湖南和平解放，李汭绕道回长沙汇报请示，解放大军继续南进，在临近安江时，霍远鹏非常恐惧，仓促发给伍长风部队枪支弹药，妄图纠合伍长风据守山区，顽固对抗。伍长风领发武器后，即趁机起义，枪毙了一个霍军团长，缴获数百人枪，带到耒阳大河滩，与湘南游击队会合。接着，郴州地区全部解放，伍长风部按计划交由郴州军分区整编。

部队整编后，对该部工作人员未及时按政策作出安排，伍长风心存疑惧，带两个兄弟，出走香港，其他人员，大多留在原地。

在这一段时间，刘建中与邢文康、罗觉然等人，在长沙加强了活动，建立三一三〇长沙第七总部工作组织，开展宣传，搜集情报，保护公共财物，保存档案，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刘人爵对此作了有力的支持。在白崇禧大搞白色恐怖、外面风声很紧的时候，刘建中等人，有时就住在市警察局内，有几次我们的秘密会议也在警察局内举行。由于刘人爵积极参加地下迎解工作，长沙解放后，竟被特务暗杀。

配合三一三〇的工作，地下第四军也开展了活动。为了加强外围地区的宣传联络和南至衡阳一带的策反活动，曾指派王式凡、谭文伟以潭、衡地区指挥部名义，发动湘潭地区的李德健、罗伯吉、罗汉初等人和醴陵地区的刘楚雄、蒋先余等部，一面按转发的文件口号进行宣传，一面扩大部队或组建武装力量，维护当地治安，保护铁路交通。其中除刘楚雄部曾结合湘东支队在铁路线上打击白崇禧部队外，其余没有战斗行动。

军部正式委派黄政衡为地下第四军驻湘潭特派员和三一三〇潭株支部第一工作组组长，言碧清为副组长，发动湘潭商会进行改选，选出平日思想表现进步的李文祥、冯柏华、刘佩卿等人，组织新的理事会，王翰章为理事长，暗中替地下第四军募集经费，并于当年“五一”节，对军直部队举行劳军活动。配合工会，城区镇公所，组织工商镇联合办事处，团结工友、商户、镇民，以应付环境为名，合力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压榨破坏。还负责控制湘潭城市及郊区地方团队和警察武装，在邻近解放，国民党政府停发经费时，设法筹款维持官兵生活，让他们继续保持城市治安。解放后派黄英浩向四十六军一三八师政治部主任杨亚中汇报，协助接收。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后，湘潭

商会与唐伯寅主持的和平自救会配合，宣传形势，安定人心，迎接解放。七月，旧食盐专卖局，运大批食盐到湘潭，找当地商户，愿以半价银洋四万元抛售，当即由黄政衡及县商会紧急招呼有关商户，一致托词拒绝收受，使敌人套取现金外逃的阴谋未能得逞。

唐伯寅虽对军事起义信心不坚定，但仍愿参加一些活动，他提出打算参加程潜、唐生智等人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我们同意并支持他，以后他取得湘潭和平自救会主任的身份，能公开活动，与黄政衡等人配合，通过各种渠道，散发上级颁布由地下第四军翻印的宣传材料。并曾在民主革命烈士秋瑾之子王重铭的家中，以聚餐会的形式，介绍我与各界士绅见面，得以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起到安定人心，促使这些人为家乡和平解放而努力的作用。解放前夕，徐传真奉十二兵团指派从武汉回来侦察兵要地形并寻求军用地图，我也是找唐伯寅一同向何健部参谋长刘曙初弄到五万分之一的湖南分县详图一全套，转送十二兵团司令部供南下作战急需。

为配合地下武装斗争，策动董家墩兵工厂警卫队长言震凡、田心机厂工人黄登科等人组织人力，配合地下党的活动，保护工厂及附近铁道桥梁。并道过株洲笋业（装卸工）工会负责人言雨梅、易枯生组织工人，拒绝装运一切工矿设备重要物资出境，在接近解放，白崇禧驻株洲代理人紧急催派人工时，几个负责人都离开工会，避居乡下，极力拖延，对敌人的拆迁破坏阴谋，给予有力打击。

军政治部宣传联络员唐光，是唐拔的独生子，在一次审查和教育俘虏来的桂军侦探时露过面，后他去长沙联系工作，在返回驻地时被敌人认出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被敌人用刺刀穿戳两颊，折磨致死，抛尸河中，经白石港渔人打捞安埋，解放后，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一九四九年八月，在酝酿湖南和平解放的同时，解放大军继续向南挺进，八月初进驻株洲。我先到株洲，向株洲市军管会负责人袁福清汇报军部及周士仪、林芝云等部在株洲地区的活动情况，奉指示要各部原地待命，注意维护地方治安，协助解放接收。以后又指派军突击大队副大队长贺光裕，在四十六军联络部长左明领导下，清除匪特，收集地方流散武器，取得一定成绩。

接着十二兵团进驻长沙，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齐一夫副部长来长沙，听取江南地下第四军及三一三〇长沙第七总部活动情况及现状的汇报，将地下第四军的领导关系介绍给十二兵团兼湖南省军区，由肖劲光司令员主持召开江南地下第四军整编工作会议，华中军区刘运石处长，兵团联络部段希远部长，湘潭、益阳、衡阳、邵阳、郴州等有关军分区司令员，地下第四军军部负责人唐拔、张威、徐传真、言乃克及部分师的负责人参加。会上，肖司令员简述了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传达了党对地下武装整编的政策，听取了各师的汇报，进而决定了各部交由各军分区或驻在地的解放军负责整编。并在长沙宝南街拨给一处房屋作为军部办事处，在省军区领导下，配合各军分区，进行全军各地部队的整编，工作进展顺利，共交接整编人枪八千余，其中部份配合解放军进行过短期剿匪工作。到九月底全部完成整编任务。

（原载《株洲文史》第五辑）

回忆湘西事变的前前后后

彭 煊 容 *

事 变 序 幕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参加湖南省参议会后，由长沙回永顺县，途经沅陵县城，便坐小木船沿酉水北上。有一天，到达古丈县的罗依溪，遇上了刚从永顺王村下来的一只小船，船上伙计老远就向我们打招呼：“生意好啊，只是要留神些！永顺城里出了大乱子。曹振亚、李兰初把枪拖到石堤西去了。”我们船上的老板问：“什么原因？”“你到王村就会晓得。总之，不是好事。”“噢，我们这碗饭恐怕吃不安静了。”听了这段对话，我很诧异：曹振亚、李兰初有官不做，真的要拖枪去当土匪吗？

一到王村，我就到处打听，才知道：有人要提曹振亚和李兰初的枪，他俩不愿意，才拖队出走石堤西。他们一面派人到各乡联络，逼着一些乡长把人、枪都集中到石堤西；一方面招揽四围大小股匪，扩充势力。曹、李得知俞英奇（保靖人，曾任国民党广东某师管区少将副司令、广东“剿匪”总司令等职，解放后被镇压）在王村存有两千套军服，还没有运走，他们就派人去抢。

王村非安全之地，同时我急于了解曹、李拖枪的原因，便

* 彭煊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省立八师校长、省参议员，亲身经历了湘西事变，已故。

决定同一群客商去永顺县城。一到城里，我就去找县参议长向乃根、参议员唐纯菁和县中校长符正平、县简师校长邹子宽诸人，他们说，十七绥靖公署为了对付共产党，由常德派彭永立来永顺成立“戡建大队”。彭永立是受过训后派出来的，他来永顺没带一枪一人，要提警察局和自卫总队的枪支，责成县长杨禹九办好这桩事。但是，枪提走了他们还有什么搞头？何况他们是靠这些枪来做本钱，苦心经营才当上官的。枪是他们的命根子，要枪就是要命，他们当然不愿意。这些天杨县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同他们反复磋商，迫于形势，曹、李才勉强答应交出一部分人枪。可是彭永立是×××的嫡系，又是蒋介石的红人，给少了他不答应。终于苦了杨县长，跑来跑去讲尽了好话，才算初步谈好这笔“生意”。这一来，杨县长高兴极了，大摆筵席请双方到县府吃酒，携手言欢。谁料宴罢席散，曹、李一出县府大门就变了卦，把所有的人和枪支弹药带到石堤西去了。

姑 息 养 奸

永顺的土匪很多，历史也久，我幼年时候就听说有个巨匪甘清平坐在羊峰山上，曾出赏要捉永顺的县太爷车虞。后来又出了田少卿、张义清、彭春荣等惯匪，彭春荣的实力最大。一九四三年冬，他的部下一个支队长梁海卿进城掳抢，放火烧了县政府。目前彭春荣虽死，但还有残余势力。我建议专署，电促专员聂鹏升火速回署进剿曹、李。又向杨禹九说：“对付曹、李这些家伙，只有‘打’，姑息养奸，后患无穷。”杨也表示同意，并说马上回龙山找他兄弟去要人。

过了几天，聂专员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收拾曹、李这股土匪一定会有办法。谁料聂专员却慢吞吞地说：“都是好兄弟，趁一时的意气出走，没关系。他们是怕丢了枪做不成官，

我有官给他们做还不行吗？我已派人叫他们去了，他们就要回来的。”听他这一说，我有些不解，他哪里有许多官给这些人做？有一天，我问县参议员唐纯菁，聂专员给曹、李封官许愿有什么基础？唐低声告诉我，专员这次下长沙，捞到了省保安五旅旅长的官职哩！一个旅部该要安插多少人！他要抓住曹、李这股力量做本钱，还怕得不到手，怎么舍得打？

果然聂专员的几声“好兄弟”就使曹振亚、李兰初、周海寰等陆续进了城。他们还留信给我，说对聂专员没意见，只恨杨禹九、彭永立等人。聂专员很高兴，认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一方面委任曹振亚为省保安五旅第一团团团长，其余的人都由曹一一安排到团部；一方面每天打电话向常德十七绥署报捷。不料有一天，这个威名显赫的八区专员、省保安五旅旅长聂鹏升，将保安五旅一团的派令送给曹振亚，当场被他撕得粉碎，次日一早，竟单骑离城，由北门扬长而去。聂鹏升反被软禁在专署里，不许越雷池一步。曹还吩咐人逼着专员照以前一样，用电话天天向十七绥署报捷。这时节聂鹏升才知道：走错一着棋，满盘都是输。姑息养奸，自食其果。

血 酒 结 盟

曹振亚撕毁派令单骑出走后，城里人心惶惶，不晓得他葫芦里买的什么药。有一次吃过晚饭，向乃根、唐纯菁来到我家邀我去见一个人，还说：“是曹振亚请来的，叫汪援华，省保安团长，保境安民是他的责任，同去看看有何不可？”一出门，便得知汪援华等正在杨宏顺布号里商量事情，我们一直走了过去。刚进门，就有人打招呼：“汪团长在二楼。”楼上灯火辉煌，挤满了人。汪援华、曹振亚、周海寰等人见我来了，一齐拥向前来让坐，表示欢迎。我口里打招呼，眼睛却扫望四周，发现楼房正中墙壁上贴有一张大红纸，写着“关圣帝君神位”

六个大字。红纸下面的方桌上设有香炉，两边插上大红蜡烛，又听到嘎嘎的鸡叫声。回头一看，一个勤务兵左手提了一只公鸡，右手拿着一把亮晃晃的刀子。见此景情，我忍不住对汪、曹说：“你们要造反，我可不能陪你们砍脑壳！”说完就下楼。汪、曹见势不妙，抢先拦住楼梯口，一面“参议员、彭校长”地叫个不停，一面忙着解释：这完全是为了打倒统治湘西北人民的绥靖主任，是搞好事、救地方。并说一会儿专员聂鹏升、县中校长符正平都要来，省府人事科长周录芝、桑植县县长冯泉也会来的，他们都在三楼，快去同他们一起谈谈就会明白。在他们逼迫下，我无法出走，便一气登上了三楼。在三楼一眼看到冯泉正伏在桌子的大红纸上挥笔疾书。他听到脚步声，偏头朝我一看，就热情地打招呼，给我让坐后，换了个位子，又继续忙着写。这时我清楚地看到红纸上写的是“誓词”，最后两句是：“若违誓言，绝子灭孙，红炮子穿心。”冯泉写完誓词后说：这次集会的目的就是打倒×××，拥护程潜将军，对湘西人民群众有利等等。当我们下到二楼时符正平校长已到了，看来结盟仪式就要举行。

盟誓前，汪援华、冯泉、周录芝等人先后讲了话。他们说，×××不打倒，地方救不了。为此，我们决定成立领导机构“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运动委员会”，以“打倒×××，拥护程潜将军，改善人民生活”为行动纲领。为了坚定信心，团结力量，一齐向×××开火，今天特邀请诸位聚首盟誓。

结盟仪式开始了，程序进行得很快。全体肃立后，只见唐纯青手捧誓词，在“关圣帝君神位”牌前桌子边站定，另一人抓只大公鸡，拿刀往颈上一割，鲜血直冒出来，盛在桌子上事先准备好白酒的大缸里。等到鸡血滴尽，白酒变成血酒，唐纯青朗诵了誓词，就由汪援华领头，然后到会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桌边喝一杯血酒。喝酒前还得自报姓名和生辰八字。这次盟会

的共六十多人，只有我一个女性。这群人除了汪、曹、李、周以外，还有当时的党团骨干，专署和县府的科长、秘书、学校的校长，八师附小主事，退役的军官，商会会长等等。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风流人物，也都集中在这里凑热闹。

盟誓结束，正要开会议事，忽报：“聂专员到！”为着聂鹏升的光临，大家凑兴又喝了一次酒。

当汪援华问大家对这次建立的组织 and 行动纲领有没有意见时，盟员一致表示没有意见。汪又进一步说：凡参加盟会的，都是反压迫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要推选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来。经一番酝酿，向乃根被选为主任委员、符正平为副主任委员，冯泉为秘书。随后，讨论决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

（一）打出“湘西西北人民反压迫运动委员会”的旗帜，喊出“打倒×××，拥护程潜将军，改善人民生活”的口号，发出宣言，兴师回罪。（二）由汪援华任总指挥，兵分三路进军常德：一是绕山路，经大庸、慈利趋常德；二是沿公路，先到辰溪打劫兵工厂，再顺公路下常德；三是走水路，由王村乘船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后再顺沅水东进，与前两路会师常德，直捣绥署老巢。（三）在进军时，由汪指挥调遣驻桑植的保安团随后策应；走水路的到沅陵县城后，立即挂牌进驻办公。（四）将散居四乡的匪部集结到城里整训，为各路补充兵源。当时我想，这些土匪一到城里就下门板、搬铺盖、翻耙耙、搜腊肉、捉鸡打狗，闹得鸡犬不宁，进了沅陵谁还招架得住？我建议说，走水路的不要进沅陵城，可先写信派代表联系，借道沅陵，迅速沿河东下，各路会师常德直捣绥署。大家也同意不进沅陵城。讨论会一直闹个通宵，散会回家时，天快亮了。

“三·二”浩劫

结盟后不几天，他们为做高官，发大财各自匆匆地把匪部拖

出城作乱去了。

周海寰首先发难，他原是小学教员，在永顺县政府当过建设科长、县警察局督察，在沅陵专署当过汇报秘书。他对沅陵情况很熟悉，因此自告奋勇地当水路前敌指挥。他一面伪造函件，联络沅陵头面人物，“借道”直下常德；一面则鼓励匪徒打劫城池。当时九区专员陈士出巡未归，城防司令邓德让毫不在意，疏于防守。而周海寰则下令只能前进，不准后退，并说打进沅陵城大家有好处。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众匪涌进了沅陵城，他们见东西就抢，见年轻妇女就抓。更有甚者，抓到女学生就强行轮奸。有的银行、商店、住户被抢了一次又一次；溪子口街头一段，没抢到什么东西，就一把火烧成一片瓦砾。中南门对河驿码头的东西抢不到手，就接连不断地开炮轰击。真是人人自危，道路侧目，烧杀淫掠，暗无天日。这就是震惊湘西的湘西事变。沅陵人民又称之为“三·二事变”。

湘西事变给沅陵古城造成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当时长沙的《小春秋》报发表题为“万户千门尽劫灰”的长篇通讯，就是这一悲惨情景的真实写照。

周海寰浩劫沅陵城后，汪援华、冯泉闻讯从桑植赶到沅陵，那时，省主席程潜去南京未回。省府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王劲修惟恐事态扩大，为了息事宁人，即率领九区专员陈士、省参议员双景五（古丈人）到沅陵调处。省方提出只要匪众停止作恶，撤出沅陵，不咎既往，且授以新命。经双方反复协商，问题获得解决。王劲修在沅陵代表省政府指令汪援华为省保安第五旅旅长，冯泉为永顺县县长，因八区专员聂鹏升趁周海寰打沅陵时潜逃，遗缺由双景五接任。这些土匪升官发财，名利双收，就欢天喜地的回永顺县任职去了。只是双景五任永顺八区专员，诸匪首不同意，不欢迎，一直未得到差。

风 波 未 平

冯泉一到永顺，就登上县府父母官的宝座，汪援华把他拥戴为功臣。曹振亚、李兰初、周海寰、曹子西等，一个个都安插在省保安第五旅旅部，我也受聘为保五旅参事。那时，永顺县府、保五旅旅部，求官的，捧场的，人来人往，车马盈门，好不热闹，只有专署冷冷落落。聂鹏升潜逃，双景五未到，由一个职员叫王代琄的窃据专署，指手划脚，俨然也象个专员了。当时有人嘲弄说：“永顺地方就是好，有了三个专员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汪、曹、周自打劫沅陵回来，把大担小担的赃物运进了自己的仓库。有的还抢了小老婆，添人进口，洋洋得意。在永顺祝捷庆功的筵席上，他们互相吹嘘捧场，还说攻打沅陵易如反掌，不是王劲修来得快，常德早到手中，绥署长官必做阶下囚。他们得意忘形，哪管老百姓死活。

不久程潜将军从南京回来，得报永顺众匪借着“拥护程潜将军”的名义，打进沅陵城里，肆意抢劫，就大发雷霆说：

“我是什么人，要土匪来拥护我！？”盛怒之下，即指令省保安二旅旅长周笃恭率领大队人马到湘西追剿众匪。周笃恭受命后，迅速进军，很快越过沅陵，沿酉水进发。汪、曹见势不妙，便叫周海寰火速带人先到王村同周笃恭周旋，随后派人马支援。为了苟全性命，他们同时又想出两条办法：一方面造谣惑众，说：“沅陵人跟周笃恭一起打上来了。沅陵人讲，打到永顺，连睡在窝窝背笼里的小伢儿都要杀光。”笼络部分群众跟他们一起干；另一方面又策划着选派代表赴省，求情赦罪，说是愿意服从政府调遣，不再危害国家、地方和人民。只是找不到适当的人选。他们找来找去，结果找到我的头上了。说我当代表的条件比其他人要好些。程潜将军是我父亲的旧好，省党部

主任委员张炯、省参议长唐伯球、原省教育厅长王凤阶以及警务处长李树森等，有的是我父亲的好友、学生，有的又是我的同学或顶头上司。通过一晚的考虑，我决定不去为好。第一，我曾同汪、曹等人结盟入伙；第二，周海寰打沅陵时假借我的名义写信到沅陵联络过，若冒失前往，凶多吉少。不过后来我还是写了一封信给程潜将军。

我的信发出不久，据报宋希濂来到常德继任了绥靖主任，随后派代表邓礼到西水南岸的乌宿进行调处，接洽收编事宜，这场风波暂告平静。

接 受 招 抚

宋希濂派邓礼到乌宿进行调解时，汪援华致函永顺县长冯泉征求意见。冯泉提出三点建议请汪选择：第一，不接受改编，结集全部人枪到长江南岸，迎接解放军渡江，是为上策；第二，挑选上等人枪各一千，命曹子西率领与宁乡尹立言（时称土共）联合打游击，伺机迎接解放，是为中策；第三，接受招抚，下常德改编，是策之最下者。汪援华决定采纳第三点的建议，受招，下常德，检验改编。当时向克武、李兰初、曹子西也愿意下去。只有周海寰想当永顺县县长，曹振亚托词老母多病要回家奉养。冯泉是汪援华的亲信，邓礼是冯泉的旧好，汪援华要通往幸福的安乐桥，不能缺少冯泉这根桥梁柱。冯泉一走出县府大门，周海寰就立即拥进县府，坐上县太爷宝座，自命为永顺县县长了。

曹振亚是湘西事变的祸首之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曹匪不除，祸无了日。曹振亚不离开永顺老巢，叫人不会放心。听说曹振亚最听母亲的话，他母亲是周海寰的姑母，我在永顺同向乃根、符正平、唐纯菁等人建议周海寰把曹母接进城，先打通曹母的思想，然后说服曹振亚。周海寰同意这个建

议，把曹母接进了城。我们几个人都劝说下常德改编的好处，周海寰又答应承担曹母的生活供养，曹母的思想疙瘩解开了，我们就把曹振亚找来，陈以利害，晓以大义，使曹终于答应了下常德接受改编。曹振亚一离开永顺，永顺到沅陵这条水路随之畅通。我因八师学校受事变影响，一学期未获省款，就随即赴省交涉校款去了。

六月下旬我到了沅陵，九区专员陈士告诉我，绥署最近建立了很多陆军暂编师。湘西事变的主角汪援华当了陆军暂编第五师师长，罗文杰当了第四师师长，沅陵的陈子贤当了第三师师长。常德绥署定于七月一日召开绥靖会议，凡省参议员必须参加。陈邀我一同下常德开会，我也想了解一下开会的情况，就同陈士一起乘车到了常德。

绥 靖 会 议

七月一日，绥靖会议在常德开幕。会场挤满了人，这些人除暂编师师长汪援华、罗文杰、陈子贤外，还有专员、县长、县党部负责人、省参议员、国大代表、县参议长及社会贤达。有的我认识，有的很陌生。周海寰自命为永顺县长，没有资格参加。

这次绥靖会议，本是湘西绥靖公署召开的。出乎意外，广西军阀白崇禧也跑来开会了。他在会上说：“南京失陷，武汉不守，共军目的是要打通交通线、占领大城市。湘西僻处西陲，崇山峻岭，地形复杂，既利防守，又可制敌，用空室清野政策对付共产党，是最好的策略。当年共军北上逃窜，经过广西，曾采用这个策略，收效不小。”并对“空室清野”作了进一步说明和具体部署。只要共产党不到湘西来，是天赐的割据自保的有利条件。但永顺八区尚无专员，周海寰自称永顺县长，不肯离开老巢，若得省府正式任命，满足他的要求，

他必感恩戴德，不再作乱。我同八区的一些人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赞成顺水推舟，保荐周海寰为永顺县县长（我又请示宋希濂，得到宋的同意）。九区专员陈士表示愿意同双景五对调，他有把握到差。周海寰原是九区专署汇报秘书，是他属僚，不会拒绝他的。大家认为这样做两全其美，希望省府会议顺利通过。

大会闭幕，我按计划到长沙领取校款后，首先就给周海寰伪造了一份履历表，送交省府，保荐周海寰当永顺县县长。陈士和双景五也联名报告省府，请求对调，都顺利通过。我用领得的校款，给学校购买了一些文具用品和老师需要的东西，剩下一大把钞票，加上给永顺法院代领的一大把，装了一满箱，双手提不起，我担心这一箱票子变水，就同省银行交涉，折合光洋一千元，汇往沅陵。次日，报载人民解放军已到达浏阳长寿街，省府准备报迁，我就匆匆地回到了沅陵。

到了沅陵，去银行领款，银行推说光洋无库存，嘱我等候，待筹措到手，优先付我。七月过去，八月又来了，解放大军，进军神速。八月四日长沙和平解放，常德、桃源也相继解放。宋希濂沿公路跑到了贵州，汪援华率残匪也逃到了沅陵。这次冯泉没有同来，听说是被共产党捉住了。其他那些陆军暂编师也都土崩瓦解了。

酝 酿 应 变

钱不能取到手，解放军又来得快，我不敢久留沅陵，就搭船回永顺县城。当船靠王村时，就碰到八师一个工友送信，要我切意不要进城，说周海寰已派人驻扎在牛路河，我若过河，就要打死我（事后才知道）。原来前次我在沅陵给周写信道贺时，就讲了如何替他伪造履历书，保荐为县长一事。而周海寰不肯离开永顺老巢的目的，是要当八区专员，县长不过是一

个过渡。眼下陈士调任八区专员，周不服气怪我出的点子。周海寰是杀人不眨眼的，沅陵浩劫记忆犹新。我马上改变计划，同身边一个新聘任的老师回到和平村大井老家去了。

过了几天，陈士从沅陵上来了。他满以为周海寰会派人来欢迎，到达牛路河，周海寰却派大队人马在那里挡驾了。几经交涉无结果，陈把我怪得一脸壳疱。我落得个拔火棍子两头黑。陈没办法，也只好打退堂鼓，回到桑植老家去了。陈士一走，周海寰一下戴上假面具，竟然派人下乡，接我进城开学。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向乃根、唐纯菁、陈若浩、符正平、邹子宽等一大群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前呼后拥地把周海寰从县府接出来，拥进了专署。这时节，他就是我们八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了，真是八面威风。这天大摆宴席请酒接客，好不热闹。我这个前些日子阎王没请去赴宴的角色，此时却荣幸地受到尊重。周不仅亲自给我敬酒，而且还特聘我为专署的顾问。周海寰的这一出戏，演得真“绝”。

周海寰自称专员后，沅陵解放了。暂五师师长汪援华与曹振亚、李兰初、向克武、曹子西、肖仰之等人都陆续进了永顺县城。他们认为八区崇山峻岭，地形复杂，是割据自保的有利条件。他们的应变措施是：一、派曹振亚上湖北恩施找宋希濂，请求接济枪支弹药；二、兵分两路与共军周旋。一路驻扎天险龙爪关，挡住共军从大庸来永顺之路，一路驻扎王村，挡住共军沿酉水北上进城；三、命周海寰固守城防，搞好后勤。随即曹振亚上湖北恩施找宋希濂去了。一些从常德逃回来的残匪，都分编在两路部队阻击共军去了。固守城防的周海寰洋洋得意。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半夜，他宰牛杀羊，在府文庙大吹大擂地举行祭孔大典。周穿着长袍马褂，当了祭官。还说我是“女中英雄”，参加祭典要穿蓝布旗袍。可是未等祭孔的牛羊肉吃完，解放大军已越过天险龙爪关，到达塔卧了。

解放军到达塔卧的消息传到城里后，汪援华众匪和一些党团骨干趁黑夜纷纷逃跑，城里没有军警，周海寰瞬间成了光杆司令。午夜十二点左右，周海寰打电话告诉我，说共军已到塔卧，有些人都溜走了，他本人暂时不走，已命工会、商会联合起来组织维持会，维持地方秩序。他问我想不想走，要走就得赶快。我回答说：“我寿衣都做好了，砍了脑壳碗大个疤，坚决不走。”周说：“不走也不要紧，听说共产党对老师还是好的。”

我听说过，解放军解放沅陵是半夜进城的，不放一枪，不进别人屋，就睡在大门外的台阶上，纪律特别好。天亮了，主人开门才发现解放军来了。因此联想到塔卧离城不远，也许解放军早就进城来了。天刚发白，我就从学校急急忙忙往城里跑，到了东门桥边，碰到县简师的一个工友，叫我去简师开会。当我走到简师，向乃根、唐纯菁、符正平、杨湘、陈铁民等人都在那里。简师校长邹子宽正在张罗笔墨纸砚，大家正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解放军已到塔卧，只有迎接解放才是唯一的出路。商量迎接解放的具体作法是：一面派代表致欢迎函，到塔卧迎接解放军进城，一面购买红绿纸张，写欢迎标语四面张贴，再买大量鞭炮，等解放军到达城边，放鞭炮迎接解放军进城。欢迎信还没脱稿，标语也没写好，小西门外枪响了，大家惊惶失措地说：“怎么来得这样快！什么都不要搞了，快一起跑到小西门桥上迎接去吧。”

沅 陵 受 训

十月下旬，永顺和平解放。永顺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侃召集灵溪镇各中小学教师组织“救人会”，发动老师写信给匪首，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他们低头认罪，赶快进城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争取自己的前途和

出路。我和彭岱云就写了很多信给他们，各校教师也去了不少信。他们迫于形势，先后一个个回到城里。除了曹振亚、李兰初不肯进城外，江援华、周海寰、曹子西、向克武、肖仰之、符泰乾等都来了。人民政府首长对他们慰勉有嘉，鼓励他们认真学习，认清形势，丢掉幻想，争取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他们也赌咒发誓：一定靠拢党，靠拢政府，靠拢人民，戴罪立功，以赎前愆。政府高兴，人民欢迎。

人民政府本着要把他们改造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的，于一九五〇年，在沅陵举办了“和平军官训练班”。

他们一报到，就发给新衣服，开中灶，天天有鱼肉吃。除上课听报告，下课小组学习讨论外，搞点轻微劳动，只要人到场，搞多搞少不计较。课余时间，还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在沅陵有亲属和朋友的，还可以探亲访友。一九五〇年暑假，我在湘西行署举办的中学老师进修班学习时，还看到他们。他们对我说，回顾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胜惭愧，对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今后一定要立功赎罪，图报挽救之深德大恩。看来他们好象有悔改的表现了。

（原载《湘西文史资料》第一辑）

一九四九年冬黄杰入越纪实

老兵*

黄杰，字达云，湖南长沙县东乡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现年八十六岁。一九四八年之交，任国防部次长。当时淮海战役败局已定，蒋介石嘱总统府保密局长毛人凤电令湖南省军管区中将督导专员李精一赴京陛见（我同往），授以国防部第十四纵队中将司令的重任（我任纵队司令部少将代理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黄杰与李精一既是黄埔同学，又曾在中央训导团同事，加上是湖南同乡，素有交往，感情融洽，于是面嘱李精一，从速回湘成立第十四纵队，兵粮由湖南省政府照拨，装备由国防部解决。这样做是因为蒋介石、黄杰等人对湖南省主席兼湘赣绥靖总司令程潜有所怀疑，故命亲信李精一回湘成立新军；另外在长沙、郴州等处，成立两个交警总队，连同当时驻在株、衡一带的以成刚为首的一〇三军，共同在暗中监视程潜的活动。

1948年冬初，李精一由南京赶回长沙，晋謁省主席程潜，请拨兵粮在湘成立十四纵队，而程潜早在竞选副总统问题上，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且知蒋介石末日将至，遂暗地拥兵自卫，反对蒋介石在湘征兵征粮。因此对李精一的请求当面婉言拒绝，并力劝李精一放弃国防部十四纵队番号，出任即将成立的湖南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保安第一师师长，李精一也当面婉

*老兵原名李中兴，曾任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冬曾随同黄杰一起去越南。

辞。随即乘车返回洞口家中，找来湖南各地故旧会商，收集散兵游勇和一部分股匪、帮会徒众，约经月余时间，草草组成第十四纵队。纵队司令部驻洞口，下辖四个师，第一师尹立言部，驻武冈；第二师向承祖部，驻龙潭、山门等地；第三师吴人美部，驻溆浦大江口等地；第四师李中兴部，驻邵阳、绥宁等县。同年底分别电呈总统府、国防部备案。

一九四九年春初，黄杰偕同其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秘密由京至衡阳，并派专员来洞口接李精一去衡开会。会后李精一极其神秘地将会议的内容告诉了我：与会人员只有黄杰、邓文仪、白崇禧、袁守谦、成刚、李精一等。会议由袁守谦主持，白崇禧作出指示说：“已得蒋、李总统的同意，为着稳定大后方，我预谋于湘、鄂、赣地区以桂系部队为主力，其他部队为辅助，在南下共军到来之时，用最新式的美制化学武器，围而歼之，乘机反攻，收复武汉。把共军赶回江北去，以充实和谈的资本，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同年三月，湖南省主席程潜秘密派遣省府大员黄甲（邵东人，和李精一是金兰兄弟）回邵阳，串通当时较为进步的邵阳专员兼第六区保安司令魏镇和副司令唐志才等到洞口与李精一密商，软硬兼施，使李精一接受程潜的意见，将国防部第十四纵队换上湖南省雪峰山区指挥部的番号，部队一律就地改为湖南省雪峰部队。程潜、李精一联袂向华中长官公署和国防部备案。

当时，蒋介石虽下野蛰居溪口故居，据毛人凤给李精一的电文中透露，蒋的下野是权宜之计，实正大力向美国求援，以利阻止共军渡江。时美总统杜鲁门一则深知蒋政权无能，已无可救药；二则慑于舆论界不准各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正义呼声，故对蒋介石的求援置若罔闻。

同年八月初，人民解放军南下至湘境时，程潜和陈明仁将

军起义，宣告湖南和平解放。这一举动加速了蒋政权的土崩瓦解。据黄杰给李精一的电文中得知，当时在广州的李代总统和阎锡山行政院长、顾祝同国防部长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并请示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任湖南省主席兼湘赣绥靖总司令、全省保安司令、第一兵团司令，指令湖南境内所有兵团以下部队均归黄杰指挥调遣。与此同时，国防部派出空军，飞临长沙、湘潭、邵阳等地散发传单，投掷炸弹，吓唬和煽动起义部队的官兵，要他们迅速脱离程、陈等的指挥，返回国军部队，并给予升级和重赏。

于是黄杰由广州飞赴邵阳，出主湘政。下车伊始，即着手安排湖南省政府和湘赣绥靖总司令部主要人员。因原第一兵团所属第十四军第六十三师汤季楠师长已率部随程潜起义，乃将湖南省雪峰山区指挥官李精一调任第十四军副军长兼六十三师师长；雪峰部队参谋长兼第一支队少将司令李中兴调任六十三师少将副师长；所属雪峰山区部队一半改为六十三师的部队。又原湘西纵队司令戴文亦率部随程潜起义而去，遗缺以原湘西纵队副司令李秉纲升为少将司令兼邵阳警备司令。原十四纵队第一师少将师长尹立言，曾任改编后的新八军代军长，时请准国防部任为新八军中将军长。原雪峰山区指挥部副指挥官向承祖，调升雪峰山区少将指挥官。原邵阳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魏镇已率部随程潜起义，即以原邵阳县县长丁廉升调为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据当时湘赣绥靖总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蒋思痛（才学兼优，是黄杰的智囊人物，素以师事之，此时实际上兼任黄杰的秘书长）告我，黄杰临危受命，故匆匆安排了主要人员之后，即召集湘赣绥靖总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蒋伏生（黄杰的老同学，私交颇厚），高参兼外文书文星之（留美博士，系黄杰的智囊人物）、第十四军中将军长成刚（黄杰的老搭档）、蒋思痛等四

人密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暂时保住湖南半壁，加速征兵征粮，扩建新军，以期偏安云贵。翌日（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上午十时许，白崇禧、袁守谦秘密由衡阳来邵，与黄杰密谈（袁守谦、黄杰、成刚、李精一为蒋介石的忠实部下，与桂系白崇禧同床异梦），目的是为黄杰打气。白崇禧曾对黄杰吹嘘说：桂系实力甚强，桂省原是“全民皆兵”，只要能保住湖南半壁，桂省是可靠的反共复国基地。并满口答应黄杰的要求，愿调部分桂系军队到邵支援。当日十二点后，白、袁即返衡阳。

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白崇禧抽调所谓桂系“铁军”第三兵团张淦的第七军，以极诡秘的行动，星夜兼程沿潭宝公路向今双峰县青树坪等地疾进，其目的是妄图追回起义后仍驻守在青树坪、永丰镇一带待命的伍元恺保安旅三个团的部队。这一阴谋，早为我南下进入湘北的解放军首长所掌握，一方面，电令何元恺旅迅速撤离防地，开到浏阳集结待命；一方面派了一支能征善战、进军神速的解放军赶到永丰镇、青树坪等地，接防何元恺旅驻地。当先头部队侦知桂系第七军已接近青树坪时，解放军即抢占了永丰镇和青树坪之间的蔡庄后面的群山制高点，控制、监视青树坪至永丰镇潭宝公路侧的丘陵地带和广阔田野垅岗。桂系第七军却毫无察觉，仍沿潭宝公路向永丰镇疾进，解放军以密集的枪弹将其先头部队全部歼灭。此时“铁军”的头目们方知解放军已从天而降，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向解放军展开猛攻。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铁军”仓惶逃去，退守青树坪一带。

蔡庄战斗甫告停止，白崇禧、黄杰等人却吹嘘说打败了解放军。后方的报纸，也制造谎言，庆贺“青树坪大捷”，“解放军损失惨重”。特别是在华中长官公署参谋长袁守谦授意下，黄杰命省政府拨出部份款项，并飭属动员直属各机关、湘赣绥靖

总司令部和兵团司令部各处室及邵阳专县各界捐献财物，组织慰问团，煞有介事地赴青树坪前线劳军。

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一支解放军由鄂西入湘，迅速解放了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并打算一鼓作气解放湘西重镇芷江。同时在辰溪分兵一支，由溆浦经龙潭司向洞口、武冈疾进，意在将盘踞邵阳的黄杰兵团及其所属各部围而歼之。

当时，黄杰驻在邵阳。我和李精一均赶到邵阳开会，研究兵力部署问题。会后，黄杰把李精一留下，陪他审问禹治、李萼等叛变投案的过程。会议决定：总司令部设前线指挥所于石下江，蒋伏生任总指挥；李秉纲的湘西纵队守洞口；成刚的第十四军军部设于桃花坪铜盆江；十四军张用斌的第十师守山门；夏口长的六十二师守武冈城；因兵力不足，将李精一的六十三师以苏值纲为团长的一八八团调去武冈，归六十二师指挥，加强武冈的城防；六十三师肖豪的一八七团守竹篙塘；李精一率袁锡权的一八九团及李中兴兼的补充团驻石下江，为总司令部前线指挥所的预备队，副师长李中兴兼负前线总指挥所的警戒责任。

一九四九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晨，由江口向武冈挺进的解放军先头部队和防守洞口的湘西纵队开始接触，战斗时紧时松。坚持了两昼夜，湘西纵队被击溃，而衡阳又告急，黄杰始觉援救无望，西经雪峰山走芷江，因入黔之路被截断，乃于中秋之夜返回。他命令湖南省政府、湘赣绥靖总司令部、第一兵团司令部及邵阳专署全部人马，从黄昏开始连夜抢渡资江，向桃花坪集结待命。石下江前线总指挥所人员亦连夜逃到桃花坪。原在竹篙塘防守的第六十三师肖豪的一八七团即乘机于中秋节翌日上午八时许全团临阵起义，去向不明。拨归第六十二师指挥的防守武冈城的苏值纲一八八团，此时电讯也告中断。李精一和我密商后，即集合师直属部队和两个团于农历八月十六上午十时许撤离石下江。我率部先行，李精一继后，打算迅速通过

山门，翻过大山到溆浦境内，找到以向承祖为首的雪峰山区指挥部，一起宣布起义。詎料甫抵山门，即被张用斌的第十师哨兵喝住，传达黄杰命令，任何部队或个人一律向桃花坪撤退。我只好立即率部转向桃花坪，并将上述黄杰的口头命令边走边传达下去。下午通过桃花坪继续急行军，当晚宿龙头铺。这时接到军部命令：我师为全兵团的后卫。李精一告诉我，禹治、李萼等投共未成，于中秋节晚上被黄杰下令处决于邵阳。

黄杰自中秋节率部连夜撤到桃花坪后，下令将所有逃到桃花坪的公用车辆及其他携带不动的军用物资尽行烧毁。此时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在逃亡途中，强拉民伕挑运行李，夜宿时，有的偷鸡摸狗，有的乘机打劫，行同土匪。民众不堪其扰，恨之入骨。也有乘黑夜整班整排拖枪逃走的。

黄杰由邵阳侥幸脱逃到桃花坪，再由桃花坪南向新宁撤退时，身着士兵服，不敢骑马，夹在残军中步行，在新宁回龙寺宿营时，黄杰召集少将以上将领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衡阳战事吃紧，难以固守，残军如由回龙寺经东安沿湘桂线入桂，有可能遭遇解放军，被其吃掉；只能派少数非战斗人员前往探道。会议决定：大部队及其他所有人员，一律各带炒米，途中不宿营、不煮饭，尾夜由回龙寺往东，进紫云山沿山背脊南向的一条羊肠小道直奔东安和全县接界的黄沙河铁桥，后卫改为前卫。我担任前卫的前卫；袁锡权为后卫。经半夜一天的战备急行军，终于进入桂境。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黄杰自湘率部抵桂境后，即率其少数警卫人员及部分幕僚，乘守卫黄沙河的桂系四十四军的汽车去桂林，其余所有残军，徒步经全州、兴安到灵川县去桂林。以成刚为首的第十四军，则驻灵川待命。黄杰在桂林干了两件事：第一、奉命裁撤湘赣绥靖总司令部和湖南省政府、湖南保安司令部，将上述部府所有员兵，除并编到第一兵团部外，其余整编

为第一兵团干部教导团，后并入华中长官公署突击第二总队，均由黄杰指挥。在整编中黄杰给蒋思痛、蒋伏生每人暗地发了光洋一千元。其他如少将处长唐光辉、少将特务团长刘子钦等，每人也得了五百元光洋。第二、整编所部的残军。（一）因夏日长的第六十二师全师在武冈城郊被消灭，于灵川重新成立，以丁廉任少将师长。凡属逃到灵川的邵阳专署及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的残余地方团队人员，一律合编为六十二师一八四团，将六十三师袁锡权的二八九团拨编到六十二师为一八五团，袁锡权任少将副师长兼团长（部队去了，但袁锡权本人不愿去，未就任），抽调第一百军的某部中的一部分，改编为六十二师一八六团。（二）李精一此时率六十三师残部移驻桂林整补。将第八十七军以黄震为首的一个总队拨到六十三师编为一八七团，以黄震为上校团长。以苏值纲为首的六十三师一八八团在武冈被消灭（苏值纲本人侥幸脱逃到桂林，黄杰并未查明其原因，视他为路人，不予理睬），即以本师李中兴的补充团，改编为一八八团，以袁锡权任少将团长。以黄杰胞弟黄英的第十四军警卫营拨归六十三师，扩编为一八九团，以黄英为上校团长（听说现在台湾任师长）。以陶富顺为首的某军二千余众，由湘逃到桂林，被编成六十三师补充团，即以陶富顺为少将额外副师长兼补充团长。（三）少将高参刘子钦，调任兵团部少将警卫团长。（四），此时第一百军残部陆续逃到桂林，并编为一个师，以李某为师长（忘其名，军校第八期的）。（五）以蒋当翊的九十四军（隶属到第一兵团），因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极想补充，苦无兵源，白崇禧予以支援，从桂北纵队抽调数千官兵予以补充，又将湖北、江西的陆军监狱和感化院的二千余众拨补到九十四军。（六）第七十一军也有一部分由湘逃到桂林，和十七军的一部分均拨归李秉纲的湘西纵队。是时，在桂林拼凑整补后，黄杰的第一兵团约有四万之众。

大概在同年十月底，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迫近桂境，白崇禧和袁守谦等华中长官公署少数负责人，率桂系一七二师部队，分批由桂林乘机逃往海南岛（当时驻海南岛守军最高将领是薛岳）。听说白崇禧离开桂林前，李宗仁曾率顾祝同飞到桂林与白崇禧、黄杰会商一次。其内容要点：（一）鉴于云南省主席卢汉有异动，拟定由第十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云南人）率军由桂经黔入滇接替卢汉，主持滇政，将卢汉调中央。（二）所有由湘逃入桂省部队，能经黔入滇更好，否则，只好由防城、钦县乘轮船入海南岛，届时轮渡船只、舰艇可能不敷应用，则假道越南北部经海防乘轮到海南岛。这样，就必须立即设法与原派在越南工作的要员武鸿卿（越南人，原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要职）取得联系，通过武鸿卿与驻越的法殖民军总督交涉谈妥才能入境，此事是否属实，虽无更多证据，但黄杰千方百计找武鸿卿联系则是事实。

黄杰率部由桂林到达柳州十余天后，听说一支解放军由湖南绥宁经龙胜入桂，其目的可能是迂回围歼柳州、桂林等地的国民党军。黄杰奉命急令第十四军第六十二师和六十三师是夜驰往柳城方面堵击。李精一因病不愿去，诿责于我。我当时不愿率领新集结的乌合之众去送死，请求成刚军长另调他部上去。成刚以黄杰指定命令为口实，不肯更换。叫我自己去见黄杰总司令，我只好面求黄杰两点：（一）请求立即补充全师所需各种轻重武器；（二）新补充凑来的部队，至少给予三个月的整训，才能上阵。好在先已得到兵团副司令王天鸣、蒋伏生、蒋思痛等的同情和支持，加上当时黄杰本身想保存实力，但又迫于上命，不派部队上去堵击不行，结果，我率六十三师南开迁江南岸，接替张用斌第十师的防备，整训部队。这样，时间上耽误了约半个月，未等第十师赶到前线，六十二师在柳城悉数被歼，无一逃回，丁廉下落不明。

同年十一月下旬，解放军分数路入桂。我师开到迁江南岸接防不久，虽增架了简易浮桥，仅能渡人马，车轮辘重无法通过。而解放军追击神速，南逃残军涌到，将浮桥全部踩断，我师就未等命令，随乱军一直逃过南宁，才追上本兵团的部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到达明江。黄杰用电话征求上校团长以上人员的意见：“入滇还是入越？”我只好回答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去何从，唯总司令之命是听。”由明江到镇南关（友谊关），徒步只要半天可到，不知为何，又由明江改走隘店，将陶富顺一个团留在明江为后卫。后来听说全团被歼。十二月九日，我们到达隘店，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点，解放军从东面追击的部队与我一八七团的部队在那蓬村发生战斗。全兵团于当天夜晚十二点开始分五百人为一组，成二路纵队进入越北乐平县境，我率部于十二月十三日黎明时进入越境乐平县。黄杰率第一组于是夜十二点入越境，听说法军派小车去接，十三日便乘飞机到西贡法军总部去了。

（原载《邵阳市文史资料》第五辑）

八十年瓷业生涯自述

荣庆祥*

涉足瓷业

一九二二年，我出生于醴陵南乡清水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七人，我最小。全家节衣缩食，供我读了六年私塾。十二岁丧母，无钱继续读书，辍学务农，并随二哥学漆工。十七岁时，经三婶的姨侄彭庭芝（“湖南瓷业学堂”陶画班毕业）介绍进“湖南瓷业公司”，师傅贺少卿（“湖南瓷业学堂”模型班毕业），从此走上了瓷业的道路。

当时的“湖南瓷业公司”是清政府派熊希龄来醴陵办的，是官办的性质。该公司设有一所“湖南瓷业学堂”，聘请了日籍教师六名，招收学员六十多人。学制有两种，一是三年制的速成班，一是六年制的永久班。因日籍教师聘约期满（均为三年）回国，实际上都只办了三年。

“湖南瓷业学堂”设三个班，即：图画、辘轳、模型，每个班均由日籍教师主教。有的教师非常保守。有一位叫安田胡子的，教图画兼制颜料，他配颜料时，总关着门不让别人看，只有学员李仕云因给安田送用具，才学了一点配方，其他学员只能从楼板缝中偷看。

学员们边学艺边生产，所生产的瓷器皆仿东洋瓷，以茶具、醴塑为主，老百姓称“湖南瓷业公司”为“洋瓷局”。从

* 荣庆祥现年九十四岁，一九三一年任宝华玻璃厂瓷器部工程师，后创办精勤瓷厂。建国后，曾主持北京人民大会堂日用瓷和宴会瓷的泥釉配方，是我国工业瓷制作的开拓者之一。

这时起，醴陵开始生产细瓷。

当时“湖南瓷业公司”生产工艺十分落后，纯系手工操作，且制瓷泥骨系一土成型，没有多土配方。泥料主要采用东乡浏山王家排泥。釉料所用原料主要为谷糠皮、熟石灰。成瓷釉面为青白色（灰釉）。

公司建有正窑三间，每间长约两丈多，宽约八尺，一个圆烟囱（当时称鱼塘烟囱），一张窑门。燃料为松柴（一般不劈开）。当时倒窑事故频繁，火前常倒几行，损失很大。

官办“湖南瓷业公司”因为技术没有过关，设备也很简陋，生产出来的瓷器正品少，色货（次品、劣品）多。出窑时，窑坪里放个麻石墩，凡缺陷大者，都丢到石墩上打碎，以免出厂丢丑。加上产品单一，多系茶具、雕塑品，销路不广。这样一来，据说只三年就亏损了四十八万块银元，加之日籍教师聘约期满离去，熊希龄办不下去了，只得辞职而去。

熊希龄走后，掺进了部分私人资本，仍称“湖南瓷业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官商合办性质。公司聘师于江西景德镇，改产圆器、琢器（当时称“镇瓷”）。原“湖南瓷业学堂”毕业的学员，大都感到前途无望，另谋出路，陆续离开了公司。我随师仍在公司做工。此时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由于经营较好，基本上不亏本，商人亦和它签订了承销合约。公司收取承销押金（每户一千银圆），这些押金成为公司部分流动资金，扩大了业务。“邹益顺瓷号”是公司第一个承销处，后来这样的承销处发展到十来个。

至此，醴陵瓷业已经能生产圆器、琢器、辘轳器、模型器，并有釉上、釉下彩绘，能生产各种民用瓷器了。一九〇八年的武昌展览会，一九一〇年的南京劝业会，一九一二年的巴拿马博览会（老百姓称“万国”会）和意大利展览会，醴陵的细瓷均参加了展出，获得好评。尤其在巴拿马博览会和

意大利展览会上，获得优等奖和特等金牌奖。此事轰动全城，大家抬着金牌、奖状，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游街庆贺，盛况空前。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给欣欣向荣的醴陵瓷业带来了一场横祸。一九一八年张作霖、张宗昌火烧醴陵，“湖南瓷业公司”损失惨重，被迫倒闭，我也因此离开公司返回家中。

初 见 成 效

一九一九年游先礼、傅道会、邓光启、谭克钦、文星楼等人合伙租用“湖南瓷业公司”地皮，修复残存的厂房设备，开始恢复生产。此时，我亦到该公司做工。

一九二四年，原“湖南瓷业公司”学员袁大春、刘姓愚、邓光启、王荣国等人在城东桂花桥（即巫家湾）开设“第一模范窑场”，建阶级窑一座；因资金短缺，又增加了一些外行股东，这些股东中黎树轩出资最多，当了厂长。后因他不懂瓷业技术，又排挤有技术的刘姓愚等人，故发展不大。是时我也到了“第一模范窑场”当工人。刘姓愚因受排挤，于一九二六年愤然离开“第一模范窑场”，他破产（卖掉田数石）与其兄刘耀根、刘慰愚；刘作新于巫家湾另建“第一烧窑场”。他们建了一座阶级窑（仿景德镇窑炉），共有大小器火位一二八丈（大器折成小器火位计算）。自己不制坯，将火位全部出租。每丈火位收烧窑费（当时称松柴费）银圆一元八角，另收银圆十元作押金。该场火位较多，能容纳二十余家专做瓷坯的搭烧户。我也从“第一模范窑场”辞工出来，租了“第一烧窑场”二丈八尺火位，与妻子共做瓷坯。

在我跟贺少卿学徒时，他经常同我讲起日本师傅封锁制瓷技术，我非常气愤，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把技术学到手。这时自己制坯，不受老板限制，可以放手钻研制瓷技术。我对醴陵各地瓷泥进行烧制试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开始改

“一土成型”为“多土配方”。我生产出来的瓷器比别人的色面好，不易变型，不少搭烧户都使用我的配方。这时醴陵的细瓷业，无论圆器、琢器、还是图、辘、模三班，都云集巫家湾，盛极一时。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爆发，日本瓷不能进口，醴瓷销路扩大，不但在省内畅销，还远销东北、华北，搭烧户家家盈利。老搭烧户不断扩大，新搭烧户不断增加，几年时光，巫家湾这个地方再也容纳不下了。

一九三〇年，曾德启、陈开生、黄肇云、吴瑞扬（人称“四大金刚”）开始在中和建厂，后来吕星垣、屈春生、李金生也在中和建厂，还有肖方泽在黄泥坳，刘德昌在浏山先后建厂，另有“改良公司”设在东堡。这时仍是建造阶级窑。以前建窑全用耐火泥（匣泥）烧制的“白砖”，成本很高。为了降低建窑成本，有的厂则掺进部分土砖，“白砖”仅用于承受较大压力和窑温很高部位（如冷火间、窑垛、窑脚等处），其余部位改用土砖，只在其上刷一层耐火泥。这样建成的窑炉，也可烧上百次。这时醴瓷虽较镇瓷价低百分之三十，但因原材料价低，且就地可取，加上建窑费用低，仍有利可图，开窑厂的人也就多起来了，到三十年代初发展到二十余家。

探索长石质釉

我在市场上见到日（本）瓷、镇（景德镇）瓷釉面洁白，远远超过醴瓷。我想中国人不比外国人蠢，醴陵人不比景德镇人智力差，为什么不能赶上和超过他们呢？为了争这口气，我茹苦含辛，奋斗了十四年，前后试验四百余次，才使醴瓷由青转白。

一九三〇年秋，经彭尉福（德丰昌陶画店老板）介绍，我认识了长沙宝华玻璃厂经理肖丽生（又名肖泽，大学文化，解放后曾在省工业厅工作，已故），他带来日本茶具要我仿制。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就试制出注浆茶壶，颇似日瓷，肖很赞赏。以后肖常与我长谈，他多次谈到：“谷米、五金、纺织、瓷器，人人需要，除粮食外，瓷业是第三等工业，要设法把瓷器搞好。”有一回，他与我闲谈，感慨地说：“玻璃制品的质量上得快，只十余年历史，就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醴陵细瓷搞了二、三十年还是青色，上不得条箱（条箱是当时长沙的嫁女用品，木质。箱内放陪嫁物品，其中有玻璃制品、瓷器。瓷器都是景德镇的，醴瓷色青未能用上）。我是做玻璃的，你是做瓷器的，要是我们一起合作，想必有贡献。”他这话与我早想改进醴瓷，赶超日瓷、镇瓷的愿望一致，很合我的心愿。于是，在一九三一年，我正式受聘于当时长沙三大厂之一的“宝华玻璃厂”，担任该厂新增设的瓷器部的工程师。聘期为三年，工资每月银洋七十元（其中技术津贴三十元），外加伙食补助八元（当时银圆一元四角可购谷一石）。

这年六月，肖从上海搪瓷厂购回一吨长石，其产地在东北奉天（镇瓷色白，配方极保密，外人询之，则谓加了“釉果”，其实“釉果”即长石的讹称）。那时，日军入侵东三省，长石来源断绝。我看了样品，发现我在研制新瓷坯时，在攸县也发现了这种东西，于是马上告诉了肖经理，他听了很高兴，说：“我搞了四十年工业，还没有见过湖南长石，明天你就去看看。”第二天我带漆湘南同行，在攸县湖沙垅找到了长石，即捡回两麻袋运到长沙。肖急于验证，当晚就停下一只坩埚（一只坩埚每晚造玻璃可获利五十块银圆）试烧样品，第二天清早他就高兴地将结果告诉我，说：“荣庆胡子（我的浑名），长石真的被你们找到了。这对做瓷器的，好比厨工师傅找到了盐，醴陵瓷业大有希望了！”

当时，我们在攸县发现的长石，虽方圆数十里均有，但分布零零星星，尚未找到可供开采的矿藏。于是我又第二次来到攸

县，发动当地老百姓报矿。规定凡送样品来的，付给每人每天工资银圆五角。这样，送样品的络绎不绝，终于找到了有大长石矿的正龙口。谁知不到一个月，这事被攸县土匪头子罗定知道了，借口运长石的土车子压坏路基，提出要介绍百把人来矿做工，不然就不准开采。经多方协商，最后由罗定介绍一个姓易的人来当矿长，每月工资银洋三百元，他从中大捞一把才算完事。后来又从丁字湾（地点在邻近长沙的望城县境内）运来的石英上发现长石苗头，又在丁字湾找到了长石。这里运距短，每吨长石可减少运费十余元，于是将攸县长石矿放弃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开始了长石质釉的试制工作。首先，我把长石粉制成釉，烧出的瓷器虽又白又亮，但全是碎瓷（即“釉惊”——釉龟裂）。过去使用“灰釉”，瓷色虽不好，但无“釉惊”。为了取两者之长，我开始在长石中加入制“灰釉”的主要原料“釉泥”，加入量由少到多，直到加入釉泥十七份时（即十份长石，十七份釉泥），“釉惊”毛病止才，但瓷色又不好，且火度高，出现“未火”（未烧熟）瓷。故只得走回头路，逐渐减少釉泥的加入量，并加入少量的炼糠头灰（即每百斤糠头加七十斤石灰一起烧制的灰）。经百余次试验，才出现少量色面可与镇瓷相比的好瓷。这时已是孟冬时节了。我拿这么高的工资，半年出不了成果，不知遭到了多少白眼，现在好了，总算拿出一点东西来了。肖丽生经理是知道科研工作的甘辛的，他鼓励我说：“景德镇的瓷器唐朝就有，中经宋、元、明三个朝代都是碎瓷，直到清朝初年，集中了金、银、铜、铁、锡五金工人一起研究，‘釉惊’才稍止，到乾隆时，景德镇的瓷器才盛极一时。他们搞了三个多朝代的‘碎瓷’，我们才搞半年多，就取得了成果，你说快不快？要我说是够快的了。”又说：“荣庆胡子，办工厂，兄弟亲戚朋友都要办得仇，才有希望。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从前有个瓷器发明

人（当时他讲了姓名，现在不记得了），他家有田产数十石，家境还算宽裕。他一心想做出好瓷器，又老是做不好，爽（不光面）、裂、烂极为严重，亏损大。只几年工夫，田土卖光，只得告贷于亲友，直到借贷无门，人称‘败家子’。有次瓷坯做好了，无柴烧制，他就把红漆家具劈了做柴烧。亲戚出面阻止，他说：‘你们不要阻我，我的斧头不认得人！’人家都说他疯了。烧完窑后，他往床上一躺，第二天一清早出窑，尽是好瓷器。此事一下子传开了，亲朋戚友都拢来凑钱办厂，终于把瓷器搞出来了。所以说办工厂，亲兄弟都要办得仇，才有希望！”他讲的这故事，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试制新瓷工作中，每遇到困难，想起这故事，劲又来了。

一九三四年，“宝华”聘约期满，我返回醴陵，用积存下来的三千余元（在“宝华”工作的工资及家中做搭烧的盈余），并集资一千二百元，于仙源桥建“日新”瓷厂。厂建成后已无任何流动资金，开不了工。股东见此，要求退股，但已建成厂房、窑炉，成了固定资产，股金无法退出，真是困难重重。

那时我身无分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解决日食问题，我妻石青兰只好养猪种菜卖，我也只得四处寻零工做。碰巧高背冲（现淦江乡江源一带）建庙宇会仙宫，将我请去雕塑菩萨（我有雕塑及漆工技艺），在这里搞了半年，雕塑了五尊菩萨，以所得工资养家糊口，渡过了难关。

一九三六年，我邀集瓷工黎永乾、左新开等人，集资千余元（每股五十元，有几人为两股）开设“劳资生产合作社”，胡正元任会计，我任经理，议定半年不领工资。原“日新”厂房租给该社，我另做一点搭烧。当时取名“劳资生产合作社”，是因为股东均系瓷业工人。后县政府横加干预，谓与“巴黎公社”近名，故一年后改为“劳资瓷厂”。两年后，才将“日新”所集股金一千二百余元陆续退清。一九四八年该厂分为两厂，我自建厂于仙源桥，

更名为“精勤”，前后共计十二年。在此期间，我对长石质釉的试验从未间断。即使在会仙宫塑菩萨那半年，晚上回到家里也要搞一阵子试验。我的全部心思都用在振兴醴陵瓷业上去了。

那时搞试验，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说来可怜，我是拿长石放在乳钵里慢慢地研磨成极细的粉末，每天只能加工六市两（十六两为一斤）。试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釉标试验。用配方泥捏成二指宽的小锥状物，再上釉，泥骨和釉上均标上试验号码，放在窑内不同火位的匣钵内烧。第二阶段为成瓷试验。将新配方坯放在窑内不同火位上试烧。第三阶段为整窑试烧。我在长石质釉试验过程中碰到最大困难仍是“釉惊”，又称“冷惊”，往往空喜一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还是不断坚持试验，有一次配方（编号二三七），从不同火位试烧情况良好。做成瓷（三十个牛奶盅）试验，瓷质很白，又未发生“釉惊”，我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于是决定进行整窑试验，想不到又出现了“釉惊”。我想为什么同一配方放在不同窑次烧制又会产生不同结果呢？为此我反复思考，多方分析，认定这是由于不同窑次的窑温不完全一致，而釉的温差范围是一定的，当釉的火度适合窑内温度则不产生“釉惊”，窑内温度超过了釉的温差范围就会出现“釉惊”。当时没有仪器，窑温是靠肉眼观看火的色度来掌握的。这样一来，釉的温差范围过窄便不能稳定生产。为了增大釉的温差范围，我再次调整配方，结果好瓷多起来了。直到二六九号配方，才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釉不易沉淀，烧制温差范围广（ 1280°C — 1400°C ），保险系数大，烧制的瓷质“白如玉”，美观精致。至此，我前后试验了十四年，经四百余次失败，始获成功，因命名“二六九”釉（在“宝华”试验次数除外），以资留念。从此，醴陵瓷器用上了“长石釉”，与镇瓷比翼齐飞，平分春色了。

为了适应批量生产的要求，解决原料加工问题，我厂随后

在丁家冲（现枫树塘）附设了两个小球磨，用水力推动，四天四晚就出釉一百二十斤。

解放前夕，我厂生产的瓷器“白如玉”，虽然价格高于一般市价，仍供不应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全县瓷器实行统购包销，价格统一，我厂生产的瓷器仍高于一般价格的百分之五（国营收购机构“土产公司”定价）。

一九五三年，我到地方国营醴陵瓷厂（现渌江电瓷电器厂前身）工作后，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花费十四年心血的长石釉配方。随后在陶瓷研究所建立时，我儿荣兆文帮助该所配料，再次公开了这一配方。尔后，此釉配方陆续推广到全县各瓷厂，沿用至今。

改进“紫金釉”

早在三十年代初，我在“宝华”工作期间，见到美制电瓷，釉面为“紫金釉”（俗称棕釉），为慈姑色，远比我在醴陵市场上见到的其他棕釉（带红黄色）要好得多。为此，曾萌发改进之志。

一九三七年，山东杨发传工程师经肖丽生介绍来醴，与我长谈两天两晚，交流瓷业生产经验。在交谈中我提到“紫金釉”问题，提出为什么醴陵的“紫金釉”色泽不如美国货？有无方法改进？杨建议加入“氧化铬”。我认为氧化铬一烧就变成绿色，加它不好。杨说：“氧化铬到了1300℃的高温就会变成红色。”他这话给了我启示。

一九四一年任大章工程师来醴经营电瓷，我们两人经过长时期的共同探索，接受了杨发传工程师的建议，多次调整配方，终于试制成功宝光好的慈姑色紫金釉，与美国货不相上下。但在工艺上还没解决“桔釉”和“缩釉”问题。

一九五三年我到醴陵瓷厂搞技术工作。一九五八年厂里

由日用瓷改产电瓷，需要“紫金釉”。为解决“桔釉”和“缩釉”问题，厂部召开了分析研究会。会上王盛开（此时为烧窑工，后被提为工程师）认为“桔釉”是在烧制过程中窑温升至1100℃时，氧化焰转为还原焰升温过急造成的。对“缩釉”问题，我认为是“泥骨”与“釉”的熔点相差太远的缘故。后来我采取先上“灰釉”再上“紫金釉”两层上釉法，解决了“缩釉”问题。王盛开则采取控制温升过急的办法克服了“桔釉”现象，终于烧成了理想的“紫金釉”优质电瓷，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研 制 工 业 瓷

工业瓷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电瓷、理化瓷、卫生瓷、建筑陶瓷等等，皆属其列。

早在二十年代，工业瓷已进入醴陵瓷业，至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我是醴陵工业瓷最早制作者之一。初期摸索，亦属不易。记得一九二八年，长沙第一纺纱厂因缺三连保险盒（原由日本进口），眼看就要停工。厂里只得派电机车间负责人黄金鉴来醴陵寻找试制人，终未寻到。后来他找我商量（当时我在“第一烧窑场”做搭烧），我看了他带来的（日货）样品是机械压制的，他要求成品与样品规格一致。我将这一任务接受了下来，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当时既无经验可资借鉴，又无加工机械，光凭一双手，问题真不少。我首先按规格要求制成石膏模，再用石膏模制出生坯百余块，进行试烧。第一次就失败了，盒底全部从中间断裂成两块（三连保险盒是长方形的，稍小于红砖。一套保险盒分底、盖两部分。底部这块的正中间有小孔七个，两头也各有几个小孔）。当时我想断裂的原因可能是两头重，中间孔多，对两头牵引力小造成的。后又想，日货也是这种规格，为什么不断裂呢？分析来分析去，最后认定可

能是泥骨的烧熟力（我将瓷泥在高温烧制过程中的粘结强度，叫做烧熟力）问题。于是就从提高泥料的烧熟力着手，将不同地方的泥进行配制，经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方，做出来的三连保险盒再也不断裂了。这个问题解决后，接着设法解决规格问题。先将配方泥做成平板坯，烧制后测量平板瓷的大小，计算出成瓷与生坯的长度差，得到泥料“缩性”。再按此“缩性”，用画像用的九宫格将成品放大翻制石膏模，产品规格也就合乎要求了。首批交货三百套。因系手工生产，定价高，每套银圆二元八角。纱厂采用后，感到效果很好，非常满意。这既解决了纱厂急需，又增加了我个人的收入。从这里我还发现醴陵瓷泥是生产电瓷的好原料（耐电压），发展电瓷大有希望。同时也看到了手工生产电瓷的落后，为此，我曾特地向长沙第一纺纱厂，请求翻制钢模，后因未能找到翻制钢模的技术人员而作罢。以后长沙好几家商店要求我承制西铃保险，因旧中国生产落后，机械难求，无力承担，也只好告吹了。

一九四〇年，经彭笃钦（桂林“春秋行”工作人员）介绍，我承制了该行一批医用软膏缸（规格为一磅、二磅两种）、乳钵（大小不同四只为一组）、蒸发皿，这是醴陵出品最早的医用理化瓷。后又为长沙某玻璃厂（记不清厂名了）生产一批新的理化瓷，大小干燥瓷板、酒精灯芯。

一九四一年，中央电瓷厂（厂址设长沙黄土岭）技术员任大章辞职来醴做搭烧，他承接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一批电子器材生意，品种多样，如电子管插座、夹板等滑石瓷产品，要我为他配料。我们共同烧制出来的产品洁白质嫩，符合要求。这是醴陵工业瓷进入电子工业之始。一九四四年醴陵沦陷，任离醴，光复后，任又回到醴陵，要我承制价值法币一亿元的“116”（6000伏）电瓷产品，这批产品制成后，醴陵电瓷工业进入了高压电瓷生产阶段。

当时我为了解决大乳钵等大件产品的开裂问题，经多次试验，在泥骨中加入少量食盐得到了解决。据说解放后我的徒弟张永相在醴陵电瓷厂将此法应用于大电瓷上，也解决了开裂问题。

一九四六年，我开始试制高温坭坭、火花塞，经数年研制，终于制成了少量坭坭样品，耐高温性能相当于进口的美、英、日等国的同类产品。

解放初期，醴陵瓷器公司喻科盈、阳涤凡二位工程师购买了我生产的坭坭试制金水，效果很好。后因价格及成本问题，坭坭未投入批量生产。我对火花塞的试制工作也就没有搞了。

精 心 授 徒

我一生带模型、琢器、配料等方面的徒弟十九人，还带参师的徒弟多人。我带的徒弟决不允许他们沾染打牌赌钱等恶习，对他们学技术则尽心予以指导。解放前我带了三个学琢器的徒弟，我为他们每人各车一架，让他们自己操作，我从旁指点。还让他们经常去外厂观察江西琢器师傅的动作要领。那时带口紧，我的徒弟一去，他们就停手不做，等于白跑，徒弟们感到恼火。我叫徒弟不要性急，不要怕麻烦。你们到了那里，他们做一件坯总要做完，一次观察一点，慢慢的总可以学到。在生活上，我对徒弟很关心。不管他们做的坯能不能够用，每月除供给伙食外，另给工资银洋三元（约可购买米二百斤）。给徒弟发工钱，在醴陵是没有先例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学习。结果只半年时间，他们的坯就能上坯板（可做用）了。他们高兴，我也高兴。后来又指点他们制作电瓷，并告诉他们配方，把本事毫无保留地传给他们。我不是为个人打算而来带徒弟的，我是为了醴陵瓷业后继有人，为后辈子孙着想。

基于这一点，对外厂技术上出现难题，我也尽我所知帮助解决。王仙新民瓷厂产品发生“釉惊”，他们厂里派人将我找去，经了解，觉得配方上有问题，建议改动配方，“釉惊”问题很快就解决了。石门口瓷厂制造硫酸坛的大型硫酸模种开裂，凭我的生产经验，建议加入滑石，也得到了完满解决。他们生产的产品瓷面色彩不好，我即将“紫金釉”配方公开出来，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武汉市瓷厂原生产土瓷，后改细瓷，他们向我厂请求支援。我受厂里的委托前往，和该厂工人一起迅速找到了合适的泥釉配方，他们很快就将细瓷生产搞上去了。

在瓷业生产中我虽积累了一点知识，但事物发展总是不断前进的，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我在瓷业研制工作上取得的一点点成绩，不过是沧海一粟。

老 当 益 壮

醴陵解放后，我积极拥护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我经营的“精勤瓷厂”奉公守法，按时纳税。一九五二年春，醴陵县税务局特授予我厂“纳税模范”的光荣称号。

一九五三年春，为了振兴醴陵瓷业，我作为一名普通技术人员连同家属，来到了地方国营醴陵瓷厂（现渌江电瓷厂）工作，那时月工资一百八十分。年逾花甲的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到厂，我就公开了我花费十四年心血试验成功的长石质釉配方。同年，经厂长徐熹批准，以三百元（实际只用二百四十元左右）少量试验费，即研制成功了“熟釉”釉面砖。“熟釉”有别于“灰釉”，亦不同于“长石釉”，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我入厂后，厂里的匣钵配料即使用了我过去试验成功的配方。一九五四年有次出窑后匣钵烂了三分之二。为此，厂部及时召开了分析研究会。会上我认定是有人改动了配方。当时管

窑上的负责人在会上公开承认说：“老砂的配方是改了，原配方百分之四十，我改为百分之三十，结果做出来也好，再减到百分之二十，烧出的匣钵也响当当，没有想到寿命不长。”我建议马上恢复原配方，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生产很快恢复了正常。

一九五五年，适应生产发展形势的需要，厂部决定改手工生产圆器为机械生产。为了学习外地经验，我随厂里的参观团到北京大华瓷厂参观，回长后，即和同志们一起投入改革中去。在生产中，由于大规模高速生产，手工炼泥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引进了“真空炼泥机”。同时，由于改手工成型为机械旋坯，需要大量规格一致的石膏模，而制石膏模的关键是“脱模”。按传统方式下水脱模，既慢又破损大，不能采用，这就成了生产上的“拦路虎”。在北京大华厂参观时，我看到他们使用软质肥皂做“脱模油”，不下水即可脱模。立即建议车间领导写信去“大华”购脱模油。“大华”复信说脱模油由北京化工厂生产，要购买需交等量黄豆。当时无法购到黄豆，且非长远之计，厂部决定由我来试制。我没有生产过肥皂，是个门外汉。只得求助于“长大”肥皂厂张老板，请他来厂熬制，结果制出来的仍是硬质肥皂，无法使用。此路不通，我只得另辟蹊径。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我走访造陶瓷颜料的王亿成、李建升（绰号李聋子）两人。李回答说：“这种油我也没制过，你可以不用碳酸钠，用碳酸钾，因为碳酸钾遇到石灰就变成氢氧化钙。”他的这一建议，给我很大启发，我开始新的探索。经历半年艰辛，不断改进配方，研究熬制过程，控制熬制温度，终于制成满意的碳酸钾软质肥皂，质较“大华”使用的“脱模油”还好，以后推广到全县各厂，乃至广东、湖北、河南等地。“脱模油”的试制成功，为高速高质生产石膏模打开了通道，闯过了制模关。

我厂解决了“炼泥”、“制模”关键后，“旋坯”终于代替了“水坯”工序，第一次旋制了“茶盅”，这是醴陵第一批机械圆器产品。从此，醴陵世代相传的手工制瓷工艺（雕塑、异型等少量产品除外）进入了历史博物馆。我过去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约在一九五七年，我被借调到陶瓷研究所工作。这期间我主持国家用瓷（三馆瓷）泥釉配方。在同志们的通力合作下，制出的产品达到了透明，薄度适宜，符合“万里无云”的国家标准。在此期间，我还与张复生同志合作试制成功了“透明釉”，为誉满全球的醴陵釉下彩瓷器增添春色。还参与试制了薄胎硬质瓷（最薄厚度为零点八毫米），达到了“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要求。此外还搞了点雕塑艺术，展出了瓷雕花台双和平鸽、水牛。这一年，醴陵瓷厂派去唐山学习制造大小便器、脸盆等卫生瓷的同志回厂后，试制了半年，没有解决产品开裂的问题，于是厂里叫我回厂帮助解决。我回厂后，对产品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开裂的原因是缺钾钠。根据是瓷虽烧白，但尚未“出汗”（瓷面放亮）。最后我说：“你们胆大的话，每百斤泥加长石八斤，胆小就加五斤，再少就不行。”他们照我的意见每百斤泥料加长石五斤，试烧结果很好，以后从未开裂。为此，厂部发给我奖金十元，以资鼓励。

一九五八年，醴陵瓷厂更名为淅江电瓷厂，专务电器生产。前面已述，为电瓷生产的瓷面问题，我制出了“紫金釉”，这时又进一步改进了“紫金釉”施釉的工艺过程，烧出来的电瓷色泽鲜绝，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年，还由我配方，陶业师傅兰受周操作，创制了品质优良的硫酸坛（釉为内白外紫）。

大约是一九六一年，我再次来陶瓷研究所，主持了北京全国人大大会堂日用瓷和宴会瓷的泥釉配方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上

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寄 语 同 行

一九六四年，我已稀寿有二，光荣地退出了瓷业生产第一线，安度晚年，只在瓷业生产上偶尔作点参谋。数十年的瓷业生涯至此告一段落。

在旧社会，我饱尝了朝不保夕之苦，亲身感受到新社会之甜；在党的领导下，我虽然在瓷业生产上只尽了绵薄之力，党和政府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我曾被选为醴陵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并被推选为历届县政协委员，深感有愧。我现已九十有二，自然规律不饶人；然而看到醴陵瓷业正春风万里，后继有人，又感到由衷的高兴。

借此机会，我愿向同行们提点建议，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以三句话，奉献给大家，这就是：“瓷业前途无量，尚有艰难曲折，同行仍须努力，”比如高铝质匣钵尚未过关，此项科研如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醴陵瓷业即可节约数百万元。望同行奋力攻关，争取新胜利。

（荣兆文 荣兆顺 荣兆仁 荣兆梅整理）

（原载《株洲文史》第六辑）

城陵矶海关忆述

董舜卿*

我生于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冬，父亲董远福，世居城陵矶莲花塘（今光明村）。现将我从父亲和族人董大伦（曾在海关税务司做花匠多年）处听说的有关城陵矶海关的一些情况忆述于后。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列强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海关，征收关税。城陵矶海关是光绪二十年开始兴建的，据说经办人是两湖总督张之洞的侄儿张鸿顺。经过三年修建，先后建成三栋楼房，上游的一栋叫“上洋关”

（小地名原叫下街土地山），是海关税务司的“公馆”，中间一栋叫“中洋关”（小地名原叫祖师庙），是海关办公地点；下游的一栋叫“下洋关”（小地名原叫莲花塘），是大夫（相当于港务长）的公馆。三栋楼房的四周，均筑有两米高的围墙，周围的道路和绿化区，都变成了英国租界，中国人不能随便进入。楼房建在山顶上，都是西式二层，结构坚固、富丽堂皇。每栋楼房都配有一名花匠，专司植树、栽花、种草，故周围花草茂盛，环境舒适。每栋楼房的旁边，建有一部分平房，是中国雇员包括总务、水手、花匠、厨工等的宿舍。

大约是一八九九年，一批英国人进入城陵矶海关，其中有一名税务司（海关的总负责人）、一名大夫（负责港口事务

* 董舜卿的父亲董远福曾在城陵矶海关任职，本文是作者根据其父和族人董大伦（曾任岳阳海关）的口述回忆叙述的。已故。

的）、两名写字（即文书会计）、几名称手（过称的）和抄班（拖签子搞检查的），这些管理人员的工资很高。另外雇用了一些中国雇员，职务名称有夜巡（当夜班的）、水手（驾划子的）、西崽（为外国人当差的）等。在刘公庙设有一个巡捕房，内有一个头人，十多个巡捕，他们都是中国人，是海关的武装保卫人员。海关下面还有一个巡江司，有十多个中国工人，专门管理水位、航标、航道测量，航灯等事务。中国雇员的工资都很低。

税务司和大夫每天从“公馆”去中洋关办公，来回都要坐四人抬的绿呢大轿，前面一人开路，后面一人护送，威严胜过清朝的县官。海关设有了望台，监视上下来往船只，各种机动船只在进入城陵矶港的数里之外，就要鸣笛报关，然后靠岸待查，未纳税的货物一律纳税，已向海关纳税的货物，也要经过复查加盖复查标记；如果船只不报关、不靠岸接受检查，就是已经纳税的也要以偷关论处。

大约是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城陵矶工人一度将英国人赶走，接管了海关，管理人员全部由中国人担任。大革命失败后，撤离的英国人才陆续返回城陵矶。一九三八年八月，武汉沦陷，城陵矶海关奉命疏散，海关人员分别撤退到常德、长沙等地。同年十一月，岳阳沦陷，城陵矶海关被日军侵占，作为兵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武汉海关曾派人来城陵矶管理海关财产，但没有进行收税活动。一九四九年七月，城陵矶解放，海关由人民解放军接管，以后改称城陵矶港务局，隶属长江航运管理局领导，直到现在。

（原载《岳阳文史》第三辑）

华晶玻璃厂的经历与变迁

易正文*

我父亲易筱秋、伯父易筱阳、叔父易筱奇、继伯父聂美臣（与父亲同母异父），都是以制造经营玻璃起家的。曾先后在长沙、常德两地合资开办玻璃厂三家，其中以我父亲主持经营的常德华晶玻璃厂较为出色。我是一九四四年继承父业的。华晶玻璃厂从一九三〇年由我父亲开始经营，到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公私合营，从公私合营至一九八四年，前后达五十四年，经历了两代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变化是巨大的。现就回忆所及，谨述其梗概如下。

由学徒到老板

我父亲生于一九〇四年，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祖父做裁缝维持，家境十分贫困。年幼的父亲，想外出谋生，苦于无门。十二岁时，得知姨卖地在长沙裕宝华玻璃厂当佣人，经她向东家肖丽生求情，介绍父亲入麓山玻璃厂学徒，经过八年时间的勤学苦练，成了一名出色的玻璃吹制工人，这不仅解决了温饱，兄弟三人还积攒了三百银元。一九二四年，得悉长沙宝湘玻璃厂招股，便将这笔积蓄投入该厂，我父亲也随即由麓山玻璃厂转入宝湘玻璃厂工作。从此，他不仅对玻璃制造的配方、熔化、吹制、退火等全部工艺过程有了进一步研究，而且还逐

* 易正文系易筱秋之子，一九四四年起接替华晶玻璃厂工作，一九五一年任常德市公私合营华晶玻璃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步学到了工厂经营管理的一些知识。于是立下了自己办厂的志向。

一九二九年，常德华晶玻璃厂因原业主不善经营，连年亏损，几乎濒临倒闭边缘。业主眼见景气不佳，自愿将厂子出顶。我父亲得此消息后，立即在长沙邀股集资五千银元，其中他与继伯父占股金一千三百银元，于一九三〇年顶下了这个厂子。

从此，我父亲成了华晶玻璃厂的主要股东老板，并负责全厂的经营管理。

在竞争中求生存与发展

我父亲顶下华晶玻璃厂时，常德还有一家德山玻璃厂，规模与华晶玻璃厂基本相等。主要产品有煤油灯具、玻璃糖缸、玻璃花瓶、玻璃贮瓶、玻璃茶杯等五大类四十个品种。两厂势均力敌，竞争激烈。为了力争图存，我父亲运筹帷幄，在生产经营上作了不断改进。

一是深入调查研究，生产适销品种，实行工商兼营。华晶玻璃厂原来生产的玻璃器皿，只有糖缸、花瓶、煤油灯具等十来个品种，绝大部分销往农村。因其品种不全，业务得不到发展。我父亲操业之后，通过仔细查访，发现市场上玻璃器皿的零售业务，主要集中在东门城内各玻璃商店。这些商店既经销玻璃器皿，又经销和加工各类玻璃镜屏、梳妆镜盒、各式玻璃镜子、明瓦、平板玻璃；而且还利用平板玻璃的边角废料，代客裁划“宁波床”上的各式异形玻璃。生意做得很活。

为了打开销售局面，我父亲决定采取如下措施：一、延揽人才，适应业务发展需要。他亲赴武汉，高薪聘请绘花技工戴宝书、镀光技工李松林。二、根据各类产品的不同要求，选配材

料。如平板玻璃，经过挑选，没有纹、泡、砂和水波浪的就镀光，以提高镜片质量。另外，还代客裁划门、窗玻璃，边角废料用于裁划“宁波床”上小块异形玻璃。这样做，既可因材施教，提高质量，又可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三、迎合用户心理，精心设计顾客喜爱的各式图案。如农民结婚后都想生一个男孩，故在加工的镜屏上，画上各式公鸡图，很受农民欢迎。四、更新产品，增加花色品种，招引顾客。如将彩货镜屏，改为刻花镜屏，既美观又经久耐用。增加的新品种有玻璃瓷坛、时新梳头镜、平板玻璃、明瓦等七十多个品种，比原来增加了若干倍。以后还兼营其他连带性商品。如搪瓷面盆、口杯、家用瓷器等。五、开展工商兼营、批零兼售，实行前店后厂，设立门市部，陈列自产玻璃制品。由于产品与消费者、外地商店直接见面，减少了中间转手环节，不仅能够及时了解各地用户的需求情况，而且价格也较其他玻璃商店便宜，使用户得到实惠，加以经营作风端正，老少无欺，货真价实，花色品种齐全，任凭顾客挑选。因此，业务显著上升，企业发展很快。到抗日战争前夕，不仅挤垮了德山玻璃厂，而且零售业务为全市玻璃行业之冠，拥有资金近十万银元，产品销售于沅、澧两水流域各城镇。

二是亲自配料把关，加强工资核算，注重勤俭办厂。华晶玻璃厂一共五十多名职工，管理人员只有两人；一名专职会计，一名管事。管事负责全厂业务外，还兼管批发、接待、开票等工作。我父亲则掌管生产配料等主要技术工序。每月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作技术指导，对于制作难度较大的品种，如“荷叶灯盖”、“玻璃花瓶”等，即进行示范操作，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数十年坚持不懈。如熔炉清出热能未烬的煤渣，均明确普工回收，用以烧水煮饭。对于技术超群的工人，他们年终分得的红利，可转为厂里股本，使之

同工厂的利益挂起勾来。

玻璃生产是高温作业，生产工艺有连续性，产品易损坏，非一个人或几个人能够单独生产成品的。每件产品须经过选料、配料、熔化、制造、退火等生产过程，不论那一道工序出问题，都会影响产品的质量，甚至会使产品全部报废。为了加强每道工序工人的责任，在工资问题上，采取了“集体计件工资制”，即厂方按实际入库产品产值的百分之十计算制造工序工人的工资，按月由领班师傅与工人推选的会计与厂方结算领取工资。伙食由工人民主管理，集体开餐，伙食费用在整个工资中扣除，剩下工资再按各人底分分配。底分最高的为三十六元，最低的（学徒）为四元，一般可得底分的二至三“关”

（即加一至二倍）。熔炉工人按制造工序计件总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二，由厂方另付。所有工序工种的底分，一年或半年由领班师傅和老工人根据每个工人的技术情况研究调整一次，同时提出工人去留的参考意见，最后由厂里定夺。实行这样的分配形式和做法，不仅能够促使每个工人、学徒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去关心生产，钻研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注重产品质量；同时还为厂里节省了管理人员，对厂里资本积累起到了有利的作用。

三是保证质量，信守商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誓雪国耻，反日浪潮席卷各地。我父亲为了抵制日货，立即将原来经销的日产碟、茶杯全部打碎，不予销售。同时，为抵制外商美孚洋行的煤油灯罩，决心改进工艺操作，将本厂生产的煤油灯罩、玻璃茶杯等由磨口改烧口，增加耐热度，减少破损，延长使用寿命。为了严格质量检验制度，责成专人把关，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已销产品，凡属出现纹、砂、泡、炸等现象，一般负责调换。这样，经营不到十年，生产迅速发展，业务蒸蒸日上，最高年值为十七万六千多银元，在全省玻璃制造行业中颇具盛名。

战争造成的不幸及其后

我父亲顶下华晶玻璃厂以后，经过几年苦心经营，生产业务方兴未艾。不料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九年四月常德惨遭日机轰炸，全城厂、店大部被炸毁，人心惶惶，生产面临困难。在此时刻，我父亲响应国民党政府“前方抗战，后方生产”的号召，出于爱国热忱和自身图存，一方面将烟囱披上伪装，同时安装直通电话与防空指挥部保持联系，以便敌机来袭时及时停止生产疏散人员，敌机逃遁后再来开工，以保障军需民用；另一方面，将货物疏散，近至郊区，远至沅陵等地。同时还拿出一部分资金，在桃源陬市购买了三千多立方米木材，期待着抗战胜利，再展鸿猷。然而，这一切打算，都变成了泡影。运往沅陵的货物，在敌机轰炸中，化为灰烬，仅剩下几百担玻璃渣，几千立方米木材被洪水冲走，流入洞庭湖后被抢一空。一九四三年冬，日军攻陷常德，华晶玻璃厂所有厂房、生产设备以及储备物资亦全部毁于战火。我父亲在疏散途中，行至常德南岸拐堤时，被日军所俘，惨遭杀害。真是壮志未酬身先卒，先人事业枉费心。弄得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母亲和我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暂住长沙伯父家，这年我才十五岁。

一九四四年春，战争局势稍有好转。华晶玻璃厂已往是由我父亲主持当家，父亲去世后，股东中没有适合的人选能够顶起这副担子，故要我和母亲返回常德，由我继承先父事业。这样在继伯父、华晶玻璃厂的大股东聂美臣、华晶玻璃厂的管事黎效田等诸长辈的支持下，筹划重建厂房尽快恢复生产。在紧张施工中，烟囱刚砌出屋顶，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藉口防空为重，不准在城内建筑高层烟囱。建厂工程被迫暂停。经过多方探听，才知道事情的真象是：原已垮台的德山玻璃厂的部分人

员，见华晶玻璃厂被毁，估计暂时无力复工，便乘机东山再起，从事小规模的生产。后来他们听说华晶玻璃厂重建厂房恢复生产，感到对己极为不利，于是便许以二百银元的干股和每月另给报酬贿赂这位官员，阻止华晶复厂复工。对此，我们以华晶曾报国民政府经济部备案，发有开厂证明，必须坚持“前方抗战，后方生产，支援前线”为由提出上诉。他们知道事情不妙，便托人出面调解，即不再阻挠华晶修建烟囱，华晶也不上诉，自此，这场风波方告平息。

直到一九四四年底，华晶玻璃厂恢复生产时，长沙还陷于敌手。当时全省生产玻璃器皿的企业惟独本厂一家，因此生意兴隆。为了满足市场需要，改季节性生产为常年生产，企业一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致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过境军队强征恶要，弄得工商凋零，民不聊生。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华晶玻璃厂的工人为了使自己的基本生活不为货币贬值而受大的影响，提出按实物计算工资的要求，经过劳资双方协商，一致赞成比例定为十比一，即生产十个产品，工人得一个。发放工资时，按当日产品物价进行换算。由于当时早晚物价不同，工人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吃亏不少。加以国民党乱抓壮丁，适龄青年诚惶诚恐，无处安身。不少工人不安心生产，纷纷离厂回家，厂里生产遇到很大困难，延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不得不宣布停产。这时我携带全家老小以及部分残货迁往沅陵，等待解放。

企业走上了新生之路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常德解放，我立即从沅陵赶回常德。次日，一位解放军的师首长来到我厂，见面就说：“你们回来了，我们欢迎你。”并向我宣讲了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

的政策，希望我马上召集工人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在他们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筹备工作，华晶迅速恢复了生产，职工们干劲倍增。我除主持全厂的生产外，还主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担任了民主建政工作组的组长。

一九五一年夏，我正在武汉采购物资时，接到厂里的电话，告知政府将与我合营，我当即表示同意。返回途中与长沙股友商议，都表赞同。回常德后，在政府代表李焕英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迅速成立了“常德市公私合营华晶玻璃厂股份有限公司”，我被任命为经理，李焕英同志为副经理（公方代表），原业务负责人黎效田同志（私方代表）为副经理。同年八月二十日在假圣公会的教堂正式举行庆祝大会。常德市市长牛迪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宣布从当日起，华晶玻璃厂正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华晶玻璃厂从一九五一年公私合营到一九八四年改名为国营德山玻璃总厂（我调离该厂为止），这三十三年中，生产发展之快，厂貌改变之新，是令人惊异的。现已完全由手工操作发展为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职工人数增加，产值、利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五一年，年产值三十三万九千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职工六十人，厂房面积七千八百三十平方米。一九八四年，产值为八百九十六万元，为一九五一年的二十六点八二倍；职工八百三十人，为一九五一年的十三点八三倍。厂房面积十万平方米，为一九五一年的十二点七七倍。解放前，华晶最高年利润二万六千多元。一九八一年华晶玻璃厂的利润高达九十六万元，为原有华晶玻璃厂最高年利润额的三十六点三倍。

回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父艰苦创业，挣扎图存，用心良苦，但人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财产毁于战火。而

今天我们全家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政治上，党给我以莫大的荣誉，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在生活上，全家六口，都得到妥善安排，过着舒适幸福的日子。

（原载《常德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外商在岳阳的经营概况

钟 敏 政 *

先父钟良斋平生经商。一九二〇年在岳阳开办“英商太古车糖公司岳阳经理处”，一九二七年歇业。现以亲历见闻，记叙外商在岳阳的经营概况。

岳阳为湖南门户，水陆交通便利，民国初年原在清廷任官的张铭伍（清末张之洞在湖北任制台时，他首为张的幕僚，张进京任大臣后，他仍留制台衙门当刑命师爷，其官职相当现在高级法院的法官），罢官返籍后，集合官僚刘文龙（其后于一九三一年间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等，组设商业银行。此举带动了官、绅、豪、富投资商业。开设钱庄者，计有裕通、陈恒昌、永昌、太康等四家，均在上街河口。当时市场一度欣欣向荣，大有活跃之势。

一九一七年北洋军阀汤芑铭败溃，逃出湖南，兵卒奸、淫、掳、掠，繁华市区遭受兵燹，商业银行因倒帐资财受损关闭。一九一五年粤汉铁路长武段通车，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日商日清轮船公司等均有长汉线，定期开班，水陆交通，均为便利，他们随车、随轮捎带货物，获利颇丰。至一九二〇年北洋军阀张敬尧退出湖南止，岳阳较为清平，商业又步入复苏阶段。

* 钟敏政系钟良斋之子，七十二岁，现任岳阳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委员。

外商在岳阳销售煤油业务的情况

一、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铁锚牌煤油。

汉口经营鸡蛋出口商号姚顺记派族人姚仲华为管事（即经理），来岳阳下街河口开设福记，经销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铁锚牌煤油，资金约光洋二万元。一九一九起开始营业，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歇业。

二、英商德士古洋行幸福牌煤油。

汉口咸宁帮资本家杨芝泉于一九二〇年来岳，在上鱼巷子开设和记，经销德士古洋行幸福牌煤油，资金约光洋一万元以上，经营至一九二五年，在原籍购置田产后歇业。

一九二八年在汉口大资本家唐晋记五金号老闆柯宜生，派妹夫梁松泉为管事，在上街河口开设申昌，经销德士古幸福牌煤油。开业时估计资本在光洋二万元以上。一九三八年九月，岳阳临近沦陷，遭受日机轮番轰炸，申昌店屋被炸毁，全店炸死十五人，幸存者仅二人。资金及盈利约光洋四万元，已先期存入汉口美国花旗银行，被炸时河下尚有二只运载听装煤油帆船，后下落不明。

三、美商美孚洋行鹰牌煤油。

汉口浙江帮巨贾杨某派女婿（姓名不悉）在岳阳下街河口开设正大，经销美孚洋行鹰牌煤油，于一九二〇年开业，至抗日战争爆发后歇业，资金估计约光洋二万元。

四、苏联光华洋行光华牌煤油。

苏联在施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开采油矿，煤油产量逐年增加，于一九二一年以后，对外寻找销售市场，在汉口设有光华洋行，出售光华牌煤油，由当时的汉口大资本家王珏承担经销。王在汉口开有荣昌及鼎昌两个字号，批发面粉及火柴，他来岳阳在下街河口开设荣昌，经销光华牌煤油。当时岳阳已先

有英、美煤油占据市场，而光华牌煤油质量较差，燃点时黑烟直冒，不为用户所喜爱，荣昌业务居于劣势，乃另辟途径，只以岳阳为聚散地点，溯荆江而上，向监利、石首、藕池口等沿江城镇发展销售业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歇业，开业资金约光洋二万元以上。

英、美、苏各牌煤油包装形式，一律相同，都以镀锌薄铁皮所制成的立式长方桶盛装，每桶称作一听，两听叫做一对，售出时以对为单位。每听并皮重老称32斤（市称一斤合老称0.875斤），售出价格光洋二元二角至二元五角，系由汉口洋行根据上海金融市场光洋折合纹（白）银涨跌价格进行调整，波动幅度不大，可称平稳。

岳阳各煤油公司，均在吕仙亭靠河边设有堆栈，武汉来油由外商轮船承运。无论在运输途中及堆存栈内，均向汉口保险公司投保水、火险。店内平时存油不超过100对，作为少量门售。这样栈、店分别堆存，既安全，又便利下河装船运载。堆栈存油各公司都有二至三千对。

外商在岳阳的煤油销售市场，还深入到内地山区的农村。农村向来燃点植物油。而“洋油”的价格低廉、亮大，优点超越植物油，且煤油公司，兼售各种台灯灯座、灯罩，使当时广为流行的鸭婆灯受到冲击。

各煤油公司在开业之初，均采用现款成交，对资本较雄厚的零售商店，在购货时改为现七赊三的办法，以招徕主顾。赊欠货款的主顾，多在农历每月月半及月终按比期付清货款，以保持信誉。各公司出于竞争，都逐渐放宽赊货金额，以致全部货款成为赊销。煤油零售价格，各公司不加限制，由市场自行调节。零售商店按比期付款，可挪用煤油货款，购进紧俏时销货物，另行谋利。但各煤油公司收得上海、汉口金融行情的电报，如果银根抽紧，煤油价格看涨，对零售小商压缩赊销，

催还货款；如行情对煤油价格看跌，则放宽赊销，抛售煤油，这样从价格涨跌中，赚取额外利润。各小商贩不知洋商剥削手腕，任凭洋人操持于股掌之间。因无国产煤油，只能听任外人敲骨吸髓。

外商在岳阳销售车糖业务情况

一、英商太古车糖公司。

英国资本家私营企业太古车糖公司两湖总经理韦学周（华人买办），在湖南长沙、常德设有经理处，控制湘中、湘西食糖市场；岳阳也亟须设立业务机构，掌管湘北食糖市场。先父原在汉口经商多年，一九一九年来岳开设裕和钱庄，翌年因军阀张敬尧溃逃，败兵抢劫，商场遭受重大损失，放出债款，多遭倒塌，亏本约光洋四千元，收歇钱庄返汉。经人介绍，由汉口东升福药材号及岳云公号栈代向太古车糖公司各具铺保纹（白）银伍千两，于一九二〇年重来岳阳，在上街河口开办“英商太古车糖公司岳阳经理处”，邀请岳阳商业银行营业长郭炳初为管事（经理）。先父为了使车糖销售迅速扩展，另以良记牌名在同一店内，兼营南货、海味、面粉、火柴等批发业务。由于商品种类齐全，营业蒸蒸日上，居当时批发商店之首位。

太古车糖以太极图为商标，白糖分为九个品种，品名从头车起，顺序至九车止，质量由头车的雪白颜色，依次转黄，至九车为棕黄色。划分价格，由高到低。品种适合制作高低档茶食糕点。另有方糖一种，质地洁白，完全脱水成小颗方形，以白细布袋盛装，每袋重五英磅，专销外侨。尚有冰糖，质纯色白，烹调补品，极为上乘。

车糖用蒲草席包盛装，外用广藤捆扎，包装紧牢结实，运输不易破捆。每包规格重量为老秤一百五十斤，价格从头车起

每百斤约光洋十二元，递降至九车约七元五角。汉口根据上海纹银价格的涨跌，光洋折合纹银七钱二分上下伸缩，波动幅度甚小，糖价可称平稳。汉口总公司规定对岳阳方面开业初日销售量最高以八十包为限。随后逐渐放松，将日销售量增加至一百二十包，整包批发，不拆零销售。

汉口总公司将车糖交由太古轮船公司承运至城陵矶，海关查验转口税证后，由帆船转驳至岳阳，并向汉口保险公司投保运输及囤存水、火险。

岳阳经理处将每日销售数量、品种、金额填表报汉口总公司。每月上旬销售货款于当月十五日解缴总公司；中旬至下旬二十五日止货款于当月底解缴；二十六日至月底货款归入下月中旬一并解缴。总公司以销货款的百分之五作为经理处回扣，所有一切开支费用，盈亏由经理处自负。每年总销售金额约光洋九至十万元；其他南货等销售金额不与车糖相涉，属于独自核算。

太古车糖公司岳阳经理处销售范围：

甲：岳阳县城、新墙、筢口、荣家湾、黄沙街、城陵矶、广兴洲。

乙：临湘县城（原陆城）、五里牌、桃林、忠防。

丙：华容县城、注滋口、北景港、塔市驿、三坊寺。

丁：南县县城、三仙湖。

戊：湘阴县城、汨罗、长乐街、何家塘。

己：平江县城、新市街、鱼口、归义。

开业初，作为宣传及推销商品，派人携带全部品种糖样及印制精美的日历牌，分赴临近岳阳各地区南货日杂零售商店，赠送日历牌及少数糖样，作为品尝。日历牌绘制戏装美女，彩色鲜艳，悬挂作装饰品，美观大方。此种宣传方式，在当时尚属初创，深受商户喜爱，对招徕主顾，颇见成效。

太古车糖的经营销售，采用现付及赊销两种方式。各地商店前来购货时，首先均以现款成交，经过一段时间，购货经常，而且有往来户互作介绍，逐渐赊欠少量货款，转为全部赊销。赊销帐户以农历每月十五日及月底日为比期交还货款。先期派人至各地坐收比期，按比期交款，信实可靠者，继续与以赊销；误比或数比拒付者，视不同情况予以压缩购货量或停止办理赊销。

一九二七年三月，汉口收回英租界，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势力，受到重大的打击，太古车糖公司压缩业务，将两湖各地经理处撤销，岳阳随之办理结束，业务集中汉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本家所经营的三菱及三井洋行销售白糖，品种较太古车糖更为齐全，而且质好、价廉，后来居上，抢夺市场。太古营业，一蹶不振，以致停业。

三菱及三井鉴于太古在两湖各地所设经理处，在我国人民的革命浪潮中，都受到了惩处，存有戒心，只集中汉口营业，专营批发现款销售，不再在外地设经理处。良记在先父的筹划下，将原来兼营的南货海味等业务，改为主营。抗日战争爆发前二年先父病故。岳阳沦陷前，良记迁逃至沅江草尾等地，改作行商。抗战胜利后，大哥回岳阳在上街河口开设良记新，以南货业兼营钱庄；二哥与人合伙在上街河口开设孚大南货号。解放后我们兄弟改营工业，在西门正街集股开设新民机器榨油厂，于一九五三年歇业。

二、英商怡和车糖公司。

英国国营企业怡和车糖公司，在汉口设有华商买办，负推销产品之责。一九二三年，汉口浙江帮商人，向怡和公司具保证金，承办在岳阳油榨岭开设“怡和车糖公司岳阳经理处”。白糖仅有天、地、元、黄四个品种，不及太古的齐全；在市场供应上，又不如良记的丰富多彩。良记以太古经理处兼营南

货、海味各类货物，互相配搭，能供应零售商店所需要的各档货色。怡和人地生疏，而太古良记与各往来户关系密切，使怡和无法打开局面，抢夺市场，所售货款的回扣，不够应付开支，以致亏损，营业年余，即行收歇。

当时岳阳糖的销售，除太古、怡和的白糖以外，四川出产的红糖，称为川吉；广东出产的红糖，称为潮赤。川吉为深红色，潮赤为淡红粗粒，（国产糖生产当时尚无提炼为白糖的技术）。潮赤由广东航运到上海，转口至汉口销售；川吉由四川顺长江船运至湖北沙市，在此集散。良记与沙市糖业巨贾肖吉安建立供销关系，红糖由沙市直运岳阳，减少中转环节，成本降低，红糖售价较汉口稍廉，湖南各埠帆船，由滨湖装载谷、米至汉口销售后，回程路过岳阳时，有在良记购红糖捎带至各小市集。社会习俗，喜庆节日，嗜爱红糖为吉利象征，由于红糖畅销，更促使良记营业日趋发展。

以上系外商在岳阳销售白糖，兼及本国红糖运销情况简介。抗战胜利后，我国糖的产量有所提高，广东红、白糖由粤汉铁路北运便利；四川红糖运销如昔，湖北广水县全县遍种甘蔗，大量熬制红糖，集中汉口销售。外商荷兰粗砂白糖，虽有销售，但与抗战前由洋商白糖完全霸占市场相比，有所不同。

英商英美烟公司在岳阳经营情况

汉口英商英美烟公司，于一九二〇年派员来岳阳，在南正街裕成绸缎匹头号内，租赁一半铺面，设立“英美烟公司岳阳分公司”。岳阳当时只裕成系两层西式门面，大门两边墙上镶嵌有巨大玻璃窗户，装潢摆设仿照汉口同行式样。英美烟公司开业后，窗内陈列广告巨型面，张灯结彩，富丽豪华，留声机日夜播唱戏曲、小调，招徕城乡来客，以及游逛闲人，熙熙攘攘，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我国人民习惯，向来只吸丝烟，以铜制水烟袋或手持旱烟袋作为吸烟工具。欧风东渐，西洋生活方式传入我国，各大商埠口岸，国人多有改吸纸烟。由于化学原料配制，醇香可口，一支在手，心旷神怡；而水、旱烟袋，装烟点火，吸完一口，又须重复，麻烦费事，携带不便。英美烟公司出品的大、小号“哈德门”香烟，以重磅纸印制的十支装烟盒，色彩鲜艳，锡箔作为内层包纸，随身携带，不易遭受汗浸潮湿，原料烟叶，堆存数载，使其自然进行变化，祛除青、杂、冲味，烟味纯良，因此丝烟远非纸烟之敌。

英美烟公司注意宣传效果，以音乐队吹奏作为前导，引起行人驻足观望；再以装扮的假洋人殿后，将十支装整盒哈德门香烟，四散丢掷，任人抢捡，有从未吸过纸烟的，捡到一包，喜出望外，吸后烟香味纯感到舒适，即往该公司购买。且又订出优待办法，五个空烟盒可兑烟一盒。此项推销办法，在打开销路后约一年时间，予以停止。烟盒内层包装的锡箔，可以炼出少量纯锡。拆包零售香烟小贩及吸烟量大者，既可以烟盒换烟，又可得到售锡的微末小利。而且该公司每日派出推销员向各小商贩送货上门，隔日收取货款，于是纸烟销售，风行起来。

该公司为了长期宣传，在县境北门码头的山边，临近顶峰，竖立木制“英美烟公司哈德门大、小号香烟”的广告牌，字的大小、尺码不悉，但上水船在七里山转拐，下水船在岳阳楼外边的湖中间，都可明显看见。字体为立体形，油刷红漆，颜色艳丽，极为醒目。大革命时期，抵制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广告牌，无形消失。

英美烟公司究竟在岳阳赚去多少利润，无从得知，但吸烟者较为普遍，均被榨取利润。本国实业不振，坐视利权外溢。在当时媚外崇洋腐朽无能的政府统治下，上海、广东等地，数

度出现外人居杀我国人民的惨案，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忱与愤慨，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抵制洋货运动，英美烟公司受到影响，结束了岳阳分公司，又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其业务改由上街河口方维记经营。

方维记系湖北咸宁人方维舟所开设，原营“洋纱”（棉纱）、淀粉、烧碱、“洋烛”等类商品。其后兼营英美烟公司业务，仍由该公司派监督员一人驻店，督察业务及帐目，照样设推销员二人，保存送货上门制度。沪、汉二地本国中、小型烟厂，逐渐建立，牌名繁多，不及备述，对挽回利权，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英美烟公司的产品销售，受到影响。帝国主义改变其经济侵略手段，纳入华股，成为我国官僚资本的企业。

大约在一九三一年以后，英美烟公司挪入当时官僚资本宋子文的股本，改为颐中烟草公司，成为中外合资的官僚企业，沿用大、小号哈德门香烟牌名，与国产香烟竞争。

（原载《岳阳文史》第一辑）

我是怎样经营雄磺发财的

陈 少 泉*

一九四五年，当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遗留下来的“陈九思药号”由于经营不善，摇摇欲坠，一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面临着困难。正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恰好老友龚再生（原湖南省建设厅官商合办慈石雄磺矿私方经理）来到津市和我商谈关于销售雄磺的事。雄磺矿的组成人员是：官方经理杨梓坚（原湖南省建设厅科长），慈利私方经理戴照明（原湖南省参议员），徐小桐（慈利县地方绅士），石门私方经理龚再生（石门县地方绅士），易玉安（石门县商会会长），出纳杜修基（常德卫校校长）。这些人都是些官场人物，不懂得做生意，其中有些人是青帮人物。当时我已拜青帮头子杜心五为师参加了青帮。我想，作生意，凭着这种关系，应付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是有利的，只要讲“义”气，遇事开诚相见，是可以打交道的。于是，我一面设宴招待，陪伴他们打麻将、玩扑克，将他们稳住；另一面又暗中调查这个生意做不做得。了解的结果是，有点滞销，还是有看头，但我就是苦于没本钱。便坦率地告诉龚再生说：“这笔生意我想是想做，就是没有资金。”他很慷慨地说：“这不要紧，我们可以赊销二百桶给你，一年后付款，每市担价为法币八十元。”我琢磨着价值三万元的货物，我连运输费都没有，如果一蚀本，该担多大

* 陈少泉曾在一九四五年的售雄磺致富，现年六十八岁，在常德地区药材公司工作。

的风险？我犹豫不决，便去邀隆兴和的聂锡柱。他是药业的青年头面人物，和我很要好，就将此事和他商量，可他拒不参加，还讲：“据有经验的人说，雄磺是条黄龙，搞得不好会咬人的。老弟，你要慎重些！”我想，一定是雄磺找不到销路或是同行卡他们的价。也许是看我是“帮”派朋友，有意识地照顾我，不然怎么会赚给我呢？于是我抱着闯一闯再说的态度，将这笔业务接应下来，签订了合约。说干就干，随将一百五十桶雄磺运往汉口，委托汉口信托号沈子良代销，自己运往广州五十桶，从中带往香港二十桶。到香港后，一打听行市，牌价是每百斤二千元港币，折法币八百元一市担，比进价高十倍，我喜极了，这个生意有看头，只想早点把带来的二十桶卖光了再去运。谁知香港这地方做生意是用“价高招远客”的办法，引诱客商将货运来，便“货到地头止，货到地头死”，以达到座商随意削价，从中牟利的目的。开始，卖了两桶，价一千六百元港币，自后，陆继跌至一千四百元，一千二百元，一千元，仅销售了四桶，耽误了个把月，再也销不动了。我很着急，乃发一电报到汉口询问一百五十桶的销售情况。复电说：货全部以四百元一桶售光。这时我才安下心来，随即把香港、广州的货暂时搁置下来，专赴汉口料理货款，先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回到津市。

到津市后，气氛变了。原来，同行得知我在汉口赚了很大一笔钱，有些眼红，趁我还没有回来之时，企图用现款压价的办法向矿方出四十元一百斤购买雄磺，还大肆造谣说我陷在香港、广州回来不得了。又说这次不知亏了多少本，只想如何把我挤垮。与此同时，矿方也告诉说：“津市药业现在也想和我们做生意，他们想用现款购买雄磺，但出价很低，没有成交，我们说等你回来再说。”我听了这些话后，没有吭声，心里也很气愤。过了两天，我设宴招待矿方在津经理。席上，对他们

向我的赊销所表现出来的信任，表示感谢。为了取得他们对我进一步的信任，散席后，提前九个月将二百桶雄磺款三万多元，当面全部付清。他们当然也很满意，一致认为我这个人讲信用，够朋友。我对同行们造我的谣，挖我的墙脚感到很恼火。这时，我也赚了一点钱，胆子更大了一些，干脆把同行甩在一边，乘机在酒席宴上提出新的要求：一、继续赊购二千桶，价格不变（这是同行最不满意的），一年内陆续付款；二、在我签订合同期间，矿方不能售与任何私人，如发现，除已付款外，所有欠款，一律拒付。他们稍作磋商后当即表示同意，并签订了合同。我为了使合同合法化，还出钱请了律师李汉身出面作证，将各项手续办妥后，就到汉口推销去了。

我的这一招，惹起了山、药两帮的嫉妒和愤怒，认为偌大一笔生意，我一个人独揽了，很不甘心。他们联合起来告我的状，不仅在津市告，还集资派两个人到省里告。告我：勾结官方，垄断雄磺，投机倒把，扰乱市场。投想到出头告状的人还是和我经常在一起的好友聂锡桂。我仍在汉口置之不理，让他们去告。

后来，省军管区副司令王育瑛和我取得联系，要我到长沙去。我拖延了个把月才到长沙。王以九遵一带老大哥身份劝我与他们和解，我随之表示同意。次日，聂锡桂等以王的名义设宴请客，经过王的斡旋，聂道歉了，我也就不计旧恶，和他们和好如初。当即承诺让出四分之一交与同业经营，一场同行业的倾轧就这样结束了。

我经过一年的经营，已有了上十万元的资金。由于有了钱，我就想扩大经营，于是讲派场、摆阔气、讲“义”气，穿的是西装革履，在汉口住的是璇宫饭店，还讨了一个漂亮的小老婆，花钱象水一般，满不在乎，俨然是一个阔大老板。这时，我在社交活动中，也结识了一些达官显宦。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军界大头

头，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他的夫人喜欢我的小老婆，收她作了干女儿，我也就成了干女婿。从此往来密切，经常出入刘公馆。之后，我在汉口一面推销雄磺，一面购进其他紧俏药材到津市经销，这样辗转不断地往返经营，至一九四九年，我已拥有光洋十五万多元。由于有了钱，捧场的也多了，这里要我投资，那里要我入股，我都满口答应。计有：津市和光钱庄、长沙鼎昌布号、长沙庆余药店、武汉九和药号等。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由于旧法币不断贬值，物价波动，这些投资和股份，都化为流水。我这个凭借关系和手腕一下暴发起来的富商不过是昙花一现，到头来仍落得个“依然故我”。

同年七月，津市解放了，政权回到了人民手中。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我才能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政府发挥我的一技之长，仍要我搞雄磺业务。

原载《津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回忆《正中日报》在衡阳时的往事

叶 滚*

抗日战争时期是衡阳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在这里出版的对开民营报纸即有《正中日报》、《大刚报》等数家，外地在此销售的报纸也不下十余种。

《正中日报》的创办和组织机构

《正中日报》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在长沙创刊的，十一月“文夕大火”，长沙成为一片焦土，市面萧条，人心惶惶，而衡阳地处西南咽喉，冠盖云集，交通方便，市场出现畸形繁荣景象，因而有迁衡之议。经过报社员工商议，先将印刷设备运到衡阳，租赁南门外福音巷四号为报社，设立经理、采访两部；继而又在回雁峰下鲁班殿内设编辑部和排字房，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复刊。当时衡阳避难者麋集，敌机天天临空侦察或轰炸，警报常鸣，一日数惊，为编辑采访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报社员工无固定工资，仅给少量零用钱，但大家满怀抗日热情，工作都很卖力。编辑人员躲避空袭时打腹稿，回报社后即奋笔疾书，常常稿未写完，又要跑警报，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报纸仍然坚持每天按时出版。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第三次进犯湖北，旋即自动退去。因

*叶滚是龚业隆同志的笔名，曾任《正中日报》编辑，现为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却趁机吹嘘所谓湘北第三次大捷，实为可笑。不过，这时长沙局势确也稳定了一段时间，所以《正中日报》除衡阳版外，又在长沙设立分社，恢复了长沙版（对开），有些评论和小品衡阳版刊登后，又转载于长沙版。

《正中日报》组织机构是：

董事会：社长室，设正副社长各一人，秘书一人，下设主笔一人。

编辑部：设总编辑、编辑主任各一人，编辑五人。下设：电台：主任一人，报务员六人；排印房：主任一人，校对二人，技工二十余人；资料室：资料员一人。

经理部：经理一人，会计、出纳、庶务各一人。下设：发行课：课长一人，课员二人；广告课：课长一人，课员一人。

报社主要人员的安排和变动情况：社长谭常恺，任董事长兼发行人。谭在三十年代初，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光复后任“国大”代表，解放前赴美，一九七九年病死。谭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创刊起至一九四四年二月离开。后由吴公虎继任，至当年七月止，为时仅五个月。吴原在广东曲江任《中央日报》社长，衡阳沦陷前仍回广东原籍。

副社长：罗仲琳、汪师白、徐斐烈。

主笔：汪师白（兼）、冯英子（现任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

总编辑：仇兴、谭世杰（代，原任秘书兼副刊编辑，现为《省志·煤炭志》编辑）、徐斐烈（兼）。

编辑主任：李汉杰。

副刊编辑：龚业隆、严怪愚。

采访主任：张亚伦（后兼经理，现退休）。

电讯新闻编辑：唐颂安、杨瘦梅。

经理：彭楚珩、罗国璋、张英灿、张云涛。

从那时到现在，相隔已四十余年，在报社共事人员多已去世，健在者不过数人而已。

一九四四年夏，日军再次犯湘，长潭弃守，衡阳会战即将展开。报纸于五月停刊，将印刷设备船运零陵，员工乘火车先期到达，租用《零陵日报》机件，改出《正中日报》四开版。到八月间衡阳沦陷，日军进逼祁阳、零陵，员工逃到东安后，不得不忍痛遣散，各人受尽颠沛流离之苦。计算起来，报纸从创刊到结束，历时将近六年。

访问白崇禧和蒋廷黻

国民党抗日不力，前线败讯频传，报纸上常用的“转进”、“战略撤退”等字样已不能再取信于民，因而人心不安，几乎失去胜利信心。为了使群众得到一点振奋的信息，我访问了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员。一九三九年秋天，在衡阳苗圃附近，访问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白住在一栋平房里，四周戒备森严，居室门口还站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卫。就座后，我说明了来意，直率提出抗日军事有没有胜利把握。白沉思了一会儿后说，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只要民众动员起来，国际形势也会有变化，战争是可以打胜的。寥寥数语讲得很空洞，避谈军事局势。而谈起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却很感兴趣。他说，薛伯陵（薛岳的别号）不懂军事，打什么仗呀！湘北几次大捷哪里是他的功劳，真是自欺欺人。这是一次访问。另一次是我又在银行大楼里访问了国民党的外交家，曾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我要求他谈一谈外交方面我们的有利形势，他却避谈现实外交，反而滔滔不绝地谈他在苏联的见闻，他说，苏联是很贫困的，很多人没有饭吃，那时大使馆里有一株枣树，结了许多枣子，一天早

晨枣子全不见了，经查问是大使馆雇用的俄国工人偷了。他还说，苏联的交通运输很糟，沿河货物堆积如山。这两次访问，我感到一无所获，所以在报纸上都没有发表访问记。所答非所问，令人啼笑皆非，白、蒋二人的共同之点，是对抗战讳莫如深。

田汉同志的教诲

当年，各地文艺界人士和爱国青年纷纷来衡阳市，文艺宣传空前活跃，政治部所属的有演剧第六队、电影放映队、育英儿童剧团等，均有我的熟人，我都曾去访问过，他们晚上睡在地板上，许多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一个挨着一个，吃得也不好。那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艺术处处长是田汉，军事委员会对三厅的人事和经费卡得很紧，许多教师和青少年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热情投入抗日宣传工作的。一九三九年秋，田汉同志率剧团在衡阳演出《江汉渔歌》等节目。在准备演出《铁公鸡》前，田汉将这个剧的简介材料寄给报社，要求发表，我收到稿件后，准备采用，不料我离开编辑室不久，稿件却不翼而飞，又不便追查，只好写了封信给田汉同志，请他再写一份。第二天接到田汉同志的回信，整整写了一页，仅记得最后是这样写的：“敌机经常轰炸，无心执笔，想先生亦有同感焉。”《铁》剧简介未能见报，由于种种阻力，这个戏也未能演出。以后我多次访问田汉同志，有次他邀请我出去散步，边走边谈。他个子高，身体结实，很健谈。他说，这场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要动员全国人民奋起，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报纸是宣传抗日，激励民心的工具，当记者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勉励我坚守岗位，要敢于和恶势力斗。他的爱护青年，奖掖后进之心，流露于书信和言谈之间，使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与黑暗进行斗争

在衡阳一方是大声疾呼，坚持抗日救国。一方是粉饰太平，压制舆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事情：《正中日报》在副刊上辟了一个《随想随写》专栏，每天写几百字杂文，揭露社会黑幕，作不平鸣。我在《灾区巡礼》一文中写了这样几句：“君不见同胞之血遍地流，君不见满街尸首无人收。是以君子远灾区也。……”指的是——一九三九年一次敌机疯狂轰炸后市民死伤惨重的事实，那次设在市区的一个伤兵收容所数百人全被炸死，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我在仙姬巷遇到一个朋友是衡阳人，他哭着告诉我，他母亲被炸死了，仅拾到一只鞋子，那次他藏在水塘边瓜棚下，才幸免于难。由于记者的责任感驱使，我到被炸地区看了一遍，当局善后工作很差，不少死难同胞尸骨未收，不少人街小巷污血尚在，故用“君子远灾区”之语，借以影射当局。

一九三九年暑天，报纸已经开印，衡阳新闻检查所勒令将我所写《显微镜下的衡阳》一稿抽去。如果不按他们的意见办，这天报纸发行必将遇到阻力，于是我们把这篇稿件抽掉，另补上其他稿件，印好后送新闻检查所。这一天副刊上补上了一篇内容完全不同的文章。一九四一年冬我写了《国难期间，婚丧应当从简》一文，正当这时，薛岳父亲亡故，在报纸上登了大幅讣告，薛岳看了这篇文章，认为是影射他的，大为震怒，打电话给谭常恺，质问为什么刊登这样的文章，要报社交出写稿人。这篇稿子没有署真实姓名，经谭向薛岳解释，说写稿人没有署真实姓名，又没有写明住址，无法追查，才掩饰过去。还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看到一部军车压伤了一个老年妇女后扬长而去，我暗暗记下了车号，第二天我发了一件《市虎伤人》的简短新闻，把车号也写上了。当天晚上有两个军人，气势汹

涵地到报社要找写稿人，报社负责人对我说：“你采访的消息，你去接待吧！”我走到会客室，他们就座后，我耐心地对他们说：“新闻记者的职责是有闻必录，与事实不符我们可以更正，不然我们就不好办。如果事实闹大了彼此都不大好。”这两人听了我的话，感到无可奈何，咆哮一顿后就走了。一九四三年秋，赵君迈出长衡阳市，谭世杰写了《迎赵君迈先生》一文，揭露了衡阳市军政界某些黑幕。衡阳新闻检查所在稿上批注“……暴露现实太多，不宜刊登。”谭不顾压力，仍在报上发表。时事编辑杨瘦梅，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平日沉默寡言，一天我看到两个军警把他押走了，这个老头腋下夹着一床旧棉絮，走在军警的前面，我看到他的背影，真是思绪万千！还有一个朋友叫朱莼（纯甫），是湘桂路火车站卖票的，他常帮助人买火车票，有次他告诉我是帮王凌波买票。他寄住报社，和我同房，我们常一道去生活书店看《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刊物；后来他也被关押过。

在《正中日报》的《随想随写》专栏中，我写了几百篇杂文，揭露黑幕，抨击时弊，衡阳新闻检查所对此极为不满，给了我一封警告信，信中说：“先生文笔尖刻，事实又极隐蔽，恐引起读者误会。希改变作风，……”我一气之下，第二天又写了篇题为《谈改变作风》的杂文，比较隐晦而又针锋相对地对这封警告信予以驳斥和讽刺。这更使他们恼火，后报社负责人劝我“自动辞职”，谭世杰、冯英子不久也相继离开了报社。

写这篇稿件时，承谭世杰、张亚伦两同志提供有关资料，并共同回忆当年事实，谨此致谢！

（原载《衡阳文史资料》第四辑）

一个女艺人的遭遇

尚 星 云 *

我艺名艳兰，奶名星妹子，一九一八年生于湘潭河东太平街一户赤贫的铁匠家里。我外婆和舅舅都是学戏的，是长沙湘剧三元班的名角。他们见我家里生活困难，就劝我娘送我去学戏。当时社会上把唱戏的看作下三教九流，一般都不想送自己的儿女去学戏，但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别的出路，母亲只好勉强同意了。

两次拜师学戏

一九二六年三月经舅父黄元兴介绍，我拜湘剧泰华班班主王益正为师。王见我瘦小，有些为难，碍于情面，还是收下了。拜师要作进师酒，要四块光洋打红包封，这些钱都是借来的。拜师还要立师徒字。师徒字上写得清清楚楚：“寒暑星灾，一概不管；调皮捣蛋，打死不怪；逃跑犯科，与师无关；学徒四年，收益归公。”有的还写明，出师后三年内，收入大半归师等等。

王益正是唱靠把的，他是班主，唱戏又跑红，里外事情很多，名义上我是他的徒弟，却抽不出时间教我，我学戏全靠师兄指点。我每日天蒙蒙亮就起床吊嗓子，接着练腿功、跑场，这样搞了一年，没有学会一出戏，只赚了一口饭吃。剧团里人多嘴杂，说好说歹的都有。有个师父说我是木脑壳，学得出

*尚星云，女，解放前系长沙著名的湘剧艺人，解放后曾担任株洲市湘剧团演员。

戏，他愿啃三块台板子。王益正师父听了这些风言风语，果真把师徒字毁了，我第一次学戏就这样告吹了。

学戏不成，回家呆了一年，父母养我不起，母亲只好到长沙去做女工，我也跟着母亲到姥姥家学打毛线，编织帽子，每天赚几个铜板买米。

姥姥对我很关心，知道我原先学过戏，于是又去找长沙湘剧名旦王玉兰。王玉兰听说我家贫寒，衣食无着，动了侧隐之心，答应收我为徒。王老师没有其它杂事，只一心唱戏、带徒弟。我从十二岁起，正式开始了戏曲生涯。

有了上一回的经验教训，自己又长大了一些，也就懂事了。平日我对师父特别尊敬，对师姐、师兄也以礼相待。那时学戏是非常苦的，福祿寿喜等科班弟子，规矩更多，班里将二、三十个小姊妹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不准回家，家里人送来东西只能从壁上挖的一个小孔中递进去。伙食标准很低，包伙食的还要从中捞点油水。这样一来，学徒吃的只是边皮老菜叶，跟猪食差不了多少。学戏的时间又特别长，从清晨四时起，喊嗓子练功，要折腾到深夜。稍不如师父的意，就得趴在板凳上打屁股，有时先从师兄打起，打个满堂红。被打的趴在板凳上，口咬板凳头，以减轻痛楚，叫作“咬板凳”，打完后还要起来向师父叩头，感谢师父的指导；小姐妹即使月经来了，也不能幸免，不打屁股，改打前腿。我学的虽不是科班，但也是“江湖徒弟”，由名艺人带徒传艺。师道尊严也是很讲究的。头半年清晨四点到八点是练嗓子，接着练腿功。练功是学戏的第一课，要站丁字桩和骑马桩，叫做练裆劲。丁字桩是左脚前立，右脚满子后，脚尖踮立，一手靠腰，一手摆单山字。骑马桩则是双脚站八字形，双膝稍出，作骑马式，双手摆山字齐乳房。练好裆劲，走出的台步既稳又美。没练好裆劲的台步，走起来摇晃不稳，行走如蹒，没有下步劲，特别是碎步、

俏步、挤步、跑马步、螃蟹步，没有档劲是无法走好的。这些道理都是王玉兰师父练功时对我说的。我初练站桩功，一场功下来，周身疼痛，解手都蹲不下去。师父见了对我说：“越苦越要练，吃不得苦中苦，就莫想学得艺中艺”。还告诉我，青衣闺门旦讲究端庄稳重，如果胯下松紧不匀，就失去了人物的端庄稳重气概。做工旦走起来如风吹杨柳，婀娜多姿。要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师父要我在练步的时候，脚上系绳子练半步和碎步。就这样遵照师父的教导，我咬紧牙关，熬了过来，苦是苦了点，却为后来演戏打下了基础。

到十三、四岁时，师父让我跟师兄姐们一道下去唱草台子戏、庙会戏、堂戏。什么叫草台子戏、庙会戏呢？让我交待几句：所谓草台子戏，观众多是乡下劳苦群众。因为没有戏台，搭的是临时棚子，茅草盖顶，三围挂草帘或破麻片。戏钱是由公堂或临时筹措的。庙会戏差不多每月有，例如元月庆祝上元佳节，二月初二是土地菩萨的生辰，二月初三祀文昌之寿，二月十五是祭财神，四月初八祭龙王爷，五月十八祭关圣帝君，二十八城皇生日；还有南岳圣帝、观音大士生日，金凤娘娘和天后宫玉皇大帝等神的生日等等，都要请湘剧班唱戏，每台戏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甚至半月。唱庙会戏，有的有戏台，有的临时搭台，观众站着看。到农村去唱戏，农民兴了个这样的规矩：戏台两边一边放一箩筐烂草鞋，一边放一箩筐鞭炮，他们认为唱得好的，就放鞭炮；认为唱得不好的就喝倒彩，甚至丢烂草鞋。还有所谓堂会戏，艺人们专为官宦豪绅之家婚礼喜庆，演戏助兴取乐。资本家、地主、政客们请客应酬，往往也喊名艺人去清唱，但不化妆。有的年轻女艺人，还要陪客人喝酒，有的甚至被逼迫陪宿，卖艺又卖身。

我经过二年的苦练，有了一定的基本功，师父开始指点我做动作，我学得特别认真，一直练到师父满意为止。我不识

字，学唱特别费劲，师父每教一句，我都靠死记硬背，记不住的，只好求教师姐或其他师父，没有文化成了我学戏的挡路虎。为了学戏，我每天挤时间学文化。这样从早到晚，我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了。深夜等到师父和师姐们都睡了，我还要把一天所学从头到尾过一次“电影”，把各组“镜头”在脑子里重映一遍，不到家的又重新练。有时为一个动作，反复几十遍几百遍地练。我学起戏来就把心思都用上去了，什么都忘记了。记得有一年落大雪，我就站在雪地里练了几个小时，母亲喊了我几次才去睡。半夜，娘起来一摸不见我，大门却开着。娘赶到门外，见我穿一身单衣裤站在雪地里练踢腿步伐，忙把我拉回屋内，用热被窝把我包起后，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我心里只惦记着要早些起床练功，却在梦中起床练功去了。

师父见我勤快，学习认真，很喜欢我，把真本事教给了我。到了十四岁，我就学会了一、二十出折子戏，跟着师父们下去，也能登台表演了。后来几次演出，居然有人放鞭炮。观众的支持，更坚定了我学戏的信心。

艺无止境

学戏越学越入迷，我与其他师父及姐妹出去演戏，看到别人比我强的，哪怕是一句唱腔，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的变化，总要虚心求教，不学会不罢休。长沙湘剧老艺人曾桂芳男唱女旦，很有些名气，特别是唱《烂柯山》（即《马前泼水》），唱作俱佳，他自称这出戏是他的吃饭本钱。我看后深深地爱上了这出戏，但我知道曾不肯轻易传授给人，于是就请妈妈帮忙，几次恳求曾师父指点，求的次数多了，曾桂芳勉强答应了。但要一身纺绸褂裤，一双缎戏鞋，一双高级袜子作谢师礼。我出师不久，生活还比较困难，我们母女俩硬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一笔钱，送了这份厚礼。我怕曾师父留一手，又诚恳地

对他说：“我知道这出戏是你的饭碗，我学会后决不会忘记你的，即使你老了有困难，我也是你的终生徒弟，会照顾你的。”曾见我讲得情深义重，不仅把本事传给了我，又教我上腔，教我做功。

《“柯山”》中的崔氏，在“前逼”中，用的是花旦的演技；在“后逼”中，崔氏从出指投足到念白，全是做工旦的表演。从交财礼银子到将朱买臣气倒在地，崔氏的动作又用了大脚旦的表演。曾桂芳在这出戏中，脸色变化演得更精采，当崔氏听说朱买臣高中，道白“果真中了”，一喜；但一想到自己已逼朱离婚，中与不中又有何关，一愁；继而变为疯癫。曾对于这种复杂的情感变化过程，处理得层次分明。特别是对疯癫的表演，可以说是一绝，只把网子齐眉一抹，两眼成对，眼神呆滞，撩脚招手哈哈大笑，完全是一付疯相。覆水扑蝶的细致做工和痴癫粗犷的笑声，都大大突破了青衣表演的框框。曾教得仔细，我学得认真，基本上学会了。

长沙湘剧名旦彭凤姣有一出拿手戏，叫《陈姑赶潘》，又名《赶船》，唱做双绝，红极一时。我看后做梦都想学会这出戏，彭凤姣见我年轻好学求上进，就利用业余时间认真教会我这出戏。彭看过我演的这出戏后，对个别身段动作又作了纠正。她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教会了尚星云演《陈姑赶潘》这出戏，算是后继有人了。”

我原先是学青衣的，青衣分青衣、闺门两类。青衣重唱工和脸戏。这一类人物，大多属已婚贞妇、烈妇，举止稳重，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秉性贤淑，能吃苦耐劳。表演时一般迈着一字步，双手常怀中抱月，手形如佛手，出指秀丽。《白兔记》中的李三娘，《琵琶记》中的赵五娘，《仁贵回窑》中的柳迎春，这些都是青衣和闺门旦的重戏。

我后来改学花旦，花旦与青衣有所不同，花旦讲究做工细

致，重表情。有花衣、大脚婆、梢搭子之分。花旦在穿着上善穿彩色衣裙。这类人物甚多，有《梁红玉》中的梁红玉，《闹营犯夜》中的樊梨花，还有吏眷和小家碧玉之类，如《拾玉镯》中的孙玉姣，《送银灯》中的桂奶奶等。这些戏比青衣、闺门旦动作大。又有花描，最讲究指型的优美，出指有风，形如花朵，龙须、凤眼、兰花、菊花、佛手等指法。因花旦指语、哑语戏多，须用指法眼神传情达意，才能体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大脚婆戏同属于做工旦，但又别于青衣和花旦，扮演的多是家庭主妇和部分劳动妇女。“三骂”是这类戏的代表作，如《骂灶分家》中的李三春，《骂菜》中的韩大嫂，《王婆骂鸡》中的奚玉珍等角色。这种戏在唱工上口齿要伶俐，使听众有如自己翻书一样一连串；道白像珠子在盘中转一样圆婉。这类戏各有特点，如《王婆骂鸡》，别人的鸡本来是奚氏偷了，别人在骂偷鸡贼，奚氏感到挨骂不甘心，要硬着头皮顶嘴，但只是表面装强，内心空虚。做工上要圆滑麻利，脸部表情则要表现出外强中干的惶恐心理状态。这类角色性情泼辣，举止粗犷，动作幅度大，她们的步法屡变，常迈丁字步、边步、小八字步。发气或吵架时爱拍巴掌，高兴时喜欢哈哈喧天，行路时爱摸鬓拔鞋，说话时喜摇肩弄膀，坐椅时爱撩脚搭手，还爱丢秋波。但大脚旦的表演粗中有美，泼中有俏；既不像摇旦那样粗俗，又没有花衣的娇媚，介乎二者之间，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要把这些戏学好、演好是不容易的，为此，我下了不少功夫。

我十六岁就满进满出，在长沙踩“红麻石”了。我不管参加哪个班底，客串哪个剧团，对待艺术，都非常严肃认真。经过不断努力，我逐渐有了点名气，在长沙各大戏院挂头牌，长沙有名的锦星园、福禄坤班都重金聘请我。

在旧社会，六月二十四和十二月二十四是各剧团的两个过

班期，出出进进都有。在这两天，别人都怕打破饭碗，我却从不为这事犯愁。

与田汉的接触

一九三八年秋天，田汉同志到湖南搞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改编了湘剧《旅伴》、《土桥之战》、《梁红玉》等剧。我演《旅伴》中的主角王瑞兰，该剧借旅途之艰苦，控诉和揭露日本鬼子的血腥暴行。《土桥之战》中我演主角丫头。我当时参加的是湘剧一队，是湖南湘剧的模范队，受田汉同志领导。记得有一次田汉同志请徐特立给我们讲话。徐老讲的是艺术在抗日中的作用，抗日必胜的道理。田汉同志看过我的演出后，称赞我戏路广，演得认真，是年轻的湘剧优秀演员，对我鼓舞很大，更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演戏不光是为了糊口活命，而是发扬祖国的传统艺术，为抗日服务。

落入大恶霸柳森严的魔掌

一九三九年，我二十一岁，正是艺术生涯的黄金时代。长沙大火后，我受聘于长沙二剧场（现又一村青少年宫），在剧团是举足轻重的演员，每次演出都获得不少喝彩声，甚至还有人去后台看我化装下装，为我捧场献殷勤。其中有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子，流里流气地说：“我就要讨这么漂亮的花旦作老婆。”当时谁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因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是长沙粮食行的青年店员，我母亲很喜欢他，经常让他到我家走动。我事业心重，从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可是不如意的事终于连续发生了。如在二剧场演貂蝉与吕布时，我扮貂蝉，小生吴少芝演吕布，当戏演到高潮时，台下突然喝起倒彩来了，是什么地方唱走了调，还是做工出了差错？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但我还是认真唱完了这出戏。演完后我心里总不是滋

味，因为有人喝倒彩，演员是不光彩的。回到后台才听说是因为小生调戏了花旦。戏中本来就是吕布戏貂蝉，这是作戏，大家都只好一笑了之。后我演桂枝写状时，又有人喝倒彩，时隔不久，演拷打春桃时，其中小花脸李少成有一句道白：“教师爷打进老子屋里来了！”这一次不仅下面喝倒彩，横行长沙的大流氓、平时卖弄拳脚的柳森严还带领一班人，从台下打到台上，说这是有意冲撞他的。口口声声要打死小丑李少成。柳拿起凳子向台上砸，把好端端一个剧场，打得个人仰马翻，观众都纷纷逃出戏院，乱成一团。后台老板怕事情闹大，只好出来陪罪。柳森严不肯罢休，一定要李少成交出唱本，说唱本上如果有这么一句就罢了，否则就要送他归天。旧社会学戏一般都是口头传授，很少有唱本，李少成当然交不出，只好硬着头皮出来作揖，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一顿嘴巴。其他演员又出来劝说，柳森严才罢休。经柳森严这一打一闹，剧院受到毁灭性打击，生意冷落了。

一九四〇年大年三十晚上，家家团圆过年，柳喝得醉醺醺地闯进我家（那时我与母亲住在南门口织机巷），一进门就对我母亲说：“今天我是第一次进你家的门，我爱你女儿尚星云，但她不肯嫁给我，我只有死在你家算了！”接着就掏出手枪，对着天花板，乒乒乓乓连打六、七枪，最后装模作样朝自己打了一枪，就倒在地上，地上流了一滩红水。我娘没见过这场面，当场急昏过去。隔壁邻舍不知出了什么事，跑进屋来，见此情形，赶紧用姜汤把娘救起，又把倒在地上的柳森严抬到我床上，并派人把我找回来。当时我正演出，我回家一看，也慌了神。柳森严见我回来了，没多久就“醒”了。说他的名声就坏在我家，如我不嫁给他，就要杀死我全家，三条命死在一起。母亲请人左劝右劝请柳先回家去再说。那年过年我们母女俩哭哭啼啼，不知年是怎么过的。

柳森严当时也听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走动，于是跑到他家里，拿枪对准他的胸膛说：“我准备娶尚星云，不准你再到尚家走动。”并逼我的朋友写“三包”字，一包尚星云嫁柳，二包尚星云不寻短见，三包尚星云不逃跑。“三包”一条办不到，就要他的脑袋开花。他被柳逼得没法，只好到我家求救。他到我家时，见我母女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命，就跪在我母亲面前，请求救命，要娘答应我嫁给柳森严。我娘见柳有三妻四妾，就说：“我的女儿不嫁有三妻四妾的人。”想以此难住柳森严。谁知只过四天，柳就拿着报纸来见娘，说已登报与妻妾都离了婚，如今是单身一人了，与他结婚正是一夫一妻，弄得我娘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时局一天一天紧张，日本飞机天天狂轰滥炸长沙，一颗炸弹就在我家隔壁炸开了，把隔壁的墙炸垮了一边，邻家炸死了几人，我家幸免于难。柳森严逼婚也一天比一天更紧了，娘与我商量，要我牺牲自己去成全家人。我出于万般无奈，只好与大流氓柳森严结了婚，从此我就陷进了火坑。到了柳家，被柳关在楼上看守起来，不准与外人接近，更不说演戏了。

长沙沦陷后，有的艺人被炸死，有的被日本鬼子杀害。如红极一时的小生湘剧演员吴少芝就在逃难的路上被拖死，罗玉廷等艺人也在战争中死去。我跟着柳逃到湘南道县，接着日军也到了道县，我们躲在道县乡下的一座山上。我带的东西仅只一身衣服，一条破烂草席，长期逃难，使我身患重病，躲上山时已经是气息奄奄了。柳认为我失掉了以往的风韵，这回又必死无疑，于是丢掉我下了山，临走时还踢我两脚，恶狠狠地说：

“带着你也是个包袱，你死在这里也不要怨我……。”总算我命大，不知躺了多久，又活过来了。正好柳的两个徒弟还躲在山上，他们不知柳已把我丢了，两人轮流把我背到宁远县城就医。

后来，我逃到了湘潭，柳森严也知道我没死。我怕柳再找麻烦，请人去说情，柳对说情的人说：“要我放生可以，但不准回长沙唱戏。要唱起码要离长沙五十里，不然就要除她的六根，不挖掉她的眼睛，就要打断她的手脚。”

日本投降后，我一直在湘潭唱戏，靠唱戏养活老娘。长沙湘春园老板听说我在湘潭，想仍聘请我回长沙演出，并准备派人去接。柳森严听到这个消息后，警告湘春园的老板说：“你们如果敢接尚星云回长沙，先打好一付铁棺材作准备。”慑于柳的淫威，此后长沙各剧院再也不敢请我了。一直到解放后，我才重新回到长沙渔塘街兰陵剧院，搭国泰班，继续登台演出。

一九五一年镇压恶贯满盈的恶霸柳森严时，我在大会上控诉了柳霸占我、摧残我，及强奸尼姑庵众尼姑（五人）的罪行。人民政府为人民除了一大害，依法判处了柳森严死刑。

新 生

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解放了。不久，我就回到长沙，先后在兰陵、楚南等剧院演出，那时剧院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通过学习，我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湘剧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我作为一个湘剧艺人感到光荣。对其他湘剧艺人的困难我也尽量帮助解决。解放初期，有的剧团亏了本，请我助一把力，我有求必应，先后到益阳、湘乡、沅江等大小戏院帮忙，都是尽义务。

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与湘剧名老艺人徐绍清、徐福慈等共事多年，得到他们很多帮助。一九五四年常德湘剧《思凡》在北京汇演，剧本和演员都获得一等奖。他们回省后，由徐绍清改为湘剧高腔，由我演小尼姑。湘剧名老艺人徐绍清手把手教我演出，获得成功，成为目前长沙湘剧的保留节目之一。我尊

重徐老夫妇，他们也非常关心我，我的很多戏受到他俩的指点。徐福慈老人后在省艺校任教，仍与我保持联系，对我非常关心。

解放后，我随文艺剧团到湖南各地演出，一九五四年巡回株洲。株洲是一个工业新城，文艺界底子薄，株洲市文化部门有意把我们留在株洲，经大家研究后，认为株洲发展前途大，同意落脚株洲。

我在株洲演过很多戏，成为株洲人民喜爱的湘剧演员之一。一九六〇年市里在清水塘成立艺校，我被聘为艺校教师。一心传艺带徒弟。现在我已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没儿没女，却有很多徒弟经常来看我，关心我的生活。如湘潭的田素如，长沙的何淑芳，株洲的毛乐波、倪凯丽等待我都很好，定期或不定期的帮我买米买煤、洗被子，真是亲如娘女。我也感到极大的安慰。

为了抢救湘剧艺术，把湘剧艺术留给后代，一九八一年三月省戏剧研究所请我到长沙住了两个多月。不巧我那时正在害病，发高烧，但仍带病彩排了《杀媳》等节目。目前，我生活得很幸福，这是过去我作梦也没有想到的。

（单先大 陈 希 康 骥整理）

（原载《株洲文史》第八辑）

我与巫家拳

黄福祥*

拜马道人为师

我家很穷，我不知道我的生身父母是谁，很小就被袁德胜收养，长到四岁，养父袁德胜又死了，养母不得不改嫁；大舅黄德生没有崽女，就把我带去收养。

大舅住在长沙市下碧湘街（鼓楼门口子上），他晴天给人抬轿，雨天拖黄包车，凭力气赚钱糊口。穷人的孩子不能光吃饭不做事，我六、七岁时，外婆把一个破篮子交给我，规定每天出外捡一篮未烧尽的煤碴或一篮干树枝回来供灶。我家隔南门口不太远，出了南门口笔直上去就是天心阁，我知道那里有柴捡，于是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起床到那里去。记得我九岁那年（一九三一年）六月间，一次我到天心阁捡柴，见一些人围在那里，一个道家打扮的人在那里教拳，我也站在旁边看，大约看了十多天，这个教拳的师父（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马岳霖，人称马道人）见我看得很专心，对我说：“你天天跑来看，是想学吗？”我说：“想学。”他又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我说：“父亲死了，母亲改嫁，现在舅舅家，由外婆带我。”师父见我说得可怜，答应收我做徒弟。我十分高兴，每天天没亮，就跑到天心阁，将胳膊按到树上拗手劲，还练站桩，我练了一阵后，师兄们才陆续到来。我想穷人可怜，我们女孩子更可怜，我要

*黄福祥，女，系巫家拳第五代传人。解放后曾任株洲市湘剧团武打演员。

练好拳，以后有谁敢欺侮我，我就打他。我有了力气，做什么都可以。就这样，我在马道人那里学了三年拳。后来我从师父和师叔们那里，了解到我学的是巫家拳，也了解到巫家拳的来历。

巫家拳的历史和特点

巫家拳的创始人叫巫必达，字有能，生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福建汀州府连城人。连城人民自南宋以来为了抵御外侮，就有习武之风。巫必达自幼爱武，始习南少林拳法（福建称连城拳），刻苦练功。他为了进一步探求武术的奥秘，从青年时起，即远离家乡，云游南北，拜访武林高手，足迹遍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湖南等地。在湖南期间，他一边授徒，一边精心学习武当内家拳法，独得精妙。乾隆末年，巫必达先居湘潭县株洲大石围李大魁家教习拳术，后又到马家河冯南山、冯连山兄弟家教授武。李、冯两家均得巫必达真传，李大魁精耙术，冯南山、冯连山精棍术。清嘉庆壬申年（一八一二年），巫必达病逝于冯南山家，终年六十二岁，葬于湘潭市东郊黑石头后高家冲尾，由李、冯两姓门人修墓立碑。

巫家拳是巫必达将福建少林拳术的各种攻、防手法，与武当内家拳法的藏精、蓄气、培神固本之秘旨，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既有别于少林南拳，又不同于任何一种内家拳的独特拳法。巫必达晚年将其拳术整理为各种套路，有的套路偏刚，有的偏柔，后逐渐融会贯通，形成有刚有柔，动作紧凑，衔接自然，环环相扣，布局严谨的拳法体系；操拳时有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其拳势刚健敏捷，干净利落，气势风韵别具一格。巫家拳传人在授门徒时，都根据其身体素质，因人施教，让门徒各得其精妙。现在民间流传的主要套路有：拳术类有梅花拳、太子金拳、麒麟六肘、田字六肘、正平六肘、摆门六肘、单吊六肘、掐吊六肘、三桩六肘等；器械类有七步连针、

棍术、耙术、凳术、巫家单刀、双铜、金钱标等。

我得知巫家拳源远流长的历史后，习武的劲头更足了，师父见我舍得花气力练，也对我另眼相看，除教我拳术外，还教我双铜、柳叶单刀、凳术等。师兄黄忠义、马振鹏（马道人之子）等见我练武时有的招式动作不准确，也及时帮我纠正。

拜师学戏 继续习拳

黄元和是马道人的师弟，常到马道人这里来看他教拳，还要他的儿子黄柏勋也跟马道人学打。就这样我认识了黄元和，叫他师叔。黄元和本人是湘剧领班。原先湘剧演员都是男的，黄元和组织了一个福禄坤班，招的全是女孩子，已经招过了一批。他见我习武的身法好，就问我愿不想学唱戏。当时唱戏的社会地位低下，平日我对唱戏的印象不好。但那时女孩子找个工作比登天还难，觉得跟师叔去学戏也算找到了一个饭碗，便就答应了下来。那时拜师要四块光洋的红包钱，碰巧我的养母从长沙乡下来到长沙市一个姓何的太太家里做女工。她很会梳巴巴头，何太太的头，每天都是她梳的，两人很合得来。母亲和何太太打个商量，借了她一颗韭菜边的小金戒子换了，拿了四块银洋给我。

我记得我们三十个徒弟在长沙景星园办拜师酒，大家跪在地上，将打人的篾片用双手捧上献给师父，每人还磕了三个头，算是一切都交给师父了。起先我们这些女孩子的艺名都叫筱福某某，我的艺名叫筱福祥，后来有人提出姓筱不大好，索性跟师父姓算了，我也就改姓黄了。

我十二岁学武生，练功时，师父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他学过四年巫家拳，这家拳法活动范围小，拳打卧牛之地，要求藏身敛气。记得师父叫我们练小翻，先在地上练，要求一下一下手脚都要翻在椅垫子上，练得他认为满意了，就把椅垫子放到桌子上，要大家到桌子上练。大家有点怕，不敢上去。师父

拿着篾片对着我们劈头盖脸打来，眼看就要打到我头上了，我一狠心，一个纵步跳上了桌子，在桌上翻起来，师父也认为不错。还有练站桩，方法是将一条长凳倒翻，两人一头一个站到凳脚上，学旦的要蹀躞子（蹀躞子是木板做的，缚在脚上，用脚尖站在凳脚上）。师父站在一边看，谁先下来就打谁。每次我都死劲忍着，等对方跳下来时，才跟着下来，这样既不会跌倒，也不会挨打。在学徒期间，我是最刻苦的一个，也是挨打较少的一个。但不是没有挨过打。师父们都有这么一个规矩，一人犯了事，要打满堂红，不过犯事的人被打得重些。

用巫家拳惩罚恶老恶少

我们三十个艺徒大约只学了一年戏，就跟师姐们做下手，跑龙套，到来阳、郴州等地去演出。三、二个月后，我们小班的也都陆续登台表演了。那时我只十三岁，不懂事，天不怕，地不怕，师姐们都叫我“祥猛子”。记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我们班在郴州演出时，有一天当地有个地主摆酒席，请我们去唱戏。我心想我是演武生的，唱功很少，去干什么！师姐们见我不要去，就说：“要在码头上站，不结交人不行，既然老太爷请你去，不去不好。”我没法，只得勉强跟大家去了。到了那里，只见一个六十多岁高瘦的老头子裹着皮袍子坐在太师椅上，面前摆了一盆炭火。他叫我们坐好后，随即点了一个小折子戏。师姐们便清唱起来，唱完了，老头子很高兴，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口里不干不净地说什么“人老心不老”等病话，还对我动手动脚。我一见这流氓行径，气得不得了，一闪身，一个猛虎伸腰拨开他的手，他回过手来仍想抓我。于是我一塞河掌朝他腰部击去，顿时老头子立脚不稳，啊呀一声向后倒去。正巧倒在炭盆里，把皮袍子烧烂一块。我见闯了祸，拔腿就跑，跑到师父那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我知道师父

有个脾气，如果在外面打架 闯了祸，打赢了，他兜下来，打输了，他可不依。他听说是打了“老太爷”，只说下回莫这这样猛，要看人行事，还说这老家伙经得几打，打死了就不好办了。以后听说师父找了当地一个什么陈指挥去调解，赔了老头子一件皮袍子才了事。

一九三六年，我已经十四岁了。那年春上，我们福禄班到茶陵演出。我记得有一天出太阳，我们几个姐妹相邀到街上去玩，迎面碰上一个大少爷模样的人，喝得醉醺醺的，由几个人搀扶着歪东倒西地走来。他见黄福秀长得漂亮，就将她拦住，伸手到她身上乱摸。我最恨别人将我们女艺人当玩物，见状不觉七窍生烟，我走上前去一机手，将恶少的手拨开。醉汉乘着酒性向我扑来，我用封面阳掌打去，即张开巴掌封住他的脸，接着用手掌托住他的下颏往后一推，只见他四脚朝天，跌倒在地。三个护驾的见打了他们的“大少爷”，围住我就打。我用架掌，拨开他们的拳，又用偷漏掌把护驾的打开。我班男女演员十多个见状也一拥而上，把恶少打得五痨七伤。护驾的跑到镇公所叫来了枪兵，把我们的人抓去了。有个枪兵跑来拿我，我肩肘一沉躲过他的手，左手一抬肘，右手一单掌，将他打得向前一扑，我乘机拔腿就跑。我跑到城边不远，看到一队国民党士兵在那里下操，他们中间有一个当官的，我认得。他爱看戏，经常在戏院子里冲进冲出。他很爱看我们这些细妹子打筋斗，平日见了我就喊打个筋斗看看。我知道他是逗我玩的，要我打筋斗，我就打筋斗，因此与他很熟。这时我跑到他面前告诉他，我们的人被抓到镇公所去了。他二话没说，带几个枪兵到镇公所把人给放了出来。

这时我的技艺已大有长进，特别是“铁公鸡”这出戏，不但是我的拿手戏，也是我们班子的压台戏。每到一个地方，我的“铁公鸡”一出场，地方上的一些“人物”看了都说好，有

的还想收我做干女儿。班里也很重视。大家研究，索性将“八大庙”、“三雅园”、“铁公鸡”这几出武打戏，改做京戏唱，音乐上用的也是京剧锣鼓，武打则是巫家拳，刀、铜、九节鞭、三节棍等巫家器械一齐上。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我们班子到攸县演出。我们跑江湖的有个规矩，到一个地方都得拜码头，结交一班有钱有势的人。我到攸县后，就拜一个姓周的开盐号的老板做干爹，干妈是周老板的小老婆，她当场给了我八块光洋作见面礼。回班后，适逢过班日期（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和十二月二十四日为过班期，哪个班接了你，二十四晚上就在那个班里演出一晚，你就是这班里的人了），加上师父的姘妇从湘潭来到攸县，到铺子里除了一些帐，戏班生意又不好，这些事凑到一起，师父不想在攸县混下去了，就暗地派人到河下包了一只船，把戏装行头偷运下船，戏院里只剩几口大箱子装装样子。

逃脱了贺屠夫的魔掌

一日，当地一个姓余的团长生日，我们全班人到余团长家唱堂戏祝寿，贺石生也来到余家吃寿酒。席间，贺石生一时兴起，叫他的崽打一路拳给大家看。我师父黄元和也叫我打一路麒麟六肘助兴。打过之后，贺石生看得入眼，又要我打一路，我即又打了一路掐吊六肘，贺石生竟看上了。他拿出两百块光洋交给师父，同我师父讲：“给你两百块钱，我帮她出师，你就把这妹子给我做媳妇。”师父这时正欠一身帐，过班的艺人又问他要钱，过不了关，没法只好将钱收下，把我带回戏班，将这两百块钱分给了大家。当时我并不知道内情。当天晚上师父将我喊夫，问我：“明天李桂生叔叔带你去拜干妈，你去不去？”我听说是去拜干妈，就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桂叔带着我来到汽车站，我起眼一看，见接我的

人尽是一些当兵的，一个女的也没有。这时我想到贺石生，大家叫他贺团长，是带兵的官，莫不是师父骗我？又一想事已至此，怕也无用，一狠心就跟桂叔上了汽车。汽车开到醴陵，由当兵的领着我们，拐了三个弯，这时我处处留意，暗暗记住拐弯处的特点，心想万一有问题，就一跑了之。我还记得有一拐弯处是一间南货铺子。走不多远，到了一个小旅社里。只见屋中摆了一张四方桌子，贺石生坐在那里，这时我才注意看贺石生的脸，蓄两撇八字胡，一双眼睛阴森森的。贺石生要我们坐好后，就问我：“你是来做什么的？”我照直回答道：“师父要师叔领我来拜干妈的。”贺石生皮笑肉不笑地说：“不是，是同我作太太！”我听后吃了一惊，心想你比我爷还大，那才不行呢！便连连摇头。贺石生见我摇头，便笑了笑说：“这不碍，男人大些，会把你看象宝贝一样。”我听了这话，感到很恶心，接连说了三个不字。贺石生见我不肯，就走出去，不一会拿着一包用手帕包着的东西走来，往桌上一放，是一小堆金首饰和光洋。贺石生指着这些细软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你将这些东西拿去，嫁给我作太太，把你娘也接到我屋里来享福。”我回答道：“我没有这么大的福！”贺石生两眼死死盯着我说：“第二条路是你也将这些东西拿回去，我给你挂衣。”我不知挂衣是做什么，便问桂叔。桂叔难过地说：“贺团长要你跟他睡头晚。”我一听这话，怒火直冒，站起来把桌上的东西一摔，扭头就跑。贺石生见我跑了，随即派两个兵跟上。我跑得快，没命地朝原路奔向汽车站，我身上有干妈给的八块光洋，立即买了票，刚要上汽车，那两个兵赶到，一拥而上，一个抓住我的左手，一个抓住我的右手。我见状一个鸳鸯肘，扭开他们的手，接着一个双袖肘，他俩的胸口同时挨了我一肘，他们被打得朝后面一倒，我趁机往汽车上一跳。司机看过我的戏，知道当兵的来抓人不是好事，连忙

开动了汽车，把两个当兵的甩掉了。当时我不知道贺石生的浑名叫贺屠夫，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碰巧戏班里发生一桩意外的事，我这条小命，恐怕早已丢了。

我回到班里，这天晚上我还参加演出了“铁公鸡”。师父的儿子黄柏勋（小名叫保伢子，我叫他保哥）和我同台演出，我们对打的时候，只觉他一脸煞气，手里的刺枪对准我的咽喉使劲刺来。后来班里的人对我说：“你们演到这里时，有一个观众走到后台对我们说：‘这伢子煞气重，招呼这妹子受伤，赶快停演’。”后台告诉那个观众：对打的戏就完了，以后只有打筋头的戏了。他才放了心。

原来黄柏勋爱上了本团女艺人肖福琴，她却决定嫁给攸县一个大老板做小老婆，把保哥急得疯疯癫癫。我们班里打鼓的彭益斋是个鸦片鬼，他有两盒鸦片烟膏，不知如何被保哥发现了。保哥听人说过吃下鸦片烟，就象喝醉酒一样，几天后就会醒过来，不会死的。于是他胡乱地写了一些话，批评他父亲不应该把我卖了，还写了“我死不要埋，百日要转来”等等。后来，彭益斋不见了鸦片烟，却见黄柏勋倒在地上，还看见他写的字条，才知道他服了毒，终因他吞毒太多，抢救不及死了。

当那两个兵第二天赶到班里来，正碰上这事，他们还以为我与黄柏勋要好，我被卖给贺石生，黄柏勋因悲愤自杀了。他们还了解到班里欠了码头帐，行头也被镇公所扣了起来，要还那卖我的两百块钱也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回去将事情的经过报告了贺石生。贺石生见黄元和人财两空，没有什么油水，也就算了。这事发生后，攸县的头面人物觉得班子在县里散了，也不光彩，师父欠下的这点子码头帐也就这样一笔勾销了。六舅知道我在攸县出了事，特地跑来将我接回长沙。

一九三八年，我在长沙新湖南戏院演《三打祝家庄》，这出戏中间有“打擂”一场，马道人的儿子马振鹏，还有师姐宋

碧文，师兄冯湘杰等人都参加了。大家打的都是巫家拳，热闹极了，不少观众看后说：“我们看了这么多武打戏，只有这场戏打得精彩，好看。”

解放后的几段经历

解放后，我们艺人虽说在政治上翻了身，不再被人视为贱人一等的戏子了，但是剧团要自负盈亏，靠大家挣钱过日子。一九五五年七月底，我们艺文湘剧团在株洲市解放剧院演出，那时我已怀孕九个月了，肚子胀得象鼓一样。因“劈山救母”这出戏能卖满座，舒炳炎老师不得不硬着心肠让我演出。我挺着肚子演沉香，这中间有一场戏要从三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上翻下来，我仗着我师父马道人教我的轻功，朝后翻时，身体放松，将丹田气往上一提，不用一点劲，任其自然地翻下来，轻轻落下，稳稳站住，再呼出气，安全地渡过了这一关。我自己还不觉得怎样，可把观众给吓坏了。有个观众还特地跑到后台来提意见，说：“这演员有这么大的肚子了，这号戏不应让她演，救人要紧。”以后剧团里就不让我登台了。我回到家里，于八月十九日生下了孩子。

旧社会，武林门派森严，轻易不露底。在班里除师父和保哥外，大家都不知道我打的是巫家拳，班里的人要我教打，我就把自己编的一套巫家五路方天印教他们，他们还把它当作少林拳。解放后，我也没有露底。

一九五六年，浏阳县花鼓戏剧团请我去教武术。八月，我回到长沙，一下火车就看到戏剧界许多人站在那里，一问才知道师父黄元和患了食道癌，暂居火车站旁的旅社等火车。原来在抗战时期，田汉曾在长沙搞剧改，我们戏班被编为抗日演剧第三队，因此，师父和田汉很要好，这次田汉听说师父患癌症，特地接他到北京去治疗，这些同行们都是来给师父送行的。为

了避免打扰他，规定一个团只派一个代表进去。我走到门口，被守门的拦住了，我急了，说：“请通报一声，只说他的徒弟黄福祥来了。”师父听后，马上喊我进去。我进去后，师父握着我的手，再三叮嘱：“武术也好，湘剧武生也好，都要传出去，为人民服务。”等我答应了，才让我走开。

师父的话我一直没有履行。后来我们艺文湘剧团来到株洲，在株洲市落了脚，一九七二年与株洲市花鼓戏剧团合并，两年后，我也退休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论武术，我在武林中算老几，巫家拳传人有的是，我能起什么作用？一九八二年第十二期《武林》杂志上登了我师兄黄忠义拳师一篇文章，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我是巫家拳第五代。这事被株洲市老年体协张俊才知道了，他是个热心人，为了找我，在株洲市找到了四个黄福祥，并耐心地一个个去拜访。最后找到了我，使我很感动。经他再三动员，我也乐意出山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举行的株洲首届老年运动会上，我获得了拳术、器械项目第一名。从这年四月起，我在市体委办的健身辅导站教巫家拳，到现在已办了十一期，学员约九百余人。这些学员中有筋骨疼痛的，身体衰弱的，通过锻炼，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据我了解巫家、薛家、沈家、岳家为湖南四大名拳，巫家列为四大名拳之首。巫家拳第一代传人为冯南山、冯连山、李大魁等；第二代为贺辅堂、冯昭庭、冯霞斌、杨明曙等；第三代是冯友明、周罗云、孙明亮等；第四代有戴荣璋、冯玉生、宾四铁、王印池、马岳霖、唐辉典等；我忝列为第五代传人，还有许七满、冯锡久、张俊辉、周玉生、陈凤祥、黄忠义、张福生、赵昌明、肖叔科、张承科、尚益学、冯湘杰、颜子俊、刘仲卿、黄少奇、宋碧文（女）、欧前远、谭海林等。第六代、七代门人则遍及全国各地。

近年来,在我师父马道人的媳妇宋碧文拳师的帮助下,找到了师父留下来的拳谱。现在我决心潜心钻研,重新琢磨练习,将有生之年奉献于武术事业。 (康 骥 整理)

(原载《株洲文史》第八辑)

我的出家

刘绍宗*

出家的原因

我十七岁出家，和我一同剃度（削发）的有大姑母的小女儿万中秋，都拜姑母如镜老师为师。我俩于一九三五年在湖南衡山清凉寺受具足戒（三师七证说戒），首先是“沙弥戒”，其次是“比丘戒”，最后是受“菩萨戒”。全国著名的讲经法师空也和尚为传戒师。在戒坛里要行一个多月佛事，并学习佛教的规矩礼性，还要燃香供佛，早起晚睡，相当辛苦。当时寺内众比丘尼选我当“沙弥头”，即受戒众尼的带班人。我就更加忙碌了。我们年轻出家，引起当地许多人的议论，他们借着焚香拜佛的机会来看我们，困惑地说：“这样年轻的姑娘，显得多聪明活泼，为什么会出家呢？”这自然是有原因的。

一、我家祖居湘潭市“双壁无瑕”，与凤竹禅林只有一墙之隔，我们随着寺内的晨钟暮鼓早起晚睡。寺内住了一位著名的长老大智和尚，很有道德修持，和蔼可亲，深受当地群众尊敬。我的母亲也皈依了老和尚。她经常带我去寺内烧香敬菩萨。寺内一尘不染，清净恬适，灯烛辉煌，鸟语花香，行起佛事来，异口同声，梵音嘹亮，异香满室，令人心旷神怡，依依难舍。

二、我姨祖母中年失去丈夫，没有儿女，拜大智和尚为

*刘绍宗，女，曾任湘潭市弥陀禅寺监院师。现任湘潭市政协委员，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师，出家学佛。随后两个姑母，一个姨母也受到影响，三人一同幼年出家。邻居黄俊吾一家母女六人也出了家。还有我的堂姊妹云，也步我的后尘于一九三七年在海会寺出家受具足戒，传戒师为灵悟和尚。当时社会上也传说：“双壁无瑕、凤竹庵是佛子诞生之地。”这样我就感到生老病死果然是痛苦，一定要求离苦得乐，作出世之高人。

三、旧中国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我当时很想读书，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长辈们就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能识几个字，看得懂信就够了，读什么书！”这样我只好呆在家里帮母亲做饭，带弟妹，学针线。我感到十分乏味。一有空，我就爱看小说《香山记》，它对我的影响很大。妙善公主，不恋皇宫，三岁就把弥陀念，受过千辛万苦，不生后悔之心，结果成为大慈大善的观世音菩萨。我历来就有“竹篱茅舍风光好”的思想，一想到做家庭妇女，我就觉得苦多乐少，没有意思，不如出家，清高少烦恼，当一个比丘尼也许还自由自在些。

四、我经常到姑母、姨母寺庵去玩，看她们生活得很安静，有时搭别人念点经忏，抓点收入，什么烦恼也没有。姑母很爱我，也体贴我，了解到我的内心苦闷后，便对我说：“出家好，任你往哪里走，不受拘束，可以云游四海。你识字，学经忏很容易，拜我为师，将来保你上佛学院读书，好好造就成为一个著名的女法师，去天下名山求参学，那该多好啊！”姑母说得十分恳切，正合我心。于是，我作出了出家的决定，削发为尼。

我在衡山清凉寺受戒后，领取了“戒牒”（身份证）。这就证明我已经是一名正式的比丘尼了。可以念经，可以参拜，可以到十方丛林“挂单”（即住宿，长住叫“挂长单”，短住叫“挂短单”，而且不取分文食宿费）。

一九三六年正月初八，我和戒兄心月师一同去长沙自在禅林挂长单、求参学。自在禅林在长沙市南门外熙台岭，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十方比丘尼丛林。当时那里已经满单（无席位）。但见我俩年轻，信佛虔诚，经知客师与僧值师研究，监院师批准，终于准了长单。

自在庵的形式

自在庵是长沙比丘尼四大丛林中最大的一个，长住比丘尼百余人。

走进山门是一间大厅，宏伟庄严，使人产生一种肃穆的感觉。大厅右边是清规堂，为接待十方比丘尼的场所，正中香几上摆有清规牌，右边是知客师的香板子，左边是僧值师的香板子，壁上挂着同住清规，收拾得幽静整洁。大厅的后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天井，左右各布置寮房（即比丘尼的宿舍）。再进去是韦驮殿，韦驮菩萨示现将军身，保持寺院修行者的安全，维护佛法。韦驮殿两旁是客堂，中间是大客堂，大方美观，举行佛家的宴会时，这里可设席十二桌。客堂左右是天井，杂植花木，四季芬芳。天井有两线长方壁，左壁上画有唐朝十八学士，右壁上则画有宋朝七贤。画笔精美，栩栩如生，吸引着游客们驻足观赏，赞不绝口。天井中设有假山、金鱼池，绿荫遍地，格外雅致。客堂进去是大雄宝殿，中央供奉释迦牟尼佛，右边是药师佛，左边是阿弥陀佛。大殿内香、花、灯、幢幡，罗列庄严，真是佛烟缭绕，灯火辉煌。俗语道：“要有皇帝的福，才能住三宝的屋。”大佛殿后面为观音堂。右边有过道通禅堂，禅堂中央供奉着西方接引佛，两旁靠壁整齐地排放着一条一条的长凳子，是参禅打坐用的。左边有过道通斋堂，斋堂中央供奉着监斋菩萨，两旁整齐地摆着长桌和长凳。僧尼们在斋堂里吃饭时要念供养咒，过寂静无声的集体生活。每餐吃一

样菜，八大职事也不例外。除老病和特殊情况可以自由开餐外，其余一律不得破例，即所谓一个和尚一份斋。一眼望去，大佛殿、禅堂、斋堂，恰成一个品字形，设计师是花了一番心血的。禅堂右边是方丈室，两旁有寮房，斋堂左边是祖堂，即比丘尼朝祖之处。纵观全寺格局，布置得层次井然，大小适用，环境幽美，景致宜人。寺院的建筑，实在令人感到奇妙和伟大了。

寺院的人事系统

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就寺院的人事系统来说，有一百零八职，每职一人。

首先是四班首，分为东座、西座、后堂、堂主。她们是从林中资格最老，出过大力，作过贡献的长者。所谓“班首”，实际上是一种荣誉职称，不负具体责任，不随众比丘尼做日常功课。寺内有大一点的问题，都要向她们汇报请示，因为她们在丛林中最有道德修持，也最有威望。

其次是八大职事。一是都监师。她主持全院事务，如其他七个职事缺员时，她又可以代替。二是监院师，实际上她为一寺之主，主要抓全寺僧尼的生活。百多人的生活，没有产业收入，纯靠缘法，包括帮别人做经忏佛事、檀那施主护法、打七、做法会等抓收入，担子确实不轻。每三年改选一次，任职期满后升为都监师。三是知客师，她不仅要接待十方挂单的僧尼，还要接待社会上崇信佛教的善男信女，以及参观访问的游客。她既要熟悉丛林的规章制度，又要懂得普通的佛学知识，所谓佛法与世法都必须两相应付。四是僧值师，她是全寺的执法者，谁违反了清规戒律，就依法处分，不讲情面。五是维那师，即掌坛师，专管禅堂内的规章制度。禅堂为众僧尼每日参禅打坐之地，若无执法者严加管理，即不能保持其严肃虔诚。维那师手下还有悦众师、清众师，她们是主持敲法器的，法器

即佛教的乐器，包括铛子、钹、铃、鼓、引磬、木鱼等。司水师，即禅堂行茶者。当众僧尼念佛过久，归位缩趺坐休息，感到口渴时，司水师就热情地走向各人面前行茶。香灯师招扶禅堂香火。殿主师打扫禅堂卫生。六是书记师，掌管寺内一切文书工作。七是副寺师，为监院师的助理，协助管理库房工作。八是典座师，管理厨房事务，如丛林来客做经忏佛事、做法会要办斋席，即由典座师掌锅。平日做菜，则有贴岸师；拣菜、洗菜有杂务师；招待人客的茶水、开斋席等事有照客师；买菜有贴库师；买煤米油盐等物有库房师；病了人，有汤药师；看守山门的，有门头师；扫厕所的，有净头师。总之，全寺各项职务都设有专人负责，各司其事，各尽其责，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方丈一职，则更高于八大职事，比丘尼中很难物色这样一位人物。因为方丈本人要精通佛学，要有道德，要有文学修养，在僧尼教徒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才能胜任。过去衡阳香林庵，是唯一比丘尼丛林中设有方丈之处。一般方丈，只设在比丘尼丛林里，因为她要传戒说法。

寺院的生活及制度

比丘尼丛林中的生活，是十分机械的。每日七朝佛事。清晨四时左右，就听到起床的钟板声，起床后，盥洗完毕，大众都进入禅堂，搭好袈裟，入大佛殿做早课，念的是《楞严咒》。早课后，仍回禅堂，吃饭梆响，再由禅堂整队依次进入斋堂早餐。僧值师早就站在斋堂前面，进行监斋。有行堂师添饭。饭前唱“供养咒”。吃饭时，按各自的座位坐好，不准有半点声响。如需要添饭菜时，不准喊叫，只要把饭菜碗放在固定的位置上，自然有行堂师为你添好饭菜。饭后，只须把碗筷放在固定的地方，摆整齐，再唱完“供养咒”，依次整队回禅堂。

早餐后，休息一刻钟，脱掉袈裟，回禅堂点香，这枝香是计时用的，因为有一个香牌子为准则，香到位了，悦众师就打钟板，这是信号，大众在禅堂集合，念大悲心咒心经，绕佛。香火燃到五寸左右时，各归坐位饮茶，茶后，打坐止静。此时整个禅堂内，形成一泓无波的池水。香坐完了，开静念佛唱偈子。十点钟左右，这朝佛事完毕，然后送香敲梆。这个信号有两个作用，一是告诉厨房里准备做饭；二是告诉众比丘尼准备退堂休息。

十一点半钟，贴岸师饭菜煮熟了，即敲梆，众比丘尼进禅堂，搭上袈裟，排队进入斋堂就午餐。饭后又遵照早餐的惯例，燃香念弥陀经，念佛、打坐、止静、开静，再念佛、唱偈子、打下堂休息。至下午四时，又敲梆，第一个作用是厨房闻梆声做晚饭；第二个作用是大众师进禅堂，集合众比丘尼搭袈裟整队进入大佛殿做晚课。晚课毕，进晚餐。有过午不吃的，因此晚餐就自由过散堂，不要进禅堂搭衣整队，念“供养咒”，晚饭毕休息。

黄昏后，进禅堂，悦众师燃香，按照下午的例规念完一枝香。接着开大静。九点半钟打洪钟，然后回寮房就寝。二板息灯入睡，不能响动，谁要撞了静，就得求忏悔。

每月规定初八、十四、二十三、三十为假期。假期里，仅清早上殿做早课，其余时间就可以自由活动。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套规定：如站立要像“一根葱”；坐着要像“一座钟”；行路要如“一线风”；睡着要像“一把弓”。念经打坐时，必须眼观鼻，鼻观心，把思想集中到一个“静”字上“默佛”。

平时不准高声大喊，不准嬉笑怒骂，不准说是生非，不准闹歌起舞，不准穿红着绿，不准看戏打牌，不准窜寮闲扯，不准三五成群外出游玩，不准和青年和尚打招呼，不准引男客进

寮房，不准侵损常住（即集体）一草一木，不准攀私人缘法；做课时，不准迟到早退或中途退出，有要事或生病时，必须向僧值师请假等等。五大戒是“杀、盗、淫、妄、酒”，谁违反了，轻则求忏悔，罚“放参”，取罚款购菜供佛，求菩萨恕罪。供佛后，给大众师吃。重则跪香或被驱逐出院。

比丘尼中谁要下山还俗，不留，丛林执事可以批准。但必须远走高飞，不能逗留寺院附近，众比丘尼亦不得和她往来。

上述种种清规戒律，可能我记得不全面，其严格、机械，不是一般俗人所能理解的。它总的目标是，把每个人的思想、行动、言论束缚起来，使之无法乱想乱动，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初入空门，总有些不大习惯，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感到饮食起居都有规律。

寺院的节日和盛会

寺院的节日很多，兹举其大者如下：大年初一是弥勒佛圣诞。二月初八为无量寿佛圣诞。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佛圣诞。观世音菩萨节有三个：一为二月十九圣诞；二为六月十九成道；三为九月十九出家。每逢这些节日，寺院都要举行集会祈祷，礼节最为隆重。

法会也有多种，而最大者为“水陆道场”。它的目的是祈福荐亡，祈福小而至于个人消灾延寿，大而至国家安定、世界和平。荐亡，是超度水陆亡魂。“水陆道场”的规模很大，设一个法坛，四周要用黄色绸子铺设，并陈列四十九个座位、四十九盏明灯、四十九束鲜花、四十九盘香果。这些设施，每天要更换，力求新鲜。有道德修持的方丈坐立中央，讲经说法。旁坐者亦相应念经或唱赞词，唱词优美，是佛教中最高级的音乐，气氛十分肃穆。时间为四十九天。

做这样的道场，必须有个信佛多财的施主拿出一笔巨款予

以资助，才能做成。我们湘潭市历年来只做过一次，即祇修老和尚于一九二九年在海会寺作方丈时，举行过一次。当时是湘潭市郭葆生的夫人为施主，以后再没有做过了。

盂兰法会，则定期在每年七月初一至十五进行，夜间，设法坛拯孤放焰。拯孤，是拯拔孤魂野鬼，离苦得超。“焰口”要唱四个小时，唱词有九板十三腔，配上音乐，相当动听。放河焰还得扎各种彩色的灯盏，浮在江面上，光焰夺目，随波浮沉。

坐在焰台正中的，一般要是的道德修持的僧尼，要传授秘诀，一要做手印，二要作观想，三要化台，四要化帝令。普通僧尼是不能担任的。

“打七”也是一种法会的形式，比其他法会简单些。所谓“七”，就是七天七夜不间断地念佛。为什么要“打七”呢？原来各地寺院的僧尼都不从事生产，每日只行七朝佛事，她们的生活来源，一种是寺庙本身管有田产房产，靠收田税房租过活；一种是没有任何产业，她们就依靠社会上崇信佛教的善男信女“施舍结缘”，即捐款支援。另外可为一些信佛的人念经拜忏、祈福荐亡，每做一次，都有一定的收入。“打七”则是每年寺庙内照例举行的二次法会，实际上是抓收入，借此机会，广结佛缘。总之，寺内各种活动繁多，众僧尼在思想上是比较紧张的。

自长沙回湘潭

一九四二年，我回湘潭弥陀寺居住。湘潭原先没有比丘尼的丛林。郭葆生的夫人是个居士，发心做功德，便花了一千八百多银洋，买了安徽班所管的“念佛林”旧址，开辟了比丘尼的新道场。还花了三千多银洋，修建了禅堂、斋堂、客堂、寮房，接来长沙自在禅林的班首师作具体指导。开办时的当家师

是净尘老师。后来议定我的师兄谈宗师任监院师，我任知客。八大职事均配齐了，住比丘尼五十多人，一切制度照自在禅林一样，大众生活得还安静。寺里面有金银桂花树、茶花树和其它各种鲜花，空气流通，环境优美。

弥陀寺规模很大，前面有很大的空坪，建有围墙山门，门上写着对联，起边是“净地何须扫”，落边是“禅门不用关”。由于寺庙宽大，经常有国民党的军队来骚扰。有一次进驻了一个连，所招的新兵，实际上是抓来的壮丁。每天由保长送来的壮丁，个个愁容满面，苦不堪言。有一天，跑了两个壮丁，连长派人去追，没追到，闹了一个通宵。第三天晚上，又大吵大闹，又是跑了人。连部派人四处寻找。我们也出来观看，只看见三个壮丁躲在大佛殿的屋顶上，无法逃走。地下的士兵用枪口对准他们喊：“下来！”三个壮丁一听，就往前跑，结果枪响了，一个人中弹，腿下鲜血直流。师兄和我苦苦哀求连长：“不要再開枪了，等他们下来再说”。连长答应了，持枪的士兵纷纷上屋，将三个壮丁抓下来。受伤的这个，已不省人事，其余的两个被绳子绑住，面无人色。第二天早上，连长在大坪里集合，把两个逃兵按倒在地，叫每个士兵上前打几扁担，打得他俩喊娘叫爷，惨不忍睹。这叫“杀鸡给猴子看”。

湘潭沦陷时期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了湘潭，我和师兄逃到衡山大桥湾礼厚真人殿。六月十一这天，我和师兄两人不幸被日本鬼子掳住了。他们把我们二人带到刘家大屋休息，故意给我们吃牛肉罐头，我们拒绝了。饭后，日本宪兵都睡了。师兄和我商量，她先逃，如无动静，我再逃。结果她先走了。我悄悄地出门看情况，恰巧前面来了个日本宪兵，我一急，赶紧蹲下，用手在地上写字，告诉他我是出家人，住在前面真人殿，并把

头上燃的九柱香指给他看，向他合十顶礼，表示求救。我眼见日本宪兵身上挂了一铜牌，是佛像，知道他也信佛。结果他放我走了。可没走多远，前面又来了日本兵，我马上往回走，仍旧要求宪兵送我上山躲避，他照办了。从此以后，那一带的乡下人都说：“到底是出家人，有菩萨保佑，尼姑两次被抓住，没有受侮辱。”其实是因为日本宪兵信佛，我们才侥幸平安。

和天主教徒的矛盾

市内天主教徒宋杰，仗着外国人的势力，带着一大批小学生，对弥陀寺来了次突然袭击。他们占领斋堂作教室，不由分说地把斋堂里的桌椅餐具往外丢，搬进了他们的讲桌和课桌。我们认为斋堂是佛教的集体财产，施主还在，任何人不得侵犯，于是和他们打起来。宋杰跑到县政府告状，说我们打人，县政府听信一面之词，公然派人把监院师、经传师抓走了。

弥陀寺的施主是郭葆生的家属，我们就找郭葆生的儿子郭听聪撑腰。郭听聪是县参议员，有点声望。他听后，立即到县政府质问：“弥陀寺是我家捐献的，不是什么闲公闲产，怎么能让学校霸占？尼姑是念阿弥陀佛的，本来不多事，赶快放她们回去。”县政府自知理屈，当场就放了人。

一九四七年，我任监院师，自身的负担更重了。五十多人每天要吃饭，长沙、衡山、宁乡、益阳等地来寺求参学的，络绎不绝。因为我的人眼熟，他们一来道喜，二来参道。我这个家真不易当。谈宗师兄当知客，于是我们商量，常住的班子齐，做华严法会二十天，半个月念一卷华严经（共八十一本），还要拜忏。我们的经坛布置得庄严肃静，门前扎了松柏牌楼，一时道友、善男信女云集，为弥陀寺增添了光彩。华严法会是不容易举行的，要人多，香花灯果多，会唱赞词打法器的人多，经费多。

解 放 后 的 生 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即农历七月十五，我们正在大佛殿放焰口，解放军来了。他们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与国民党的军队相比，完全是两个样子。解放军住了几天就走了。以后住了南下干部，找我们谈话，并送了许多书给我：《社会发展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这些书我们都看了。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叫我们搞生产，知道我还有点文化，又是寺内的负责人，就叫我带个头搞起来。九月，我就组织众比丘尼织布，但同住的教友表面上同意，实际上不干，反对这一行动，并大造舆论，说我是“解放尼姑”，不坚持信仰，没有道心，一个个溜往乡下了。我一个人无能为力，只好任其散了。我便和师兄谈宗师去衡山石湾祖师殿，从事织布生产。

一九五二年，我从祖师殿回湘潭探亲，许多教友找我，感到没有生活出路，希望我出来重振手工织布业。于是我去市政府、劳动局联系，请求开业，结果批准了，领了营业执照，买了三台织布机，进了棉纱，又开始织布。并要唐运庄去组织全市僧尼，每人入股金三十元，共计五十多人，先在紫云宫开办，后迁海会寺。出家人没有技术，产品质量不好，生产上不去，又无钱进原材料。民政科知道这一情况后便拨款一千元，照顾我们买棉纱，解决了当时的最大困难，才保住厂子。我们经办的织布厂，即今日湘潭市线带厂的前身。

一九五七年，湘潭地委统战部部长杨汉三，拨专款为海会寺修大佛殿，重新挂匾，菩萨重新装金，并被列为湘潭市文物保护单位。我们遵照中央的宗教政策，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党还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一九五八年二月，我去武汉参加了中南六省佛教界社会主义教育座谈会。一九六二年二月，我出席了全国佛教界第三届代表会议。一九六四年，当选为湘潭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又被邀为政协湘潭市委员会委员，并三次参加全省性的宗教界会议。

十年内乱期间，菩萨被毁了，大佛殿被线带厂占用为保管室，我本人被列为专政对象，坐了半年黑屋，十多年抬不起头。一九七七年调整工资时，也不准我升级。厂领导在会上作报告，说我是封资修的头子，还想升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政策才得到落实，没有佛殿，我就在自己的宿舍里辟一间小佛堂，诵经礼佛。

我自愧对于佛教没有贡献，佛学知识也很贫乏，但我却是一个最虔诚的佛教信徒。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不生退悔之心，而是端正态度，接受考验。特别是解放后，政府干部、亲友为我作介绍，劝我还俗结婚，我都婉言谢绝了。这一点，自问无愧此生。

（原载《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

忆父亲白石老人的几件事

· 齐 良 末 *

我的父亲白石老人，生活了近一个世纪，饱经战乱和南北往返的飘流生活，五十多岁以后才在北京定居。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踏破我中华长城，同胞遭受凌辱，就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来到了这个世上。父亲特为我留诗一首，以为后来警戒。诗曰：“锦绷珍重小儿曹，富贵何如隐逸高，养犬勿伤钱树子，年深防倒莫争摇。”父亲老来得子，喜悦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六日寅时，钟表乃三点二十一分也，生一子名良末，字纪牛，号蠹根。字以纪牛者，牛，丑也，记丁丑年怀胎也。号以蠹根者，八十曰蠹，吾年八十尚有此根苗也。”

一九四四年（农历甲申年）一月，我的生母去世了，当时我年仅五岁。从此只有依依父亲膝下，开始了失去母爱的童年生活。

北平沦陷后，生活资料非常紧张。一九四四年六月，北平艺专送来配给门头购煤的通知书，父亲深知这是日伪在收买人心，当即去信拒绝。表现出了他清白的品格和热爱祖国的高尚民族气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父亲非常兴奋，和好友一起饮酒，吟诗，表示庆祝。也就是这一年，父亲带着四子良迟和我及他的学生王雪涛、护士夏文珠

* 齐良末是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会员，齐白石先生之幼子。

乘飞机去南京办画展。虽然他的作品极受欢迎，卖了不少钱，但当时的钞票如同废纸，父亲只好摇头叹息。

解放后，新时代给他的艺术创造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他在九十多岁高龄时创作了著名的《祖国万岁图》。这是一幅彩色万年青的画面，作品上方篆书了“祖国万岁”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正是父亲热爱祖国的心声。

父亲对战争深恶痛绝。他曾叫我养了许多鸽子，我的四哥良迟也给我一对白鸽。父亲认真观察鸽子的各种神态和动作，他亲自数清了鸽子的尾羽是十二根。一九五二年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召开期间，父亲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在丈二匹整宣纸上着意绘制了《百花与和平鸽》的巨幅，赢得了中外和平人士的赞赏。

一九五四年三月，东北博物馆举办了父亲的画展。父亲去信致谢说：“白石老年，身逢盛世，国内外人士对余画之喜爱，应感谢毛主席与共产党对此道之倡导与关怀。”这是父亲发自肺腑之声音，也是活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从各个时期对比中得到的真实感受。这年八月，湖南人民选举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感到无上光荣，经常参与一些活动。他一出门，家中就留下了我孤独一个孩子。每逢这时候，父亲就给我两块钱，叫我买点东西吃。父亲常常抚摸着我说：“可怜哪！没娘的孩子。”

有一次，周总理来看望我父亲，向他说：“一些应酬画，没有条件就不要画了，想画时，作为消遣画画，不要为了生活再去勉强作画，要多注意休息。”不久，周总理通过美协每月补助父亲一些生活费。其实，解放后敬爱的周总理曾多次看望过父亲。在父亲得到国际和平奖金时，周总理亲临表示祝贺。父亲过生日时，周总理也在百忙中亲自赶来和他畅谈，向他祝贺。周总理对我父亲的情意是多么深厚啊！今年是父亲一百

二十周年诞辰，倘使周总理还健在，他一定会出席的。

父亲教育儿女是多式多样的。夏季晚饭后乘凉时，常给我们讲故事。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高兴地蹲在他身旁为他抓痒，哥哥为他打扇，静静听他讲述早年经历的往事。有一次父亲给我们讲了螃蟹的故事：“早年有一个朋友叫仲孚先生，他有了我好多画，还想要，但又不好明讲，就给我送了一篓活螃蟹，还写了条子说：喝酒时吃螃蟹，还不如看我画的螃蟹更能多吃点酒。”停了一下，父亲继续说：“这样我就只好给他画喽。在画上我写了一句话：仲孚先生无余画蟹，画此与之，胜于赠酒一坛。”父亲说：“还有人用活虾来换我画的虾，我画的虾看来吃得了。”父亲还和我们讲了同乡马璧先生向他学画的往事。父亲说：“马璧先生学画肯用苦功，敢下笔，我蛮看重他。”

又一天，父亲在乘凉时给我们讲起了早年蔡锷将军请他去教课的事。他说：“那时教课还得了，一句话讲不好，学生闹起事来，一下把你轰出去。我这样大的年纪，哪肯去担这样的风险，我辞了。可是后来徐悲鸿先生也来请我教课，我当然也不会理。徐先生真是有耐性的人哪，我两次没答应他，第三次他还是客客气气地来请，我平生爱脸面，不好再推辞，只好教教看。那次我也很担心，可是学生蛮听话。讲完课，徐悲鸿先生陪我出来，我边走边感谢他管学生出了力。徐先生连连说，那里，那里，应当是我感谢老先生，是老先生的课讲得好。这以后，徐悲鸿和我很要好，我们的友谊终生不渝。”乘凉中，父亲给我们讲故事，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往事。父亲老年身上爱发痒，总喜欢让人替他挠几下，我当时是小孩子，他中午躺在椅上睡觉，我就在边上蹲着为他抓痒，轻轻挠上几下后，父亲就能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八岁时，父亲就为我留了作画范本并在上面题了字。父

亲还为我书写了“余年还望汝光前”的字幅，勉励我要努力绘画。我十岁时，父亲把着手教我画《钟馗捉鬼图》，并指出钟馗的手臂应如藕之有节，并当即为我画出手臂图样。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慈爱的父亲病逝于北京，我们无限悲痛。当时我已十九岁，正在中学读书。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攻击父亲说：“是谁把齐白石抬得这样高？”其实，矛头是对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后来父亲的家被抄了，父亲购置自住的房子被人占住了，我原住的两间西房也住进了外人。我意识到坟地恐怕也不会安全，便去扫墓。果然父母墓前的石碑全被挖倒了，每块碑上还刷了三个大黑字。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能力的我，只能偷偷地在墓前给父母叩几个头，挥泪而返，我的心头充满了忧愁与悲伤。后来我再次去坟上，一看石碑也不知去向了。我伤心地从墓边捧了一把碎土带回家中，这把土留给了我辛酸的思亲之情与创伤的回忆。

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冰河终于解冻了，“四人帮”倒台了，父亲的名誉恢复了。这不仅是我们子孙的愿望，也是一切热爱艺术、热爱真理的人们的共同愿望。

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父亲生前对满子的偏爱，舐犊深情，使我终生难忘。只是当年幼小无知，不懂得孝顺，现虽祈望承颜侍奉，已再不可能了。寸草春晖，补报无期，这将是我终生无限伤痛的憾事。

（原载《湘潭文史资料》第三辑）

教育家瞿方书生平

瞿国倩*

先父瞿方书，字荪楼，一八八一年农历三月初五生于龙山县里耶镇（祖籍保靖，科举时因以保靖生员应试，故外人均传为保靖籍。实际祖辈在龙山已定居许多代）。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晚年致力于教育事业，成为著名教育家。一九四七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先父病逝于湖南省桃源县河湫，享年六十七岁。

府试名列前茅

祖父瞿元亨，字励吾，清代秀才，有子女七人（五男二女），先父方书排行第三。祖父自有田地，每年可收租谷近一百石，由于人口多，家庭经济不宽裕。但祖父对子女读书颇为重视，家中藏书很多。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字克强）曾撰联赠我祖父，联云：“耕数顷田给衣食，积万卷书授子孙。”先父方书幼年随父攻读经史，后随堂兄瞿方梅（清代举人）习训诂词章。因他天资聪颖，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永顺府试，四次考试均名列前茅。知府连培基惊为奇才，并在府立案，补他为“博学弟子员”。

*瞿国倩系瞿方书之女，现任武汉水电学院副教授。

·从 事 民 主 革 命

一八九九年，瞿方梅在湖南省桃源县漳江书院设馆讲学，先父方书随同就读，与同窗宋教仁（字渔父）、覃振（字理鸣）等结为莫逆之交，常在一起振讨改革之道，桃源知县曾以革除先父功名相威胁。一九〇〇年，先父参加自立会，一九〇四年参加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并积极参与策划长沙起义。先父负责发动湘西会党，与常德总部宋教仁相策应。后因起义计划泄露而失败。一九〇五年，先父东渡日本，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法政。他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国同盟会，与宋教仁同为《民报》撰述。先父常用笔名发表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革命主张，同章太炎先生等一道，与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进行论战。

一九〇七年，宋教仁回国，在东北建立“同盟会满洲支部”，联络东北会党与满洲新兵，准备在北方起义。后因起义计划泄露，宋被迫再次避走日本。当时瞿方梅任吉林提学使，并举办法政学堂。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先父与仇鳌（字亦山）通过瞿方梅的关系到吉林法政学堂任教，为宋教仁回国赴辽作准备。先父又介绍林祖涵（林伯渠）为瞿方梅幕宾，借以加强同盟会满洲支部对东北会党与满洲新兵的联络。

一九一〇年，同盟会总部派先父赴上海，参加《中国公报》与《民立报》编辑工作，鼓吹革命。在此期间，先父经常为报刊撰稿，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先父任法制院委员兼法制局编纂、参事等职，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各部院组织法等工作。同年三月，唐绍仪组阁，宋教仁任农林总长，先父为该部参事，协助宋教仁规划

垦植、渔业、森林等方案，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后因唐绍仪辞职，未能付诸实施。

宋教仁逝世后，先父痛失同志与知音，从而决心离开政界，遍读白云寺佛藏，专门从事佛学及周易的研究，不愿与闻国事。

致 力 于 教 育 事 业

一九一四年，先父方书由天津转至吉林，任教于吉林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一六年后，他曾执教于北京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一九二四年，祖父病逝，先父奔丧回到原籍。在服丧期间，应老友陈渠珍邀请，襄理在湘西推行自治，草拟地方自治条例，并执教于保靖职业学校。一九二六年他转赴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力图分省自治，实行军阀割据。先父积极撰文，在报上公开揭露赵恒惕搞封建割据的阴谋，因而被捕入狱。赵妄图杀害先父以压制舆论，后经于右任和仇鳌营救，获得出狱。一九二八年，先父受聘为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曾两次敦聘先父去武大任教。先父以“我是湖南人，既已在任岂能弃家乡教育于不顾”为由，婉言谢绝。一九三四年，陈渠珍欲在湘西筹建苗族师资学校及凤凰、乾城（今吉首）等中学，邀请先父协助规划。先父为了发展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毅然接受邀请，向湖南大学请事假转至凤凰。后因患病在身，不能返回湖大而辞职，并在家中养病达四年之久。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敌机轰炸长沙，先父在避居南岳期间，与老友陈渠珍、滕敬侯、易雕鳌等组织辅仁学社，后改名为大同学社，谈经论道，窥探佛理，用古代哲理探讨大同政治。这个学社，曾由先父主讲佛学，易雕鳌主讲易经。长沙失守后，先父又迁居桃源县郑家驿、沙坪、河洑一带，先后在信

国、忠器、平阳等中学任教。这时，湖南大学迁至辰溪，又多次邀请先父返回湖南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也相继来函敦聘。先父以“战乱未已，妻儿弱小，碍难远出”而予以谢绝，一心致力于中学教育。

先父教育有方，治学严谨，无论在大学或中学任教期间，均能按照不同对象，进行启发疏导，受业者莫不获益显著。他常对人言：“不怕学生浑沌，只怕先生糊涂。”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耐心教育学生。他虽早年习经史、应府试，但对新文化接受较快，如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就赞成采用和推广白话文，重视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在讲授作文时，他要求学生做到“眼所见，耳所听，心所想，口能说出，笔下达到”。

先父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重视学术研究，善于搜集编撰教材，先后著有《中国文学史》、《易经爻象数理》、《文字疏证》、《列国疆域形势考》各若干卷，对许多疑难问题，均有独到的见解，有些著作已选作大学教材。惜于战争年代，流离转徙，书稿多已失散。所剩少数手稿，解放后亦化为乌有。

一九四六年，先父曾为桃源县纂修县志制定编辑大纲及工作方案，使《桃源县志》草稿，得已顺利完成。

在薛岳、吴奇伟、王东原任湖南省主席期间，先父以同盟会元老身份，先后受聘为第九战区和湖南省政府高级顾问，直到一九四七年逝世为止。

严 于 教 子

先父一贯主张“人要自食其力”，认为享受祖业可耻。他对共产党宣传的“不劳动者不得食”十分拥护，经常以此教育子女努力学业，即使不成大器，也要学一门自力更生的本领，不要当寄生虫，要靠本领挣饭吃。他常对子女说：“我没有财产给你们，也不愿你们靠祖业过日子。”先父原配夫人葛文

园，湖北孝感人，系留日学生，回国后，曾在北京女子师范等学校任教，因婚后多年不育，受到祖父母的歧视。未经先父同意，祖父母为先父作主在家乡另订婚约，强迫先父与葛群贞结婚。抗战前，先父与葛文园互相通信，未曾中断。抗战爆发后，即失去联系。先父常对我和弟弟说：“必须打听她的下落，定要去看望她。要叫她妈妈，因为她并未与我离婚。”遗憾的是长期未能打听到她的消息。先父继配夫人葛群贞，四川酉阳县搭洛寨人，生子女各一。女瞿国倩，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现任武汉水电学院副教授；子瞿国希，毕业于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水工结构专业，现任水电部十二工程局技术处主任工程师。

（原载《龙山文史资料》第一辑）

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传略

周祖谟 余淑宜 *

余嘉锡先生，湖南常德人，生于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正月十三，字季豫，后自号珣庵，又称珣翁。父名嵩庆，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进士，曾为官河南之偃师、商邱。先生生于任所，启蒙受书，嵩庆公口授章句，读完《五经》，接着读《四史》、《楚辞》、《文选》，学作古文，不习时艺。好读书，终日手不释卷，并强于记忆。年少即立志于著述。十四岁作《孔子弟子年表》，十五岁又注《吴越春秋》。年十六，购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获至宝，穷日夜之力，读之不厌。遇有疑惑，就检书考证，将所得一一写在书头，日久所写既多，遂抄录成册。从此用力更勤，学识大进。

先生十八岁，中乡试举人。后入京都，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于读书著述之外，不识家人生产。所有薄田，让与幼弟。自有住屋一所，合族而居，雍雍穆穆，无所争执。科举废除之后，在常德师范学堂任教，但薪俸微薄，不足以自给。夫人陈福彩，为临川陈达煥之女，虽出自名门，而能勤俭持家，亲自种菜养猪，生活清贫，然一切井然有序，并且教养余家弟妹，以至成人，为之婚嫁。使先生得以无杂务之烦扰，专心于学问，由是卓然成为一家之学。

先生受先人之教，禀性正直，廉洁自守，虽外舅兄弟陈

* 周祖谟系余嘉锡女婿、语言学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淑宜系余嘉锡女儿，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灿、陈田、陈馨等三进士同为显贵，而先生鄙视仕宦，无所攀援。平日在乡里独热心于地方义举。常德位于长江中游，地势低洼，夏秋之交，洞庭湖水涨，泛滥成灾，倘护城大堤一决，全城居民即有灭顶之虞。每当汛期，在危急之时，为保全一城人的生命，先生总是挺身而出，协同地方，进行抢险，彻夜坐守于商会，直至险情缓和。排难解纷，功在地方，因之名扬乡里。先生排行第二，人皆尊称为“二先生”。但先生从来不循情面，谋一己私利。余氏子弟或下地种田，或外出从军，皆自寻生理，不能假先生名义以谋求职务。

先生曾在北京赵尔巽家教赵氏子弟读书，同时审阅《清史稿》，因得以清史馆馆长柯劭忞为师。这时有举家北上定居意，夫人已整装待发，忽然以母老难以远离，想待陈太夫人百年之后再作远行计，未料夫人竟于一九二七年秋先太夫人而逝世，卒年三十九岁。时长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女子二人，年尚幼小，儿妇已先夫人而亡。夫人既葬，亲书碑文，立于墓前。墓志称夫人“清闲贞静，出于天性。恕以接人，仁能及物。鞠躬尽瘁，十有九年。存孤继绝，功在宗祀，生叹薄祐，殁有遗恨。”辞甚凄惋。先生环顾左右，睹物伤情，旧居几乎不能一日留，于是与子一同北上到京，居于前门高庙之常德会馆。当时北平为人文荟萃之地，先生以一介儒生，要以文章学术自显于时，自非易事。幸有机缘得见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并为陈校长所推重，以为学识渊博，业有专攻，实不多见，当即被聘为讲师，主讲目录学。同时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目录学课程皆是先生一人兼任之，成为目录学专家。一九三一年被聘任为辅仁大学教授，兼任国文系主任，遂辞去各校兼职。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为日军所占，敌人又覬觎华北。为免受敌人欺凌，先生举家南迁，作永归计。然而回乡以

后，左右无人可与论学，闷坐室中，精神无所慰藉。加以邮寄回乡的书籍、手稿被肖小扣压，并洗劫一空，终日忧国是之日艰，叹壮志之未酬，郁郁不欢。这时辅仁大学因系主任一职无人接替，又接二连三电催先生回校，不久又返回辅仁大学主持系务。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日军占住北平，举国愤慨。辅仁大学因系罗马教廷天主教会创办，有德国神父主持校务，故敢伪有所顾忌，未便接收，所以学校能够依然讲诵不辍，培养了大批人才。先生任系主任，秉公无私，选聘教师，以确有真才实学为准。北平沦陷以后，著名学者不得南下者多，一时名师云集辅仁大学国文系。讲授语言文学的先生有：沈兼士、高步瀛、孙仁和、孙楷第、顾随、刘盼遂、赵万里、郭家声、陆宗达、戴君仁、储皖峰、周祖谟等，他们都学有专长，循循善诱，因是学生中人才辈出。当时正是民族处于存亡之秋，读书人自当以气节相砥砺。先生十口之家，生活虽艰困，依然淡泊自守，不以利污其身。为国家为民族维护正气，教诸生以为人之准则。如开“楚辞”课，意在教育青年，识别香花毒草，以抨击当时之卖国求荣者。开“世说新语研究”课，则对魏晋之尚清谈误国，反复推论。若王衍之沽名钓誉，华歆之伪装清流，无不是论古人而讽喻时事，皆寓意深远。一九四二年又兼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

先生博览群书，精于目录学，自称解学问之事，是从谈张之洞《书目答问》开始。在国文系除讲授目录学之外，相继开设古籍校读法、楚辞、骈文、世说新语研究等课。使学生从多方面明瞭学术的流变，知道如何利用历史资料从事研究。先生性情正直，平时交友也以道德学问为准绳。所与游者有邢端、钟刚中、伦明、邓之诚、傅增湘、于省吾等人。其道德文章最受先生敬佩的是霸县高步瀛先生。高先生字阆仙，学识渊博，于典章掌故，最为娴熟。尤精于《文选》学和六朝唐宋名家的

诗文。事母孝谨，以高龄作斑衣舞，被传为佳话。陈垣先生六十寿辰时，同仁等筹送寿屏，闾仙先生撰文，先生为之作隶书，一时称为双绝，平时与长沙杨树达先生以有同乡之谊，过从较多，又与陈垣先生同住于西城兴化寺街，相距不过百步，所以时相往来，有论学之雅。

先生自谓无用世才，毕生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教学和著述上，教书数十年，从来不喜欢用讲义，即使写了讲义，也不照本宣科。认为学生自己可以去看，无庸教师在课堂上读讲义，习惯如此，也是先生自视甚高的地方，因为他所开的课程都是自己学有所得的专论，已是成竹在胸。因之在教课时，旁征博引，如数家珍。至于楚辞、骈文早是背诵如流，一课时之内，从来杂以与学问无关的闲话，学生有问，必严肃认真地尽心指点。

先生每天起床之后，就手持一册，祁寒盛暑也不废读。家中藏书极富，但只是明清时的刻本，并没有宋元旧槧。由于他是目录学家，所以善于辨别刻本的好坏，选择很精。他是读书而不是藏书，凡是四部有用的书和丛书都尽量购置。题书屋曰“读已见书斋”。每购得一书，即左手持书与书案边沿比齐，一笔一画地在每本书的书根上写上书名和册数。楷法工整，一丝不苟如刻印，年年买书，本本如此。平时书籍用完之后，立即放还书架，书案上除笔砚镇尺之外，从来不堆积成摺的书。

先生读书有所得，就分别用五色毛笔，一笔一画地写在书头或两行之间。一部书写满，则又另换一部。他所撰写的著作，一律都是运用这种方法，然后抄撮成书。因此翻阅先生的遗稿，无不为此种精勤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

先生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无论材料记得多么熟悉，也要检出原书，查对清楚，然后落笔。平素读文，反复诵习，至能背为止。因此所写文章，条达通畅，气脉相连，无一处隔滞。凡

有写作，如前人已有论说，必举其名姓，陈明来历，绝不掠美。平生读书，对于史部子部各书最为熟悉，自谓“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实际上，清人的著述，如专著、文集、以及笔记之类，亦莫不阅读。故既精于目录之学，而又长于史学。不仅是文献目录学家，也是史学家。他曾经说“宋人史学胜清儒”，如不精于史学是不能下这样断语的。

先生所著的书已刊的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

这几部书中，《四库提要辨证》是先生毕生精力所萃。自初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起，即从事钩沉索隐，辨证疑难，后来陆续著作，积稿二十余册，到一九三一年开始铨次先后，已得七百余篇；后又删去重复，别加刊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二年，更肆力以为，先后写定二百六十余篇。最后编著“叙录”，但取成稿四百九十篇汇为一书印行，以为研究古籍的人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于众手，馆臣为时日所迫，往往读未终卷就率尔操觚，有人名之误，有时代之误。有时南辕北辙，与作者之本意不符。或书中原有此篇，而谓缺失；或无此篇，而又妄加评论；凡此不一而足。《提要》既不注版本，又乖著述体例，而所言又时与著录之本不相应。其尤甚者，是删除旧有序目，而所述却是旧序的陈言，别无新意。在考证书籍的真伪上，或以不伪为伪，过于鲁莽。总纂官纪昀又标举汉学，对宋人著述，未能细读，而痛加攻击，不免失于公允。全书缪误实多，如不细心考证，则往往为其说所误。《辨证》一书就原著指陈得失，详征博引，考核翔实，足以振聋启聩。先生以为古书自有其体例，著者自有其意旨，绝不能以后世之见论古人。自称：“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

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

（见“自序”）由此可见其态度之矜慎，用心之专且精。真积力久，发现自多。这确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的一部名著，影响极大。

至于《世说新语笺疏》一书，所重在于推勘事实，补刘孝标所注之不备。博采晋宋以下史传杂著和近代的笔记论著，从多方面考核人物的事迹，探寻史实的原委，以订正《世说》原书和刘孝标注的讹误和阙略。体例有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而对魏晋时代的风习和人物的优劣以及事情的曲直，特别注意，评论颇多。不仅考证史实，而且兼有正士风，励志节的用意，立义可谓深厚。

先生的《论学杂著》一书，包括有论文、书籍的序跋和杂考三类。陈垣先生为之序。论文一类中如《太史公书亡篇考》、《寒食散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考信录》、《疑年录稽疑》等篇，考证精详，同为学者所称道。尤其是以史学家的学识眼光来研究小说，更是独树一帜。至于书籍的序跋，则重于考证学术源流，指陈得失，所以篇篇都有新意，与一般泛泛应酬之作不同。杂考一类即《读已见书斋随笔》，共收三十条，都是考证文学与史传的札记，与赵翼的《陔余丛考》类似。

由于先生既是文献目录学家，又是史学家，所以最精于考证。论人，论事，论书，皆探究实情，绝不乱下雌黄。前人著述，评论人物，往往抑扬其词，不加细考，未足为据。

先生平生狷洁自好，不事营求，而以学术自励。对事一秉大公，不存偏见，是非曲直都自有权衡，从来不屈附他人。与朋友相交，重然诺，无诳言，不面折他人之短。关于人之立身处世，所著书中一再提出要重视节操，虽属小节，也不当忽

略。他说：“凡人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虽有文章传世，犹不足以自赎。”

先生自从夫人逝世，情怀眷恋，誓不再娶。鳏居凡三十年，教养子女，以至成人。授课之余，则以买书、读书、著作为乐事。解放前，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这时先生以年近古稀，但依然想尽其心力从事教育工作，可是不意为谗言所毁，不得伸其志。退居于家，心情抑郁，于是奋力撰述《四库提要辨证》，夙兴夜寐，不顾辛劳。所书工笔小楷，有如雕刻。一九五二年秋撰就《元和姓纂提要辨证》稿，忽跌伤右股，转成瘫痪，且脑力日衰，作书手颤，从此也就不再能提笔著述了。美志不遂，仰屋兴叹，其苦不堪言。不幸于一九五五年旧历甲午除夕逝世。终年七十二岁。子一人名逊，字让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事父孝谨，一九五三年患脑溢血，卧病，一九七二年逝世。女子二人，长女淑宜，适周祖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女淑班，适陈绍杰，柳州铁路局工程师。

先生的品德为士林所称道。文章著述自成一家言。在史学和考据学方面都有新的成就，善读其书的人，当能有所取裁。然晚景孤寂，奋力著述而伤其身，怀瑾握瑜而亡，深可叹惋。卒后，即葬于北京阜城门外西黄村之福田公墓。经过十年动乱，碑石已毁，其墓之所在地也就不可辨认了。

（原载《常德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回忆马宗霍先生

马·积·高*

马宗霍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本家。衡阳姓马的旧时分为城、乡两房，他是属于城里那一房的。不过他的家原在北乡的集兵滩，到了他当了教授，才在衡阳市洪家塘买了一所小房子，他留衡的家属及至解放前一直住在那里。我则属于乡里的一房，因此，从宗族关系说，我们算隔得远的了。在衡阳，姓马的人很少，故城、乡两房的人往来仍较密。大概是一九三五年，先生从南京回衡，为祖母祝百岁大寿，我的父亲曾带我前往洪家塘祝寿。按本家的辈分，我们都是属于所谓“承”字辈的，故父亲叫我称先生为“满哥”。尽管那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初小学生，而先生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和教授了。正是因为知识和年龄上都那样的悬殊，这次会见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象，知道本家中有这么一位有学问的人，实际上却未感到他同其他知识分子有什么区别。后来父亲多次提及他，我才知道：他原来也出身贫寒，又在年少时失去了父亲，只因童年时就显露出才华，并刻苦学习，得到著名书法家曾熙的赏识（曾还把妹妹许配给了他），才得在南京师范学堂毕业；后来又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奖掖，成为章氏晚年的著名弟子，在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教授。这才使我对他产生了特别的敬意。

但我对先生真正有所认识还是在一九四四年秋，我考入前

*马积高现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肄业以后。他当时是该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我们的许多课都是他教的。先生又很讲究古礼，对我这个同宗的少年特别关切。除平时常询问我的学业情况外，每遇节日或家里有什么喜庆，都要亲自写个短简，叫他的女儿志琳或志珍送来，招我到他家吃饭。因而我接受他的教诲要比别的同学更多。现在虽然隔了三、四十年，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里我只讲感受特别深的几件事。

“读书略识字”

先生教我的第一个课程是《文字学》，他讲的第一课是“读书略识字”。

“韩文公说：读书略识字。你们读了一些书，识不识字呢？我看一字不识。”这是他的开场白。接着就说开来了：原来初民是没有文字的，“结绳纪事”，后来才创造了简单的象形字和指事字，“一”字就是最初创造的文字之一。《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曰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故分别言之，“一”应该说是“文”，而不能叫“字”。“一”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说文解字》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才物”，其说本于《老子》《周易》，故不遵《老》《易》则不知“一”。他说：“你们知道吗？我看不知，所以你们是‘一’字不识。”接着，他还讲了一些常用字，有些是我们不知其本义的，有些是我们不知其形体构造而容易写错笔画的。通过这些例子，他启发我们一定要学好文字学，懂得文字的构造和本义。

先生讲的这一课，连同他讲的全部《文字学》课，大抵一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宗，虽间采后人之说，但形体一以许书为准。这是先生从章太炎先生那里承继下来的治学的家法，为现代一些治甲骨文的学者所不满。这一点，那时我们这些好

“趋新”的年轻人也有所闻，因而也有去看甲骨文的。但《说文》终究是基础，离开《说文》而谈甲骨，往往不是近于盲，就是邻于妄。因此，那时我们的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不遵循先生的教导去读《说文解字》的，有些还读过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古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兴趣（后两者在以后都由骆绍宾先生开了专课），这可以说是那时国师国文系在学风上的一个特点。对于这种学风的得失，我不拟妄加评论。从个人的经历来看，我深感受益不浅。

戒“陋”

先生虽然强调要“识字”，但决不象某些小学家那样，以“识字”为依归。相反，他累次对我说：研究小学只是研治经、子、史和文学的始阶，而且不博览经、子、史和重要的集部也不能精研小学。因此，他常说那些只读八家、桐城文或只搞小学的人是“陋”，经常教育我们不要“陋”。我觉得，这正是先生治学的一个特点。

一些不甚了解先生的人往往说先生只是以小学名家。这并非无据之谈，他的著作如《文字学发凡》《音韵学概论》《说文引经考》《说文引群众考》都是属于小学方面的。但他也写了关于经学的《中国经学史》，属于文学的《文学概论》《读全唐文札记》，还有《淮南子校注》《读南北史札记》以及关于书法艺术的《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等。关于《淮南子》的一种，新近才出版，我没有读，关于《南北史》的一种尚未刊，我仅知其书。就我所读过的而言，《中国经学史》一种，其价值似尚在小学诸书之上。因为象这样的书，倘非博通经史、弥纶群言是不能作的。

强调读和写的基本功

先生提倡博览，提倡读书要观其会通，但反对漫无目的的泛览，且非常强调要训练读和写的基本功。

旧时研究国学的学者大都视熟读《四书》《五经》为家常便饭，先生也这样要求我们，所以那时这些书都开了专课。另外，他还要求我们要读《四史》和《老》《庄》《荀》《韩》等重要史书，《史》《汉》《庄》《荀》也开了专课。我们班开的《周易》《史记》《庄子》都是先生教的。先生治经，强调要读注疏，还要求看没有断句的本子，自己亲自圈点。他常说：读书最忌粗心浮气，借口不求甚解，对一知半解或根本不懂的东西轻易放过。古人读书“得间”（意即善于发现问题，求得解决），都从认真、仔细得来。自己点书，就是培养认真读书的习惯的最好方法。

我曾问先生：陶渊明讲“不求甚解”，我认为不是指读书不认真，而是反对当时玄学家对玄理的剖析力求刻深，对前人书中讲的有关治国、持身的大义反而忽视，这个理解是否对？先生欣然赞许，认为：“颇得渊明的微意”。在先生以及骆绍宾先生等的启示下，我们系当时有不少同学都动手点书。我自己原计划把《五经》《尔雅》的注疏和其他各经及《四史》的白文与注全部点一遍，但那时我很穷，连一册《十三经注疏》和《四史》也买不起，到读三年级才弄到一点钱，买了一部《注疏》，只点完三部经书的《注疏》就毕业了。以后忙于工作，再也没有机会来做这件事。但读书要认真的精神，我却是至今不敢忘的。

对写作的基本功，先生尤为重视。故当时国师国文系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要作文，三年级还要练习写诗词。先生对我们的写作要求是很严的。一个字的点画之误，也要严加指

摘。他常对我说：文字是要给人看的，一字不慎，就要“谬种流传”，决不可马虎。他还说：太炎先生是国学大师，写张便条，也不草率，写过之后，要反复审查，尚有不妥，即改正重抄。我没有见过先生自己写文章，但曾见过他批书，就是先打草稿再写上去的。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我至今没有学到，但每当正式作文时，还是常常记起先生的教导，注意对文字加以检点。

严 中 有 宽

凡是受过先生教的都感到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有的人甚至不敢亲近。我也同样感到他的严，所以回答他的问题总不敢随便。其实先生对学生和后进要求虽严，心地却是宽厚的。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

一九四六年秋，国师从溆浦搬到南岳。在中学时曾教过我的国文、历史的颜敏生先生和他的一个儿子（是我的同学）当时都在南岳五四中学工作。他们得知我的家境很困难，连最基本的书籍和粗布衣服都买不起，就大力推荐我到该校去教历史课。这件事，志琳和志珍（当时她们都在国师附中教书）是知道的，她们都为我高兴。估计先生一定会反对，所以她们又都替我“保密”，一些知道此事的同学也不约而同地替我“保密”。但是，到了学期中间，这件事还是被先生知道了。原来五四中学有位教国文的邝老先生同先生颇熟，有一天他去看先生，闲谈之间谈及，他学校请了一位兼课的年轻教师，姓马，也是衡阳人，问先生是否认识？先生一听，当然知道就是我。当下含糊作答，心里可不大高兴。于是当天就把志琳、志珍叫回来，首先责怪她们为何知情不报，然后就把我数落了一番。大意是说不走正路，不安心刻苦读书，还只开始进三年级，就忙于到外面赚钱。先生平日对子女颇严，志琳她们虽已是中学教师

了，对父亲一向是奉命惟谨的。但她们知道我的处境确很困难，而先生却不尽知，故婉转的将我的情况作了说明。据说，当时先生默然了，但颜色仍很严厉。她们都替我捏了一把汗，第二天赶忙把情况告诉我，叮嘱我小心。我当时想，这回大概要狠狠地挨一次训了。然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未见先生写便条来叫我；上课时见了我，也如往日一般。我才慢慢地放下心来，知道先生已经原谅我了。现在想来，我过后是应当向先生作个检讨，但那时年轻，负气，不肯认错，故始终未尝一言。不过，先生通过志琳她们转达给我的训戒，我是时刻不忘的。尽管在学术事业上我未能达到先生及其他关心、爱护我的师长所期望的成就，但是，四十年来，我从未放弃本职的工作和对学问的追求而去赚取额外的收入，那怕是在生活极拮据的时候。这一点，也许是能告慰子先生的吧？

先生是一九七六年春天逝世的。先一年曾从北京回湖南，虽已年近八旬，身体还好。我去看他，他很兴奋。但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我们师生的处境都不佳，除了问候生活情况外，只能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学问之事，未敢提及，故别离时彼此都不觉黯然神伤。现在，那时的一切都已过去，可惜先生已不及见了。

原载《衡阳文史资料》第五辑

我所知道的美籍华人姜逸樵博士

袁 政 德 *

原籍邵阳东乡（现为邵东县）的美籍华人姜逸樵博士，是当代享有盛誉的学者、发明家、著作家。他的旨在促进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普遍福利的巨著《天下一家》出版后，备受推崇。他是怎样成为一个突出人物的？有人说他的事业成就是基于他的天赋聪慧。但我以为是基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顽强毅力和坚苦卓绝的创造精神。我与他小学同学，我们老家相距只有十里。由于我们过去频繁接触，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对他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取得了联系。随着书信往来，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

家 世

姜逸樵博士原名姜明道，一九一一年生。他的祖先是明朝万历年间自江西泰和迁来湖南邵阳留田定居的。留田大约是在邵东水井头小桥白花园一带。他家历代大都靠耕种度日。他的祖父读了几年书，后在家教蒙馆，束脩微薄，不足以养活妻儿子女。他的父亲童年就自谋生活，在附近煤矿里混日子。年纪稍大，便在窑里做工。有一次，他父亲从煤洞口跌下去，几乎粉身碎骨。父亲的不幸遭遇，是他小时候最感难过的事。他

* 袁政德系起义人员，现年七十八岁，是姜逸樵的好友，现在仍有联系。

的父亲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受人尊重。以后经营小煤窑，全家勤劳节俭，才砌了新房子，置了少量田产。逸樵兄弟三人，他最小，他有四个姐妹，都随母亲辛勤劳动。他的两个哥哥，都只念了两年蒙馆，只逸樵进学校读书。他父亲去世后，逸樵分得家产，远不足以支持他升学，入初中只读了一年多便辍学了。

留 美 之 前

大约是五十四年以前，我与几个相好的同学分别考入高中，而此时连初中都没有念足一年半的姜逸樵却出人意外地考入了湖南大学本科。当时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和钦佩。原来逸樵因生活困难，不能继续升学，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理想，完全依靠自学，修完了全部中学课程。他是经好友段奎、严怪愚的帮助，借着罗乾坤的文凭考入湖大的。那是一九三一年的事，湖大已取消了预科制度，罗是一农毕业的，不打算升学，没有领文凭便回老家武冈去了，怪愚代罗领了文凭，交段奎换上逸樵的相片在湖大报了名，然后通知他赶到长沙应考，居然考上了。便以罗乾坤的名字到湖大注册。同学也只知道他是罗乾坤。直到毕业时，才依照更名冠姓条例将罗姓改为姜姓，但不能同时更名，所以他又叫姜乾坤。逸樵读大学的大部分开支，依靠父亲经营小煤窑的收入和亲友的资助。去长沙有时缺乏旅费，还得到过族上贵公会的资助。

逸樵考入湖大后，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但他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诗词及小说写得颇有特色。严怪愚对逸樵写的小说推崇备至。但逸樵不愿在报刊上发表。有次怪愚把他的一篇小说在报章上发表，还加上按语，说是趁着逸樵过河去了，偷着把它送到报社的。

逸樵对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抗战胜利后为其

同学袁筹写了一篇典雅的传记。袁筹是毕生从事机务工作的工程师，一九四五年在贵州汽车修理厂厂长任上，因公赴渝病逝途中。逸樵素重友谊，为之立传。立意措词有独到之处。同乡故旧争相传诵。这篇有价值的传记我珍藏了多年，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去，令人惋惜。

逸樵在旧中国曾一度进入政坛。说来却也有趣。事在一九三八年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车伊始，即决心大刀阔斧整饬吏治，开办一所行政干部学校，培训优秀知识分子，以更新县及县以下人事。逸樵本无意仕途，鉴于当时日军猖狂进犯，我中华神圣领土受到凌夷，出于一片爱国热情，欲为抗战有所贡献，乃报考县长班。当时有人认为逸樵此举系非份之求，而榜发之日，竟名列前茅，群僚惊服。经短期学习后，他被派往泸溪任县长，不久又调溆浦任县长。在县长任上，他动员抗日，禁烟清匪，安定后方，抚恤流亡，有许多德政，两县父老至今犹津津乐道。在旧社会，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不依靠寅缘，竟能当上地方的“父母官”，没有出类拔萃的学识与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姜逸樵被人视为传奇式人物。

逸樵上任以后，我已远离湖南到贵州去了。关于他的治县政绩，直到湖南解放后，我才略知一些。一九五〇年我在省交通厅干训班学习，有次我去看望抗战初期在沅陵、洪江专署任过行政专员的戴岳先生，谈话中我问到逸樵做县长的事情，戴岳说“姜逸樵年轻有为，无官僚习气，能与老百姓同艰苦”。

小 复 印 机

珍珠港事件后，逸樵即离开县政工作，到重庆乡村建设学院执教。抗战胜利后，他于一九四六年申请自费留学美国。但因当时法币价值一落千丈，不易买到美金外汇，逸樵到一九四九年初成行。到香港后，他无法凑足美国当时所规定的二千四

百元保证金。要不是晏阳初先生为他做书面保证，他是不可能获得美国领事馆的入境签证的。逸樵先后在美国尼布拉斯加大学获得文科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又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图书管理学硕士学位。他在美国这两所大学读了七年书，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餐馆、医院做工谋生。七年以后虽取得了学位，生活状况也有了改善，但这不是他的目的。以后他走别径，搞发明，经过五年时间，花费巨大心血，发明了精巧灵便的小复印机，先后得到美国政府的三个发明专利执照，于是他自己设厂制造。他的发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过四年的惨淡经营和反复试验，因为墨汁总是不够理想，几乎一蹶不振。后来由于他夫人杨宏农博士的协助，才试验出了一种使用墨膏的新方法。以后对印墨腊纸又经过多次改善，才大功告成。这种复印机受到联合国有关方面的重视。有八十多个国家买去应用。

天 下 一 家

逸樵博士发明复印机走上坦途后，生活自然得到很大改善。但他认为从事任何职业，谋生不是目的，生活的目的是事业。他的事业就是研究、撰写《天下一家》一书。一九七五年，他摆脱了复印机经营业务，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上，终于在去年完成了这部著作。他寄给我的《天下一家》图照，说明这部著作包括七十二个表格，六幅插图，三十八万多字。

一九八五年，逸樵给我的来信说：“去年将研究所得（指《天下一家》），刊行问世，已得多方共鸣，此后推动实行，有待继续奋斗，惟有鞠躬尽瘁，以期不负初衷。”

心 系 祖 国

逸樵博士离开祖国三十六年了。他远适异域，心系祖国，

曾写了一首《秋感》：“秋声又听入窗纱，身世苍茫感岁华。已觉半生成幻梦，犹怀孤愤寄天涯。故园讯断归无计，异国情深客有家。几度凭栏劳怅望，满城红叶夕阳斜。”

这是逸樵一九五二年冬在林肯之家写的，那时中美关系隔绝，故有故园讯断之语。一九七二年他所写的《小复印机》一文中说：“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大城市，我们（指他们夫妇）大都去过，我们出生中国，中国许多大城市却没有去过，不免引以为憾。”我期望逸樵早日归来，共与游览祖国各大名城，以偿夙愿。

（原载《邵阳市文史资料》第五辑）

回忆画家张一尊

吴佩君*

张一尊先生于一九〇二年正月初七，出生在乾城县（今吉首市）司马溪平里河村。他的父亲张巨谋一生务农，为人慈厚，很受人尊重；母亲姓姚，是乾州镇上（原乾城县治所）人，生育子女四人，一尊排行第三，学名张跃完。平里河村座落在群山叠翠之中，聚居的全是土家族。村寨有条小河，赤脚可涉水而过，踏着河里的石墩过河，更别有风趣。这里虽然僻静，却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引人入胜。

童年爱马

一尊先生六岁就喜欢画画。他经常在河滩上用柴棍子画牛画鸡，画得最多的是马。这是因为村子的尽头有座碾坊，常常是匹白马拉着碾米，他很喜欢这匹马，碾子一停，就吵着守碾坊的伯伯抱他摸摸马的脑壳，还争着牵马到河边饮水。就这样同马结成了朋友。他七岁入塾读书，一背着老师，就在手上画马，画马脑壳，常常弄得满手是墨，被老师打手心。同学见他喜欢画马，就叫他“马客”。

读完两年私塾后，到县立模范小学读书。县立小学离家有四、五十里地，他寄居乾州小溪桥头的外祖母家里，门前是条

* 吴佩君系张一尊的夫人。

古道，经常有运货的马帮路过。他每当听到马蹄声，就悄悄出门看马。一次，他随着马帮走了十多里路，还是赶马的劝他回家的。进屋已是掌灯时分，挨了外祖母一顿批评之后，又默记着马的姿态，画起马来。此外，他少年牧牛喜欢伏在牛背上，观察牛的动作画牛。见到雄鸡撕打，鲤鱼跳跃，也要观摩写生。

中 学 时 代

一九一八年，一尊考入辰郡联立中学。这是当时湘西唯一的中等学校。美术老师是王晴川先生，他以工笔山水见长，一尊画山水入门，全靠这位老师。但一尊作画喜欢大写。在青年学生时代，就爱画湘西家乡的丛山峻岭、峥嵘怪石和那险滩峭壁、飞泻的瀑布。寓意着湘西各族人民豪爽的性格。那时，一尊家境贫寒，王晴川先生给他提供了赵子昂，钱南园的画集，以及《芥子园画谱》等。课余和假日，他总是在绘画中度过的。一九二二年中学毕业，他想投考美专，因经济困难，未能如愿。

离 乡 谋 生

一尊中学毕业便回到所里家中，帮着父母磨豆腐。那时，官府差役任意欺压百姓。一次差役不顾主家风习，头戴白帕进了家门，一尊冷落怠慢了这个差役，相互发生口角，打起架来。差役仗势要把一尊抓进镇公所。里邻阻拦不住，一尊只得只身逃走，外出谋生。不久，辗转到了长沙，住在湘西会馆。这里，住了不少家乡人，但省城里人烟浩瀚，白手谋生很难。有的同乡开导他，不妨画几幅画卖卖，可能挣得几个钱。于是他买些宣纸，画些马、牛、山水和花卉，通过同乡找买主，果然销路不错。这是一尊先生生平卖画之始。

几个月后，找了个收印花税的差事。薪水除伙食外余下几块银元都尽量寄给父母，表示自己谋到了生路，给父母一点安

慰。公余之时，一尊专心习字作画，在一年多收印花税的工作中，他的书画也不断道劲起来。

军 旅 生 涯

一九二三年，国内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到处掠夺，国人呼号抵御外侮乃当务之急。一尊受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决心投笔从戎。这年十月，他考入武卫军学兵营。一九二六年，参加了北伐战争。经历九载军旅生涯后，一九三四年，第四路军改组，他被列为上校附员，离职当了三年专业画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南京首次举行个人画展。长沙师古斋、文英阁纸庄，曾为他销售作品。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为了保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一尊应召奔赴上海抗日前线。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任七十七师野战补充团团长，先后驻防铜鼓、松滋、宜都等前沿阵地。驻防松滋时，与敌人隔江对峙，驻地有个小学校，他和两个司书常常去教学生唱抗日歌曲，给学生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很受师生和群众的欢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被调赴成都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一九四二年一月结业后，以患心脏病为由，辞却七十三军参谋长职务，定住沅陵，卖画养家。

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曾在广西桂林艺术馆举办“张一尊国画展览”。展出作品有《万里奔马图》长卷等三百余幅，受到艺术界、教育界人士的好评。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经同学吴继人先生（湖南省参事）推荐，他出任中央抚恤委员会少将视察。这是个不上班的闲差，他借此机会曾去重庆举办画展。一九四六年六月，辞去视察职务，并被批准退役。同年九月十六日，上海《大公报》上登了作家李健吾以“湖南张一尊先生”为题的文章，文章说：“太虚樵者张一尊先生以画家的身份和世人见面了，实在是个天大

的喜讯，他改行有道理，我为他道贺。一位少将的军官，没有意思再在军队里混了……这不是傻瓜，是有真知灼见”。《武汉日报》也发表了以《人以画马识将军》等文章。介绍张一尊的艺术成就。

苦 练 成 材

一尊没有进过美术专门学校，没拜过名匠大师，又不是什么“天才”，然而他却蜚声画坛，被誉为现代画马的“四杰”之一。他的功夫完全是刻苦磨炼出来的。

三十年代，他同画家刘寄踪、何董、周磊树、萧丙逢等组织过“潇湘书画社”，结识许多诤友，他们对一尊的教益不少。如“平江不肖生”向凯然，“南社”的田星六、田个石等，常常对一尊的创作提些改进意见，一尊总是虚心听取，苦学苦练，以至废寝忘食。一尊的画名叫“也军”，周彰五先生（衡阳人）提出此名不雅。不久，同凯然等一起合计，改为“一尊”。他的画名用过“太虚洞樵”、“太虚樵者”（家乡有个太虚洞）、“一心居士”（寓意断绝仕途）。他的画室称“一心草堂”，又称“错落厂”（寓意过去的坎坷，后来终于落实在专业上）。一九三一年，潇湘书画社成员的作品，举行首次展览时，一尊的马就被赞为“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在山水画方面，他先以清代王时敏、朱耷、石涛等为宗，后又追宗宋元名家。用墨浑润，奇肆中而具淡雅，自成一家。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上海《大公报》登载文学家熊佛西的文章说：“张一尊先生的画，是纯粹的中国画，运笔用墨都到了臻善的地步，非下过数十年功夫的人，决难至此。……在近百年来的画史中，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欣 逢 盛 世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沅陵解放。不久，中共湘西区党委统战部部长顾凌申、湘西行署文教处处长朱林森以及沅陵第一中学校长府廷镇同志等到我们家里看望一尊。党政领导同志亲切地对一尊说：“你是著名画家，新中国需要人才，你更有前途。”随后，他接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同志的聘书，被聘请担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调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受到党和人民的器重。

一九五三年，中央统战部送一尊去内蒙古草原体验生活。到达内蒙古后，他受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同志的热情款待。并由内蒙古自治区美协主席官布同志亲自陪同赴草原牧场观马。在体验生活中，他画了许多草稿。归来后，他常常谈到内蒙古那一望无际的草原，和那万千骏马奔驰的景观，总是流露出留连忘返的深情。这年冬天，组织上委托一尊组织美协。不久，成立了湖南美术工作者协会，一尊当选为主席。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湖南召开第三届文代会，他分别当选为省文联委员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同时，他是湖南美术界最早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一九五四年后，他当选为湖南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一九六一年，出席了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记者向他索词。他填的《踏莎行》说：

“客里重阳，秋容带笑，流溪河畔疑春到。花开万紫与千红，温泉彻夜天知晓。半月留连，感恩应召，谈心论道抒怀抱。百家文采汇天南，争夸形势如今好。”

一尊先生热爱社会主义，尽情地反映新时代的新面貌。他不顾酷暑与严冬，常常深入到湘西土乡苗寨、江华林海、洞庭渔乡、韶山灌区、南岳胜地及省内其他各地写生，描绘祖国的

锦绣河山。一九五三年，他的作品“关山驮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美展。一九五六年，他画的“冒雨抢耕”，参加了全国第二次美展（这幅画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还有他的大幅横披“长沙塔”、“青浪滩天险”等国画，均为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一尊的创作都是实地写生。他的“草原游牧图”、“万马奔腾”、“百骏图”以及反映湘西风光的“吕洞山云海”、“大龙洞瀑布”、“二月筒车响峒河”等作品，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一九六三年六月，省文联特地为他举办了个人书画展览。

“一切要听党安排”

一尊正在竭尽全力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的美术事业奋斗的时候，遇到了“文革”这场动乱。他被挂上了“黑画家”的牌子，整天无休止地被迫写“交代”材料，两个女儿被下放农村，我也进了“五七”干校，家也被抄了。一尊却坚信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是正确的，他深信乌云总有一天被驱散。因此，一有闲空，依然勾小稿子，连香烟盒子也不放弃。

一九七二年五月，经医院诊断，他患了不治之症，但他很乐观，很有毅力，明知生命不长了，并不背包袱。一面积极治疗，一面整理画稿。我见此情景，常常忧伤落泪。他却风趣地说：“别急，我会向阎王爷说，‘还欠了你一百幅梅花，求你等我还清了画债再来’，阎王爷准会答应的！”说得我俩又笑了。

他常说：“我虽然在旧社会就有画名，但我真正的艺术生命和成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的。”他在临终前，对我和女儿说：“一切要听党安排”。这时，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小女儿在农村插队，大女儿做临时工。我们理解他的遗

愿，叫我们听党的话，党会有安排的。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我们一家生活得很幸福。足见他对党是坚信无疑的。

（张二牧 杨伯熙整理）

（原载《湘西文史资料》第四辑）

忆张平子先生二三事

田 翠 竹 *

张平子先生，不仅是我们湘潭的知名人士，而且是湖南全省新闻界、教育界的一位代表人物。

张平子先生是湖南《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也在长沙市各个中学任过教，很有名望。他博学多才，为人正直、潇洒，不拘小节。因为他在兄弟班子中排列第四，所以大家尊称他“平四爹”。“平四爹”好穿长衫，足蹬布鞋，言谈举止，颇饶风趣，老少都愿意和他接近，他也不摆什么文人名士的架子。

我和平子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七年初。那时，他是湖南《大公报》的主笔，我是《衡报》的编辑。记得我在报上发表过一篇论诗的文章，其观点与他不同，他火了。有一天晚上他来到《衡报》社，找我论理。平子先生说：“你这个年轻小伙子怎么带我不过，公然写文章说我的坏话。”我说：“我是谈自己对诗作的看法，决不是冒犯前辈。”他仍不服气，大声说：“我要和你打一场笔墨官司！”我笑了，轻佻地说：“打笔墨官司，未尝不可。只是我打输了，一个无名小卒，无所谓，你打输了，却有点不合算。平四爹，你说对不对？”他平静了一会，便扬长而去。

*田翠竹在三、四十年代与张平子先生共过事，现任省政协委员、省参事室参事。

一九四五年春节后，我又在晓岚港湘潭中学见到了平子先生。他名义上是学校主事，实际上代行校长职权。我是那里的国文教师。那时，他教高二班，我教高一班，我间常听他的课，以便增长自己的知识。平四爹一上讲台，手中无课本，信口讲去，精深渊博。嘴上含一支香烟，神态潇洒。学生很调皮，有的提问：“张校长，您不许学生抽烟，为什么自己又抽，而且在教室里抽呢？”他哈哈大笑：“何键、薛岳都不敢禁止我抽烟，你们敢禁止吗？”说完，口中吐出的烟圈，一个个往上浮动。学生又被逗笑了。

平子先生博学，人所公认。他对学生说：“你们不必买什么《辞源》，我就是‘活辞源’，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学生知道他对自然科学缺乏研究，于是从《辞源》中找出有关数、理、化的条目去问他，他说：“这个我没学过，只限于文史哲方面的问题。”学生们便一笑而去。

平子先生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有时他在课堂里叫学生出题目，他做诗词。学生每出一题，他在黑板上顷刻写就，而且写得非常超脱，这样常常使学生们叹服不已！

平子先生告诉过我，他年轻时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即受到体育老师黄兴的熏陶，加入过“哥老会”。黄兴领导革命，引起清王朝的注意。一天夜晚，长沙全城戒严，城门紧闭，黄兴出走，学生护送，用轿子抬着老师，假装重病人出城求医，机智勇敢地过了关。平子先生就是护送黄兴的一员。

一九四四年六月，湘潭沦陷，农村里到处是国民党三五成群、打家劫舍的游击队，也到处有帮会的大爷“开山堂”、收门徒，一时称兄道弟、作揖打拱的“好汉”遍于乡井。老百姓既怕被日军捕杀，又怕游击队骚扰，大家剃光头，穿破衣，不大出门。唯独平子先生不然。冬天，他身披狐皮长袍，头戴灰呢礼帽，手扶竹杖，在田野间，了无顾忌，独来独往。我问他：

“四爹，你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胆大？”他哈哈大笑说：“我怕什么，碰上了日本鬼子，我告诉他们老子是日本通。碰上游击队，老子用竹篙乱打。碰上圈子会的喽啰，老子是他们的祖宗——哥老会的头头，他们一听，吓得吐舌头，就夹着尾巴跑了。”这番话并不是吹牛皮，不少人在出门后被歹徒刚衣，平子先生却一根毫毛也不曾被别人动过。

但平子先生也碰过游击队的钉子。一九四四年冬，游击大队长陈少怀盘踞花石一带，声势颇大。一次，他抓到一个地主，诬为汉奸，要立即执行枪决。实际上是他想捞一笔钱，只要暗地里送上两三千块光洋，汉奸又可以变为良民。这地主探知陈少怀是张平子的学生，于是用轿子把平子先生接到花石，向陈少怀求情保释。那知陈少怀此时心中只有光洋，没有老师，几番说项，遭到拒绝。平子先生正处进退两难之际，突然蓝田七十三军军部来了一个参谋，手持军令，面交陈少怀。还有军长彭位仁一封私信，探询他的老师张平子先生近况好不好。这参谋经陈少怀介绍，认识了张平子。平子先生拿了彭位仁的信一看，顿时火冒三丈，手指着陈少怀骂道：“陈少怀，你目无师长，岂有此理！彭位仁认得我是老师，你就不认得了吗？”他气冲冲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陈少怀吓得缩在屋角落里。“我要保一个朋友，你理也不理，好大的官架子！”平子先生的嗓门愈开愈大：“什么是汉奸，无非是光洋！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你只抓老百姓，为什么不抓日本鬼子！”陈少怀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平子先生趁势把衣袖往上一挽，直逼陈少怀，大声说：“陈少怀，你准保、不准保？！”“准保，准保！马上放人！”陈少怀一鞠躬，再鞠躬，“马上放人！”至此，平子先生手杖敲地叮叮响，扬着礼帽走向操坪喊：“升轿！”

当他向我叙述这一过程时，我笑着说：“四爹，要不是彭位仁的信来得及时，陈少怀会那么听话吗？”他说到：“彭位

仁也好，陈少怀也好，只要是学生，都要听老师的话。”

一九四五年夏，一支溃败的日军约万余人，自广西窜到湖南，先头部队到了衡山白果，离我们湘潭中学仅五华里，情况十分危急。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策。我极力主张师生立即撤走，免遭祸害，特别是男女学生，晚餐后行动，什么行李也不带，愈快愈好。平子先生反对我的意见，他批评我是书生，胆小如鼠。结果，大家同意我的提议，师生全部撤离。

第二天拂晓，日军占据了学校，我们逃到小河的北面，仓皇中遇到平子先生，我说：“四爹，我这个书生胆小如鼠，可走在您这个老书生的后面。”他抽完一支香烟，轻松地说：“日本鬼子哪个不怕，蒋介石还跑，我怎么不跑呢？”他就是这么爽直、诙谐。

平子先生非常爱才，我的老同学鲁实先，二十来岁，精研《史记》著书立说，驳倒日本汉学家龙川龟太郎，杨遇夫先生对他奖掖备至。一次，鲁实先会见了平子先生，两人谈得投机，几天几夜不休息。平子先生的夫人实在受不了，板起面孔下逐客令。他们离开客厅，跑到报纸仓库里又谈起来。半夜，张夫人把老伴叫走，鲁实先恬然自得，睡在报纸上，一直到日上三竿，才不辞而别。这也算一则儒林佳话吧。

平子先生也很自矜，他说：“符定一编《连绵词典》数百万字，也不过是东涂西抹，这算什么！我从事著作，下笔千言，这才是自己的东西。我和符定一见面时，常常为此而争论，甚至互相谩骂。老朋友，骂一顿要什么紧，过一会又和好如初。”这是过去文人一般作风，可贵处在于真诚。

平子先生不拘小节。他好客，经常请别人上馆子，吃东西，自己掏腰包。但有时忘记带钱，也请客。大家以为他“为东”，那知吃完饭付钱时，他摸摸口袋，转身问客人：“你带钱没有？请付帐。”客人只好如数照付，平子先生好打麻将，

在计算输赢时，有钱照付，无钱就说一声走了。看戏请客也是如此。凡与他交往的人，都了解其个性，谁也不计较这些小事，这大概叫“名士派头”吧。

一九五〇年，我在长沙街头遇见平子先生，他长衫马褂，潇洒如昔，胸首挂一颗证章。他说：“我现在进入了湖南文史馆。”

平子先生一生不入仕途，以新闻、教育事业终其身，对旧时的权贵们，报以嘻笑怒骂的态度，这较之奔走权贵之门，热衷于名利者，其品质之高低，就不言而喻了。

（原载《湘潭文史资料》第二辑）

我与谢冰莹

谢翔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想念你——我的鸣姑！

我与鸣姑的深情厚谊，是无法切断的。三十多年来为海洋所隔，常聚谈于梦中。

她于一九〇六年出生于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现为冷水江市铎山乡）。原名凤英，学名鸣岗，笔名冰莹，比我长一岁，我们俩家相隔仅半里之路，童年相处，亲如姊妹。

鸣岗上有三兄一姊，她是最小的女孩，父母痛晚崽，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希望她能成为女中豪杰，常课以诗词经书；母亲则希望她成为能刺绣、纺纱、织布、采茶、管家的贤妻良母，并给她裹足。可鸣姑从小性格似男孩，刚强好动，一心记着父亲的教导，以哥哥们为榜样，埋头读书，希望他日能有所成就。对此，她母亲很生气，常将她的诗书小说收藏起来，她则以绝食反抗，始获得读书的权利。她不善于家务事，因有嫂嫂、姊姊等操劳。每当饭后或月下，她像说书人一样，常给邻居小孩和婆婆们讲故事，说得有声有色，使人着迷，深得大家的喜爱。

我最初和二哥读私塾，后来我和鸣姑进了大同镇镇立女子学校，分男女二部，女生部管理得严，不准与男同学有往来，学制为三年。女校学生年龄悬殊很大，年龄大的或家有背景的女同学，常轻视并欺侮年小的同学，我和鸣姑常为此抱不平，她们

*谢翔霄，女，与谢冰莹女士同乡，曾一起考入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部，共同参加北伐。解放后从事小学教育，现与谢冰莹女士有书信联系。

虽然对我们不满，但也无奈于我们，因为鸣姑是县中校长、举人的女儿，我是大同镇镇长的女儿。

一九二一年我和鸣姑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因为校址在古稻田，又叫稻田师范。那时的女子师范是以封建校规办学，管制很严，家在城内的同学，星期日可回家住宿；而我们外县人即或有亲属在省城，也不准在校外住宿。一次，新化同学曾玉容患急病住了医院，同乡同学几次向训导处请示，要求派一个同学晚上去医院护理，而训导处则坚决不同意，但我们还是派了周华贞同学去医院陪护了一夜。第二天训导处挂牌记周大过一次。为此，我和鸣姑等几个同乡同学，愤怒至极，采取了行动，将训导处牌子砸烂，并质问龚主任。在同学们的抗议下，训导处才被迫取消了对周华贞的处分。

在女师时，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乱不安，曾发生过谭、赵（谭延闿与赵恒惕）战争，湘江河内英、日军舰横行，日货充斥市场。为抵制日货，群众组织起来游行示威，烧毁日货，并在日货上加盖“毋忘国耻”之印。日本军舰开枪打死了两名游行示威群众，激起了全城民愤，大喊打倒日、英帝国主义！又一次游行中，一部分学生被捕关押在一个学校里，外面的同学送饼干、糖果等给被关押的同学吃。我们继续组织游行，挺进省政府，省府如临大敌，大门两边，站满荷枪士兵，以防学生冲击。而学生坚持斗争，直到省政府派人作出答复，大家始散队回归学校。而这些活动，我和鸣姑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和参加者。

不久，学校迎来了徐特立老校长，徐老是湖南女子教育创始人之一，他特别注意和关心女生的学习和生活，特别鼓励女生参加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我们是女师十二、三班的学生，年纪比较轻而且非常活跃，学习空气浓厚，成绩也较好。因此，徐老很喜欢我们这两个班的学生。解放后，徐老回到长沙，住在省交际处，正逢他老八十寿辰，我和几位同学去看望他老，他老

一见我，即能叫出我的名字——翔霄，并提到谢鸣岗在学校时的情况。

当北伐军进驻武昌后，即创办了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队干部。在长沙设了招生处，招收男女学员。鸣岗二哥（谢焕文）来信，促她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我们向徐老告假，表示要去投考军校。徐老当即支持，并鼓励我们去。于是我和鸣姑及几位同学，大胆报考了军校。

军校在长沙共招收男女学生一百四十多名，其中，有大学生、师范生、高中生。那时，军校是蒋介石当校长，说湖南学生招得太多，要进行复试。而湖南学生闻讯后，即串连起来，在黄鹤楼开了八次会议，反对复试，推谢鸣岗等人为代表，与学校交涉。学校当局的答复是“军令如山”，一定要复试。结果，前往交涉的代表都被除名，不得参加复试。而谢鸣岗几经辗转改名换籍，参加北方学生的招生考试，考试成绩名列榜首，才入了军校。谢冰莹的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用的。

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女生到校后，即脱去了花花绿绿的各式衣裳，着上了灰色的军装。学校一切实行军事化，要求甚严，起床、出操、上课、吃饭、睡觉等等，都要做到速、静、齐。学校课程有政治、军事、历史、地理等。教师有郭沫若、恽代英、施存统等。同学们热情很高，学习都很认真，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思想。但大家的文化水平差别很大。北方女同学比南方的要封建，文化水平也偏低，他们听不懂南方老师讲的课，要派专人辅导。学校除上课外，还要作实弹射击。我和鸣岗不但不畏惧，而且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尽管生活紧张、艰苦，但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紧跟时代，一切都能坚持。

一九二七年五月，武汉政府军队夏斗寅部叛变。当即调叶挺所属部队去平叛，因为兵力不足，又调军校男女学生，组

成战斗队，开赴前线，我们这些从未上过战场的学生，不怕牺牲，勇往向前，在土地堂击退了叛军的进攻，俘获了不少叛军。以后学生军也归并到叶挺部队。谢冰莹随部队行军，每到休息地时，即以膝盖当桌子，写她的日记，她将日记一篇篇寄到中央日报社副刊编辑孙伏园先生处，孙见她日记写得不错，在报上连续刊登，这就是著名的“从军日记”。自此，谢冰莹这三个字，随着她的《从军日记》的出版，也闻名全国。

在西征途中，我和几个女同学，背着行装和油印机，随军出版《军校生活日报》，并做宣传工作。夜里常睡于地板、草地上，夏天的蚊子咬得实难忍受，热得汗流夹背，但谁都不叫苦，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革命！在途中听到“马日事变”的消息，许克祥杀了许多仁人志士。为此，更激励了我们杀敌的勇气！我们由武昌打到嘉鱼、宜昌、万县，将夏斗寅的叛军驱入四川，我们才回师返校。

西征回校后，蒋介石叛变了；陈独秀也被撤除了中共的领导权；接着又是汪精卫集团叛变。由于时局动荡，学校提前结业，部分学生跟随部队走了，其余学生都被遣送回家（我在军校加入了CP，冰莹是不知道的）。我和冰莹亦遭厄运，离开了军校，回到长沙，住在一个同乡家里。以后我和冰莹坐船沿涟水逆江而上到蓝田，再步行回家——铎山。到家后，才知我俩从军后，乡间谣言四起，说我俩在军中已伤亡，又说乳头被割掉，肠子破肚外流，吓得双方父母终日暗地悲哭。

以后，我和鸣姑来往更为密切，终日谈论女师情况、军校生活、归途见闻，以及家乡的封建恶俗；谈得更多的是今后的追求和理想。

由于我和鸣姑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因而她母亲责怪我带坏了鸣姑。后来，干脆禁止我们来往。我母亲见冰莹母如此不喜欢我，因而也不准我常去她家。

不久，冰莹母亲决意将她嫁到肖家去，以了心愿，并忙着准备嫁妆。为此，鸣姑焦虑万分，需要我的慰藉和支持，但无法相见，怎么办？我只得要我的妹妹当通讯员，我俩以书信联系。但信有时被精明的冰莹妈妈发现而没收了。我俩又换了一个办法，改用英文通信。后来，她母亲怕她出走，将她软禁起来。她也确实出逃几次，但都未果。没办法，只得口是心非地屈从母命，答应成婚，而实际上她另作了奔逃的计划。其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同女校聘我俩去当教师，我已束装先行，当时学校还未正式开学。鸣姑向母亲说明情况，去学校联系教学问题，母亲也就同意了。她到校后，即与我商量，她表示坚决要违母命，脱离封建包办婚姻，决心奔走长沙。

冰莹出走后，引起她父母的伤感，又遭到地方上的咒骂。之后，她母亲写给她的信说：“昔则为鸟中之凤，今则变为食母之枭。”并说今后归来时，定要打断她的腿。冰莹出走，先到长沙，又转衡阳省立五中附小教了一个学期的课，后去上海，得孙伏园先生之助，进了上海艺术大学，并开始写作。

直到一九三一年，她父亲主持新化县立中学校政时，举行七十寿庆，她才随三哥（谢国馨先生）回到新化给父亲拜寿。但她母亲仍旧恨未消，拒不同意她回老家——铎山。喜庆寿辰后，经过她父亲、哥嫂，及亲戚多次劝说，她母亲才勉强点头同意。她回到铎山，看了儿时玩过的山山水水，及亲戚朋友，住了很短的几天，仍同三哥一道告别了家人。

她此次离别家乡后，到处奔波，去过日本，一·二八上海战役后，她离上海去福建。她是北方左联创始人之一，经历了坎坷的道路，写下了不少感人的篇章，曾被人称为新化“女才子”，名扬海内外。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她回到长沙，发动妇女，组织救护队，到前线去为伤兵服务。我那时因小孩过多，家务繁重，惜未能同仇杀敌，引为

憾事！

抗战胜利后，我在大同学校教书十余载，以后被迫离校，我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回家后，不忍闲居，和几个受抗日战争影响休学回乡的大学生，及地方上 有志办学的人，创办了“岩花小学”（今为冷水江市第五中学），学校因限于经济困难，教师薪金极低，生活都很艰苦，吃、穿、用很成问题。我因孩子多，尤为困难！因而教书之外，还得自己纺纱、织布，以抚养孩子。我将处境写信告诉冰莹，希望她能为我谋一栖枝，以养家小。她即回我一信，促我去汉口市二女中教课。于是，我将住房典当给人，折合稻谷，留一部分给在娘家和妹家的孩子食用；自己变卖一些作旅费。

由于筹措旅费，耽误了时间，到汉口已是三月底，学校早已聘满了教师。无法，我暂住进了冰莹家，以待工作。那时，冰莹是《和平日报》的副刊主任。正巧，副刊有位校对离职，即让我顶补该职。不久，她全家离汉口去北平。一九四八年，她应聘去台湾师大任教。因年高腿折多病，现定居美国旧金山，虽有眼疾仍带病继续创作，或修改她以前出版的作品。我和她从武汉分手后，迄今已三十七、八年了，其中有二十余年失去联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俩才又重新联系上。从她多次来信中，我深深地理解她火炽的心，万缕情丝，是何等地思念祖国，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以及她的旧友。

她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许多稻田女师的老同学，不知你们有联系否？曾经有十一位同学联名给我来信，我也回了信，五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还有机会通信，真是太幸运了！”

（原载《冷水江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湘西三杰”之一周朝武轶事

徐 君 虎

一九二五年春，我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七年回国，被分配到韶关北伐军第二军教导师，给陈嘉祐当机要秘书。此时蒋介石正密谋背叛革命，我为陈策划控制邮电通讯、银行基金，将全师迅速移驻湖南，逃脱蒋的魔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九二七年夏，武汉政府任命陈为十三军军长（后改为十四军军长）。此时蒋已公开叛变革命，我从武汉去上海路经南京时，被蒋介石以“共党嫌疑”逮捕，坐牢两年多。一九二九年冬被释放后，我到上海跟陈嘉祐搞反蒋运动。其时，周朝武因在湘西组织救国军失败也到了上海。因此，我与周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

周朝武和贺龙、陈渠珍三人，在二十年代，被湖南人誉为“湘西三杰”。周朝武身材魁梧，秉性豪放，武艺高强，不失为豪侠之士。他随身携带昔年在新疆战场上缴的一对金鞭（有三、四十斤重），人皆誉称“周铁鞭”。周精于双刀武艺，清恭亲王荣禄曾看过他舞刀。他在厅上舞，四角站人端水向他泼，因为刀舞得很快，如银链裹身，水被刀隔住，身上沾不到水。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他站在保皇党一边，深得康有为的信赖。康有一本唐伯虎的画册，在逃离北京时，知道他是侠义

之士，武艺高强，就把画册交他保管。他毅然受命，并保证人在画在。他逃出北京后，跑到河南洛阳，被当地清军缉捕，军法官从他身上搜去唐伯虎画册，知是保皇党逃犯，即将他五花大绑，投入监牢，准备讯实请功。他自知性命难保，乘夜深人静时挣断绳索，爬上屋顶，掀开瓦片，越狱逃脱。

周逃跑后回到大庸办团练，当上了旅长。有一次，驻在洪江，辰沅镇守使蔡巨猷请客，唐生智、陈嘉祐两位旅长都在座。未入席前，周在烟榻上抽烟，对面躺着位老先生，好像在那里见过，于是向他请教，老先生滔滔不绝讲自己曾任军法官的历史。周发觉当年在河南审讯他和没收他的唐伯虎画册的就是这个老先生，他是蔡钜猷秘书长的岳丈。周不禁火冒三丈，立即喊马弁将这个军法官捆起来要打，经蔡巨猷、陈嘉祐、唐生智等讲情，这个军法官派人从湖北襄樊家中把画册取来，周才放人。这个画册后来又遗失一次，周驻桃源时，从一个学校的图书室又找到了。以后，周流寓汉口，生活困难，让商务印书馆拿去仿制了一次，他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可是，后来被他的姨太拐走同情人跑了。

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陈嘉祐所辖的第二师师长，驻扎常德、慈利。次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到处搜捕进步学生。他的部队在常德抓了十几个准备去北京读书的学生，他亲自讯问。

周：你们是干什么的？

学生：我们想到北京读书去。

周：长沙一样可以读书，为什么偏要去北京读书呢？

学生：北京能学到进步思想，能为国为民革命。

周：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想当共产党，又不敢承认是共产党，好汉做事好汉当嘛！

学生：（有个学生把胸部一拍）我是共产党，怎么样？

周：好样的！（他吩咐身边的随从），叫军需处给他们每人几十块光洋，让他们到北京读书去了。

阎、冯联合反蒋时，周被邀去北京，当年受到他资助的学生，号召湘西同乡举行热烈的欢迎会。他在欢迎大会上，很风趣地说：“老乡们，我很抱歉，我的军队纪律不好，到处搬被窝，有人叫我是被窝司令。”周朝武流寓上海时，陈嘉祐也住在上海，周的生活费用靠陈嘉祐、谭延闿接济。周的豪放性格，有以下几件事可以说明。

一、有一次，谭延闿派人给他送来八百元生活费，他哗的一下泼在地上，口里骂道：“老谭这样小看老子，当年你和赵恒惕在湖南争夺地盘时，赵给我送来常澧镇守使的官印，并许军费十万元，老子都不要，带兵到岳麓山，给你谭延闿炮轰赵恒惕，老子为国为民革命的心只值得八百元吗？”。

二、一天晚上，他到上海“齐天大圣”剧院看戏，穿着长袍大褂，拿根长杆旱烟袋，剧院的茶房一看，认为他是一个乡巴佬，没有殷勤看座，也没有泡茶送手巾，他马上站起来要走。另一位茶房看见了，就热情招待，他看了一会戏，说不好看，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放在茶盘里。茶房要给他找钱，他说不用找了。弄得茶房道谢不迭，他却扬长而去。

三、有一次陈嘉祐军长请客，他到得早，坐在楼下客厅里，陈的军需处长盛谷貽后来，从客厅门口路过，看见他没打招呼，大摇大摆地上楼去了，他一气之下大骂：“过去你克扣了多少军饷，今天不认得老子了！”并要打盛处长。陈军长的弟弟嘉任见此情况，立即上楼告诉陈军长，陈军长一愣，邀盛处长下楼向周打招呼，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四、上海英租界两旁，江湖相士卜卦看相，周与我同到一相士窗前，他伸手请其看看有无孙子，相士猜想此老可能没有儿子，于是说：“老人家请不要怪我讲直话，你连儿子都没

有，哪有孙子！”周勃然大怒，打了他一耳光，并说：“我的孙子比你还大！”那相士双手捧脸，痛不可言。旁观者大悦，责相士乱说，自讨苦吃。

一九三一年，阎、冯反蒋失败，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紧了对苏区进行围剿。湖南省主席何键，想消灭贺龙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知道贺龙与周朝武都是“湘西三杰”之一，想用周攻贺，就打电报到上海，邀周朝武回湖南。周接到电报后，即和我商量，我说何键想利用你打贺龙，你何不将计就计，借此组织起自己的武装。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让我先回湖南与何键联系，他后到汉口。我到长沙见了何键，他说准备由湖南与湖北两省联合成立湘鄂边防司令部，由周朝武任司令，经费由两省负担……，藉以巩固边防。我回到汉口向周汇报，他要我把何键讲的话一字不添、一字不少地向他报告。我说：“何键说我与周绪棠（周朝武别号）感情很好，过去他驻常德，我驻桃源，经常交往，他下野后，我帮他收编了部队，他的家属也由我供给生活费，现在成立湘鄂边防司令部，请他来当司令，经费、枪械由湖南、湖北两省负责，我已致函湖北的何成浚协商此事了……。”周朝武听了说：“那时我们共同运鸦片烟去汉口，彼此合作，狼狈为奸呀！这小子还记得，很好。”

后来，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以周系湘人，成立湘鄂边防司令部，要他出钱出枪，却无权指挥，不愿负担经费，并报告蒋介石，勿庸多此一举。拖了几个月，不了了之。何键以情面难却，最后给周朝武一个省政府顾问的名义，每月薪俸四百元。他到长沙住了不久，就病死了。死后上海的报纸以“湖南绿林怪杰——周朝武某月某日病卒长沙”为题刊登了新闻。

周朝武是个赳赳武夫，识不了几个字，几十年军旅生涯，他经常听秘书给他念函电，听得多了，他也能口授电文，顺理成章。记得那次给何键复电，秘书拟的电文开头是：“湖南省

主席何公钧鉴。”他一听就说不要这么称呼，口授道：“芸樵兄（何键字）电悉，兹派某某先行来省聆听教益，绪棠随后返湘报命。”这封电文不但文理通顺，寓意含蓄，而且不卑不亢。他的书法也很别致，常应邀为人写“龙虎如意”几个大字，“虎”字末尾一笔能拖很长，极为壮观。（程杰生 整理）

（原载《大唐文史资料》第一辑）

我所知道的陈渠珍

孙锡华*

陈渠珍统治湘西近二十年，大家称他是“湘西王”。他在湘西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同陈渠珍相处的时间不长，是断断续续的，这里所写的并不全面，但是真实的。

“护境息民” 效法阎锡山

自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失败病死后，各省大小军阀纷纷割据称雄。有的占据一省，有的占据几省，互相争夺，战祸连年不息，中国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唯独山西的阎锡山，自民国初年占据山西省后，打着“保境息民”的旗号，不参加军阀混战，也不容许其他军阀进入山西境内，采用闭关自守的政策，自搞一套统治措施，把山西省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独立王国。他自己成了“不倒翁”式的人物。陈渠珍对阎锡山这套作法是景仰已久的。他从一九一七年由田凤丹手中接管湘西军政大权，到一九二一年进驻保靖，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对湘西各县的统治权渐趋巩固后，就派员到山西考察，他对阎锡山个人及其在山西的一套作法，推崇备至。陈渠珍心中明白，他当时只有四、五千人的军队，是没有力量向外扩张的。同时，湘西地处湘、鄂、川、黔边区，山高水险，交通不便，加上民族情况复杂，经济和文化落后，历来都不是大军阀争夺的对象。这一

*孙锡华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曾任陈渠珍部少校军法官，跟随陈渠珍多年。

切，都是他闭关自守和创立湘西独立王国的有利条件，也就是陈渠珍统治湘西多年的主导思想和一贯方针。

陈渠珍在一九二一年进驻保靖后，提出的口号是：“保境息民”。而第一步措施，是用“胡萝卜兼大棒”的软硬兼施政策。一方面，对所辖各县拥有武装的豪绅和匪首进行招抚。当他们接受招抚以后，都给予高官显职。如永顺的向子云，龙山的刘紫梁，大庸的周铁鞭，保靖的朱德轩，花垣的田义卿，古丈的舒安卿等，都委为团长、营长，仍驻原地，维持治安。另一方面，对不接受招抚的土匪，则派兵清剿，严厉镇压。酉水沿岸的土匪几乎杀戮殆尽。这样一来，地方秩序一时恢复正常，商船可以通行。给陈渠珍统治湘西创造了条件。

陈渠珍效法阎锡山，从一九二二年起，在他的驻地保靖县城，采取一些措施。概括有以下几项：第一是办教育。他先后在保靖县城创立模范小学、女子小学、湘西十县联合女子职业学校、湘西十县联合保姆养成所、湘西十县联合中学、湘西十县联合茶业学校。由于学校办得多，校舍和师资都有困难，可是陈渠珍决心大。校舍不足，除将学校和庙宇进行改建、扩建外，还新建了一部分。师资不足，就向外地聘请。如李云杭、侯厚忠等，当时在长沙教育界都是比较有名的。特别在女子教育方面，当时保靖风俗落后，多数人不愿意女儿入校读书。陈渠珍采取各项措施，解除人们的顾虑。如本城地痞肖伯庭，一天夜晚在女校前面路旁解小便，就被拿到统领部打了几百板子。于是，任何人都不敢对女学生胡作非为。这些作法，开通了女子读书的风气，保靖教育一时比较“发达”。第二是办工业。设有枪炮局修造枪械，并在县城筹建火力发电厂，锅炉和设备均已运到，因熊克武部过道，中途停建。第三是修铺街道。当时，保靖县城街道坎坷不平。陈渠珍发起在全城修铺了石板街道。路修成后，我见过陈渠珍乘坐人力车到处查看。第四是赈

济灾民。一九二二年夏季，久旱不雨，米价由每升四百铜钱涨到八百铜钱，人民只得采摘竹米（那年全县山竹普遍开花结实）充饥，陈渠珍为了赈济百姓，多处设点施粥，此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北洋军阀时代，陈渠珍最初的职衔是“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来，改为“湘西屯边使”，所部编制和员额都不足，省里发给他的经费也不多。他既要扩充军队，又要举办公事业，财力当然不够支配。加之湘西各县经济落后，战祸连年，在民穷财尽的情况下，单靠正常赋税收入，满足不了需要，从此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第一、增收田赋和附加。经常在一年内增收二至三年的赋税。第二、抽收厘金和护送费，除各县征收货物通过税，供养本县地方团队以外，陈渠珍还在保靖设立“北河保商局”，分别在青鱼潭和乌宿设置税卡。此外，还要征收商船护送费。人民当时形容这种现象是：“十里一关，五里一卡”。货物通过要交纳正税，征收人员还额外勒索。第三、征收鸦片税。陈渠珍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征收烟税，对那些不肯种烟的农民，则征收“懒税”。以致烟毒遍地，贻祸无穷。第四、巧立名目，勒派捐款。限期交纳，否则拘捕“押交”，有的人被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扩充军队 交出军权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经亲戚彭凤九介绍，受陈渠珍委任为陆军新编第三十四师司令部少校军法官，我到凤凰去见他之前，以为他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可能是红眉绿眼式的人物。可是，见面后的第一个印象却是一个和蔼的老头子。他对我客气地说：“我们都是湘西人，建设湘西，都有责任，你来这里工作，我很欢迎，有困难可以随时对我说。”并叫军法处长陈景尧送我到军法处工作，陈渠珍对于求助于他的人，是量

才留用，不用的发给路费。他部下的“冗员”特别多，最多的是参谋、副官之类的人员。大家说他“参谋成团，副官成营”。这些人员中，有的只挂个空名不支薪饷，有的只发少数津贴，不参加实际工作，搞一张委任令作护身符。陈渠珍对这些人也不加过问。但犯了罪，就要进行惩办。军法处连我在内，只有五个军法官和五个书记与司书，是个人员最少的处。据老同事说：一九三一年，有个名叫陈龙章的军法官，因承办案件收受贿赂，造成错案。那个行贿的，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陈军法官，殊不知派去送礼的人，糊里糊涂地把礼物送到处长家里，处长便向陈渠珍反映。陈渠珍立即下令将陈龙章撤职查办，并将错案重新改判，还把行贿的人关押判刑。陈渠珍说：“唯名与器不可轻易加人”。此后，便把挂名的军法官改为参议，对实际任职的军法官也进行了调整。这就是军法处只有几个人的由来。

陈渠珍认为，由于几年没有扩大军队，充实武力，而把人力财力用在地方事业上，以致熊克武部过境无力抗拒，是个教训。他回凤凰后，把全部力量放在整军、扩军上面。北伐军占领湖南后，他受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第十九师师长，后来改为陆军新编第三十四师。番号虽有改变，他始终统治着湘西。他对蒋介石十分蔑视，常常对人说：“古人说‘不学无术’，但蒋介石却不学有术。他取得政权不是靠的学识道德，而是靠的阴谋诡计。”他为了整军扩军，在凤凰开办了经武学校，培训基层军事干部；又开办兵工厂，制造“凤造”步枪和掷弹筒。到一九三三年，他的正规部队扩大到四个旅、十二个团。加上收容和受他节制的川军杨其昌、皮德沛和黔军雷鸣九等部约二千余人，以及各县保安团队五、六千人，总兵员达到三万人左右。陈渠珍满以为羽翼丰满，可以高飞，加上雷鸣九的怂恿，企图夺取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地盘。不料，镇远一

战，大败而归。陈渠珍才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于是又闭关自守，进行休整和补充。

陈渠珍统治湘西，在政治上颇有基础，他的政令一出，辖区内谁也不敢违抗。省府派到湘西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前，要先到凤凰拜见陈师长。陈渠珍对此，只要是绝对服从他的，他就尽力给予支持。记得有个姓秦的永顺县长，为了一件刑事案，受到永顺车坪大恶霸傅某的武力威胁而逃出县府。陈渠珍接到秦的电话报告之后，立即电令刘团长把那个恶霸逮捕枪决了。对于那些不尊重和不服从他的县长，就休想站住脚。还有个姓黄的乾城县长，是省主席何键的亲戚，他仗着靠山硬，不去拜见陈渠珍。后来，在陈的暗示下，这个县长到任两个月，既征不到一文钱，也征不到一粒粮，当地士绅都不见他的面；连审理案件也传不到当事人。这时，这个县长才被迫到凤凰朝见陈渠珍。陈却闭门不迎，弄得这个县长一筹莫展，只好弃职而走。陈渠珍凭藉他的“威望”和权力，什么事都管，甚至两夫妻口角他也管，而且令出“法”随，所属官吏和百姓都畏之如虎，谁要反对他，谁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由于他的军费浩繁，挥霍无度，苛捐杂税之多，群众负担之重，比之他在保靖的时代，要沉重许多倍。特别从一九三〇年起，他在凤凰开办湘西农村银行，滥发纸币，强迫流通，后来变成废纸，严重阻碍着湘西经济的发展。

陈渠珍还特别重视凤凰同乡关系，师部的七个处长中，凤凰人占了五个。其次，这些人都是一些为正不足，为邪有余的低能儿，只会排除异己，假公肥私，什么人民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没有的。可以说，陈渠珍在统治湘西的漫长岁月中，把湘西已弄得贫穷落后，漆黑一团。而与这班人的罪恶活动分不开的。

陈渠珍一生不抽烟，酒量不大。他无很多私人财产。但娶

有七个小老婆，其中，年龄最小的比他还小三、四岁。他生平喜欢读书。走进他的书房，书籍成堆，但绝大多数是古籍，很少新书。他撰有《荒野尘梦》和《军人良心论》等书。前者，是叙述他从进藏（西藏）到出藏的经历；后者，则充满唯心主义和封建伦理思想。他是个比较尊重知识的人。比如，程潜（龙山人）曾留学日本，当过大学教授，学识渊博，一九三三年陈渠珍把他接到家中作客，向他求教。在陈渠珍部下工作的，即使官阶相同，待遇都不一样，学识高的工资多一点，可谓论才行赏吧。

陈渠珍对湘鄂川黔革命老根据地的红军，并不认真与之作战，只派过周燮卿旅和一些地方团队去应付一番，他的直系部队没有派去作战。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贺龙将军有旧谊，而主要是保存自己实力。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陈渠珍奉令阻截，在同年八月离开凤凰，我是随军的唯一军法官，陈渠珍率部达乾城后，即停留不前，精简师部。那时，何键派五个师兵力，分数路进入湘西，追击红军。同时，何键又逼迫陈渠珍离开湘西，并停发新编三十四师军费，勒令陈部撤销关卡，停征税捐，借以迫使陈渠珍就范。我们从那年十月份起，就停发军饷，仅由师部供给伙食和零用钱。记得，过春节那天，厨房给每桌加点菜，算是过年了。至于零用钱，直到除夕深夜十时才发放。陈渠珍面对这种僵局，十分为难，如与何键公开决裂，将被扣上“破坏剿共”，如屈从何键的安排，因与何积怨已深，最后也会被何消灭掉的。陈渠珍剩下的出路，只有辞职下台，徐图再起。他抉择了后一条路。在召开的高级军官会议上，他沉重地宣布：“现在局势严重，我决定辞职。希望你们安心任职……。”会上周燮卿说：“何键欺人太甚，我主张和他打，我负责解决李觉的十九师。”其他旅长、团长也表示同意。最后，陈渠珍说：“我在湘西的目的，是想

保卫这块地方，如果何键打起来，地方糜烂，人民受害，我会得不到家乡父老的谅解，是不能做的，现在我辞职的主意已定。”散会后，他立即向军委会和省府发出辞职文电，交出军权。

一九三六年一月，军委会命令将新编第三十四师第一旅、第二旅和教导旅改编为陆军第一二八师，任顾家齐为师长；将第三旅周燮卿改编为陆军独立第十四旅，周燮卿仍为旅长，并批准陈渠珍辞职，撤销原有番号。同年二月，部队改编完成，调出湘西。这时，我也离开乾城，去常德与家属团聚。

安定和建设湘西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陈渠珍授意旧部龙云飞等组织湘西草屯抗日军，起兵占领乾城县城，驱逐何键委派的行政督察专员余范传（长沙人），其他各县纷纷响应，保靖县城由吴恒良、梁明元部攻击。不久，何键垮台。继何键主持湖南省政的是张治中，张深知收拾湘西乱局，最适当的人选是陈渠珍。于是，邀请陈渠珍担任省府沅陵行署主任。

陈渠珍觉察到过去重用同乡，弄得政绩毫无，民怨沸腾，很是失策。他出任沅陵行署主任后，主任秘书为陈景尧，一科科长侯厚忠，二科科长杨景，三科科长肖连蔚，都不是凤凰人。我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去沅陵见陈渠珍，陈是很念旧情的，他说：“你来迟了，人事早已安排，你暂时住在这里帮助秘书室做点工作，以后再设法安排。”这样，我就在行署作客三个月。

湘西各地的草屯抗日军大多数是陈渠珍的旧部。陈渠珍出任湘西行署主任后，一声号召，这些旧部都服服贴贴听从改编为行署直属部队。

一九三八年九月，陈渠珍率领一营警卫部队，亲自赴洪江

督剿土匪，我随同办理文书工作。那时，沅水流域最大的股匪是杨国雄部，有人枪四千多，离洪江市区二里外的地方就是他的天下，市区内亦有人枪五百多，由哥老会龙头大爷饶松坡和禁烟委员严济宽指挥，搞情报、筹款和物资接济工作。陈渠珍一到洪江，就把饶松坡、严济宽二人拿获枪毙。并叫我马上写布告张贴，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的犯罪事实，不知如何写？”他说：“这二人的罪恶，洪江人人皆知，只要写这二人已经正法，胁从者一律不问，就行了。”我便写了布告稿：“匪首饶松坡、严济宽二人，业经正法，胁从一律不问。此布。”他说：“马上叫人写好，立刻张贴出去。”布告贴出后，市内的匪众吓得张惶失措，纷纷逃去。过了一天，后续部队陆续到达，用五个团的兵力进剿杨国雄匪部。部署完成后，他仍回沅陵，派旅长陈范为沅陵行署驻洪江办事处处长，指挥剿匪事宜。

长沙大火后，张治中离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沅陵行署改为湘西绥靖公署，仍以陈渠珍为主任，职权不变。

一九三九年春天，杨国雄匪部在雪峰山脉丛林，全部被肃清，杨国雄只身逃出，不知下落。

陈渠珍在洪江剿匪告一段落后，在洪江办了一些教育文化事业和工厂。如办豫章联合小学，聘请李云杭为校长。我离开洪江时，这所学校还存在。还办了豫公图书馆，是由洪江商民修来纪念陈渠珍的。一九三九年夏天，房屋已建成，规模很大，但图书尚未购置，后因陈渠珍下台，就将房屋移作别用了。还相继办了《长江日报》，派陈一范为社长，我任总编辑，经费由洪江商人捐助，同年六月初开始出报。我们调离洪江后，又停办了。之外，开办了靖县金矿，淘取沙金，因入不敷出，不久也停办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薛岳撤销湘西绥靖公署，将绥署所属部队编为暂五、暂六两个师，派戴季韬为暂五师师长，龙云飞为暂六师师长，并成立陆军新编第六军，陈渠珍为军长，辖上述两个师，参加抗日战争。

我于同年七月初，回到乾城，准备回家看看。陈渠珍对我说：“上面派我当新六军军长，我年老担不起重担了，决定不就军长的职务。你还年轻，我已安置你为军部少校秘书，现在军部派专车接我去桃源，我不去，你明天同景尧一起坐这辆车到桃源军部报到。”这是我与陈渠珍最后一次会面。

结 束 语

陈渠珍统治湘西近二十年的方针有过三次较大的改变：一、在北洋军阀割据中国各省的时代，他在保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企图闭门建设新湘西；二、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年代，他在凤凰扩军整军，企图向贵州发展；三、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变得比较开明，想安定和建设湘西大后方，为抗日战争作点贡献。这些变化反映了旧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但是，他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保护他自己在湘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

陈渠珍的决策原则是他自己所说的：“三分成竹、七分冒险。”他无论办什么事业，事前不充分调查研究，没有周密的计划，存在盲目性，如他所办的学校和工厂，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半途而废。

陈渠珍对上倨傲。与蒋介石、何健、薛岳等若即若离，矛盾重重，因而两度被迫下台。他对部下，“笃念”旧情，因而得到部属及其一伙的支持。他在湘西能够屡扑屡起，成为“不倒翁”式的人物，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陈渠珍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有些人对他所作所为，知道不多，故根据我所知道的史实，一一记述，以供参考。

（原载《湘西文史资料》第四辑）

伯父龚浩事略

龚应红*

伯父龚浩先生，字孟希，号星耀，湖南益阳迎风桥乡人。他生于一八八七年，历经清末及民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的动乱时代。初习于业，后跻身行伍，于一九四九年冬被迫迁居台湾，度过了他的晚年。一九八二年五月七日逝世于台北，享年九十六岁。我少时随伯父就读于南京及长沙，后又随他工作于西安。兹据所见所闻，纪其生平事略于后。

伯父出生于一个祖业微薄，仅几斗旱田与部分油山及一间半瓦屋的耕读家庭。一家人生活靠祖父周卿公操持手工业及我父玉阶公从事农业收入维持，尚能自给。伯父乃得以半工半读的机会进入乡间私塾。他发愤图强，勤奋好学，博得老师的器重与同学们的赞赏。当时的“京馆”学生都要寄宿，伯父有时交纳伙食米有困难，工友龚汉清便在收米时将升子倒过来量，尔后传为佳话。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他与同学参加益阳县考，出榜后相邀进城看榜，他未见自己的名子，面有愧色。但同学们都围拢来向他祝贺，他考了第一名。他很奇怪，再仔细看榜时，乃是因为榜头用珠笔勾了一下，名子被勾得看不清楚。

这一年他十五岁，由于家中人口增多，（伯父居长，兄弟姐妹八人，各居其半）家庭负担日趋加重。其时，清廷腐败，

* 龚应红毕业于成都中央军校二十期特科，曾任国民党第五兵团五十七军军部少校副官，龚浩之侄。

列强欺凌，家忧国难，激起了他自谋出路的欲望。他毅然投笔从戎，以文童而习武事，报效国家。初入湖南陆军中学，一九一一年参加了武昌首义，冬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骑科学习，一九一四年毕业后服役于川军。一九一六年参加护国战争，事定，又升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一九一九年毕业后被选拔到陆军部负责军学部门工作，一九二一年回湖南任岳州守备司令部第一团团团长，援鄂战役时任前敌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唐生智任总指挥）。在作战中，运筹策划，初露头角。一九二五年升任湖南省军务司长兼长沙戒严司令。同年七月，广东成立国民政府，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一九二六年，他升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军北出湖南，攻取武汉诸战役中，战绩卓著。一九二七年被升为军委会参谋处长，襄赞北伐大计。一九二八年因派系纷争伯父与唐生智被迫逃亡日本。归国后复组河北旧部，后被改编为第五路军，进驻北京。一九二九年夏被任命为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兼骑兵第一旅旅长驻洛阳。未几新膺军长之职。后隐居北京多年。

九一八事变后，伯父任军委会参谋处长，一九三五年任参谋本部（总长程潜）第二厅厅长，旋任第一厅厅长，主管全国及各期会战计划，并兼陆军大学战史教官。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伯父升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随程潜总长驻石家庄督师河北，兼第一战区参谋长，亲临前线指挥对日作战。

一九三八年伯父出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工作，兴办农林、公路、电信、矿务等，均有显著成效。还动员民众修成二百余里渠道。

一九四〇年，伯父奉调重庆陆军大学，任教务长兼兵学研究院副主任。在校先后八年，编写了许多军事教材，《拿破仑

战史》一书最为有名，还开设了“拿破仑战史讲座”。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都听过讲座。

一九四四年奉命退役，受聘于西北战区总参议，日本投降后任西北大学教授。

伯父在保定军校学习时，思想进步，热情奔放，富于爱国心，倍受蒋百里先生的器重。伯父尔后受聘于陆军大学执教，就是蒋先生推荐的。在保定学习期间，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打下了深厚的军事理论基础，并与程潜、唐生智、谢福松、吴尚、何宝等为同期同队同学，相处十分友好。

龚姓在益阳是一个大姓，人口约在二万以上，聚居于龚家坪一带。一九四一年，他奔丧回籍守孝时，与族人龚荣湘等谈及乡间情况，出于对本族子弟读书及桑梓教育的关心，乃提出办学意见，得到族人的赞同。即嘱龚冀华等着手筹办龚氏思齐小学于龚家坪明书湾，伯父被推任董事长。他亲笔书写“思齐学校”四字，以作纪念。嗣后又集中部分族产，在新桥河头建校，扩大规模，成为完全小学。解放后该校原址改建为益阳县三中（即今益阳市九中）。

一九三三年伯父任职于南京时，湘籍人士从政从商来京者甚多，苦无处联络乡谊。伯父知道后，便与程潜、唐生智等人联名发起修复南京湖南会馆。他们筹募资金，自己亦解囊相助。一九四〇年又着手修建重庆湖南会馆。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北与陈明仁、丁德隆谈话时，曾希望停止内战，举行国共和谈。一九四九年冬，他被迫飞往台湾。一九八二年伯父在台北逝世后，他在大陆的学生王衡、管长治曾在《团结报》上写诗悼念。王诗曰：

“文采风流一代崇，鲜贤延誉起隆中。
从游瑜亮多时彦，中有庞孙并世雄。
谁使党争成割据，遂会师友隔西东。”

遙聞噩耗來孤島，海內門生哭此翁。”

管詩曰：

“道德文章眾所崇，指揮若定笑談中。

樞機曾獻安邊策，學府都稱命世雄。

誰使高齡羈台北，空令長夜夢湘東。

心衷往事重回憶，五十年前說拿翁。”

（原載《益陽市文史資料》第七輯）

回忆父亲刘岳厚

刘笃平*

近年黎澍、傅白芦同志曾撰文，回忆我的父亲作为共产党的老朋友在抗日战争初期掩护地下党共同抗日、争取民主斗争的事迹。吕振羽同志的《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也详细地谈到父亲当时支持他们在湖南开展工作的情况。每当我看到这些文章或听别人谈起父亲生前的活动，内心就异常激动，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他老的一生。

与何键的分道扬镳

父亲是清末湖南高等工业学堂（湖南大学前身）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在长郡联立中学教过书，继任湖南营产清理处科长，经管拆除长沙城墙的工程。一九一六年，何键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分发到长沙新军中当见习军官，因系同乡，常来父亲处叙旧聊天，交情日深。后来，父亲任湖南省公路局工程师。一九二九年春，何键当上了湖南省主席，便简任父亲为公路局局长。

湖南历经赵恒惕、鲁涤平等的统治，百孔千疮。公路建设，更是一塌糊涂。父亲依靠广大职工，藉助工程专家周凤九等技术人员才智，使湖南路政走上正轨。当时，湖南公路建

* 刘笃平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解放后曾在北京、长沙担任过编辑和教师工作。

设，被人们誉为全国第一。据公路局的老同志说，父亲抓公路建设，最重视制度，极恶公私不分的歪风。有一次，我祖父乘车往某地，车站站长见是局长的老太爷便不让他买票。父亲事后知道了，马上叫人去补票，一分钱不少。并将此事通报全局：凡职工和家属，非因公一律不许无票乘车。

当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他老深感不从政治着手，无法挽救国家，便想借助何键的力量，在湖南奠定一个基础，进一步实现自己“政治上的长远打算”。湖南地处南北要冲，两广军阀和蒋介石都重力争夺，CC系指派彭国钧等人，攫夺了国民党湖南各地组织的权力，企图搞垮何键。形势对何键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父亲决计为何键夺回湖南党权，因此主动向何键表示愿与CC系一试锋芒。就这样，他老卷入了湖南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社会上称CC系的地方势力为“甲派”，父亲这一派为“乙派”，而“甲”字形似钻子，“乙”字形似皮刀，故这一派系斗争，便被好事者称为“皮刀”与“钻子”之争，又名之曰“甲乙派斗争”（父亲为乙派首领）。斗争结果，乙派大获全胜，湖南党权从甲派转移到乙派手中。

湖南的老一辈都清楚，那时的湖南，各级文武官吏大多只知道要钱，很少认真办事。父亲说过，有一个以直言著称的官员，在何键召开的某次检查省政得失的座谈会上，当着各厅局长的面说：民政厅为政的方针是“不得罪于巨室”；财政厅的财政是“不遵守会计制度，一塌糊涂”；建设厅则尽是贪污，可以说是“贪污建设”；骂得他们哑口无言。父亲目睹这一局面认为非彻底改革不可。因而一九三四年秋，他老代替何键为湖南省党部执委会常委三个月期间，摸清了何键政治、经济、军事的底子，便毅然决然向何键建议采用“以党统政”的方针，大力刷新湖南的政治、经济、军事。谁知，一贯对父亲言听计从的何键，在这个问题上，却极其冷淡。父亲大所失望，知道不可能借助何键的力量

来作政治上的“长远打算”了。从此，他对党务的态度，日益消极。到了一九三六年元旦，父亲决计跟何键分道扬镳，向他提出口头辞职，并推荐周凤九继任局长；准备办好移交后正式提出辞呈。对此，我们一家人都很替他老惋惜，找了他的好友醴陵郭小璠去劝他，但他说：“芸公（何键号云樵）已病入膏肓，湖南搞不好，我留何益？”就这样，他老终于辞职去了日本。

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他老为什么去日本呢？据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湖南大学老教授黄志尚回忆说：“他当时看到日本富强，中国贫弱，他到日本来，就是想考察日本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如何才能富强？”他有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时常骂国民党腐败无能。他虽然跟何键的关系很深，但是也经常批评何键。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

他在东京，深入考察，听说日本的警政是世界上办得最好的，便亲自到东京警视厅去了解。但对他们的答复却不满意，认为他们对外保密，不肯将真实的做法讲出来。他老怀着很大的希望去日本，想寻求能使中国富强的良方。但考察了半年多，他的愿望落空了。他老怀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日本。

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年底，恰恰姜运开先生从日本归来，任教长沙，他老便接姜先生搬来市郊藕芽冲家中居住，共同研究国家前途问题。姜老至今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你父亲很有民族气节，关心国家命运，从日本回来后，仍继续探索中国富强的道路，认真钻理论，我住在你家，和他一道学马列。他接受新事物快，有些地方，我一时还未弄清，他却透彻地理解了。”姜老先生接着又笑笑说，“当时，读马列的书是要冒风险的。所以，我帮你父亲买的书，上面都是写的我的名字。”我感到奇怪，问：“为什么不写他老自己的名字呢？”

姜答：“他老当时是有地位的人，写他的名字，人家看见了不好；写我的名字，如果出了问题，他还可以想办法对付。”

正是因为学习了一点马列主义，父亲开始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才更深刻地认识了国家社会的问题，才认定中国的出路，只能重新探索。因此，从一九三七年开始，他老便主动地、热情地和当时湖南地下党员吕振羽、翦伯赞、黎澍、孙伟、谭丕谟等进行了较为频繁的接触。孙伟率领的儿童剧团在湖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时，父亲还在经济上给予了支援。

抗战初期，我家迁往醴陵姚家坝，我一人随父亲住长沙藕芽冲，在雅礼中学读初中。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父亲连忙向我招手：“过来，见见翦伯伯。”我走过去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父亲笑着指客人说：“翦伯伯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以后要多多向他请教！”客人很亲切地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寒暄了几句，父亲便叫我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这时期，吕振羽等同志也经常来我家。父亲对他们很热情，常常留他们吃饭。我家园中有一口塘，他们来了，父亲就叫工友老张撒网捕鱼，用红辣椒、豆豉蒸鱼吃。父亲为什么这样热情地款待他们呢？他们为什么经常来我家呢？

那时我一点也不明白。直到后来，我看到《革命回忆录》所载吕老遗著《记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一文，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当时正在紧张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哩。

当时湖南国民党内部实际上有三派：何键派（乙派）、CC派（甲派）、复兴社派。吕振羽采取了联合乙派、孤立甲派，中立复兴社派的策略。通过当时赞同共产党抗战主张的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介绍，吕来湖南找了何键和父亲，取得他们的支持，首先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

（简称“文抗”）。由吕振羽、王季范、伍慧农和父亲，以及曾参加上海救国活动的民主人士陈润泉、共产党员李仲融等，

共同充当发起人。为了减少阻力，“文抗”也吸收了当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派和复兴社的头面人物参加，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推吕振羽、陈润泉、谢祖尧、廖庶谦、李仲融和我父亲等为常务理事。会理事。

“文抗”成立后，“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也相继成立，并选举覃振、何健、徐特立、张西曼、黄一欧、赖琰、翦伯赞、吕振羽、陈大榕和父亲等为理事。覃振、何健为正副会长。分会成为“文抗”的一个活动据点。就这样，党在湖南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创办《开明日报》

父亲出于爱国热忱自日本归来后，便毫不犹豫地靠拢党。至一九三九年八月，他掩护了地下党员黎澍、骆何民（后来还有廖沫沙）等，还在茶陵创办了《开明日报》。

据姜运开教授说，当时黎澍和他都争取父亲办《开明日报》。“开明”意即“开明士绅”。办报的方针，就是宣传抗日。在报纸上宣传抗日，发生的影响要大得多。父亲认识到这一点后，马上改变了上山打游击的初衷，坚决地支持地下党的主张，合作办报。我曾听到父亲谈过：国民党军队打仗太糟糕了。日本鬼子还未来，便闻风而逃，只有少数爱国官兵誓死抵抗。国家危亡之际，办一张报纸，发动军民抗日，是当务之急。

为了保证《开明日报》的革命性，黎澍、姜运开同志和父亲一道商量：编辑部工作人员全部用革命青年，总编辑由黎澍担任。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垂涎报社的工作职位，报社一律实行低工资制。每月除吃饭以外，每人只发几元零用钱。

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了抗日救亡，父亲是咬紧了牙关的。当时我到重庆去读书，绕道茶陵去看父亲，亲眼看到他老和黎

澍等一班革命青年办报的情景。报社生活十分艰苦，伙食很差，我睡在父亲房内，吃饭却跟父亲和职工一起进食堂。八个人一桌，只两个菜。我住了六天，六天都是吃的萝卜白菜之类，外加一碟豆豉炒辣椒。

在《开明日报》创办期间，父亲支持共产党的立场是坚定的，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勇敢的。我知道，当时国民党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曾对父亲极力拉拢。他一到湖南，便聘请父亲为省府顾问；以后，只要遇有机会，便在各种场合公开赞扬他老人家。当有人将这些情况告诉父亲时，父亲丝毫不为所动，只是笑笑，仍然朝夕和中共党员、革命青年在一起办报，无所顾忌地在报上大量采用国新社从桂林发出的解放区和沦陷区的通讯，尖锐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当局。

当时的副刊编辑王锐聪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想搞掉共产党的枪杆子，重庆《大公报》便写了一篇《军队国家化》的社论，全国各地报纸一律转载，唯独《开明日报》拒绝刊登。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厅大发雷霆，罚《开明日报》停刊三天。”

由于《开明日报》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湖南国民党当局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深夜，派特务将骆何民、王锐聪等十二人抓了去。面对国民党特务这一疯狂行动，父亲愤恨已极，向薛岳提出口头抗议。为了营救被捕职工，父亲到重庆找刘斐（时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有进步倾向，是父亲的族侄）。这时，我在重庆南开高中读书。有一天，他老突然气愤地对我说：“蒋介石是一个坏东西！你们学生还以为他是一个民族英雄吧？”接着，又讲了一些事情，最后告诫我说：“你没有参加学校里的什么三青团一类的活动吧？——不要参加！”

后来，父亲返回湖南，终于将所有被捕职工营救出狱，并设法将骆何民送往桂林（但以后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为“文萃三烈士”之一）。可是，报社却终被国民党中

宣部勒令停刊。在报社停刊之前，父亲曾令《开明日报》向全国揭露这一行径，抗议国民党特务蹂躏人权、摧残舆论、破坏团结的罪行。这份报纸出版后，首先派专人送到桂林，交黎澍同志分寄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件大事。

对于父亲当时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开明日报》的老同志至今还难以忘怀。在一九八一年他老的追悼会上，黎澍、廖沫沙、傅白芦等同志还联名拍来唁电，说：“刘岳厚同志过去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勇敢斗争，永远值得人尊敬！”

一九四二年秋，国民党政府发表刘建绪主闽的任命，刘建绪跟父亲私交甚厚，对父亲素来钦佩，他当时也流露出对时局的不满。父亲便想从福建打开局面，重整旗鼓坚持抗日。于是先将骆何民、谌震等进步青年介绍去福建，自己则通过刘斐向蒋介石进言，取得去福建当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的任命。正当首途赴闽之际，不料，陈立夫突然利用《开明日报》事件，怂恿国民党中央监委常委、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福建人），作出了开除父亲国民党党籍的决定，撤销了他去福建的任命。

陈立夫这个突然袭击，对父亲的打击是沉重的。然面父亲却淡然处之。后来，陈立夫又不断地排挤父亲，父亲也毫不在意。这时，我们全家都由醴陵迁来长沙藕芽冲居住。我见他老每天读书看报之余，便去果园中修修剪剪，怡然自得。在这一阶段，陈诚正跟陈立夫兄弟在争相发展势力，极想把父亲拉过去，曾多次派人来找父亲，父亲也始终不为所动。

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虽不与反动势力为伍，但对国家前途，却密切注意。我平日喜欢翻阅父亲的东西，见他老有一公文袋，里面装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剪报资料。父亲一直在细心

分析形势，不时鄙夷地说：“蒋介石会要垮台了！会要垮台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回湘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邀父亲出任秘书长。这时，已是“三大战役”前夕，国民党处境危急。有一天，我从父亲抽屉内翻出一封刘斐给父亲的亲笔信，透露了蒋介石集团的惶恐心理，指出国民党大势已无可挽回。父亲默察形势，决定伺机劝程潜投向中共。恰好这时地下党员余志宏同志也来我家。父亲常和他在房内密谈，有时留他吃饭。同年九月，山东省会济南解放，父亲认为时机已到，便于一天夜里，在程潜官邸对他说：“如今形势已这样，湖南是否可单独跟共产党谈？”程潜未置可否。解放后，父亲谈起此事，还说：“颂公转向和平起义，受他大儿子博洪影响最大。济南解放时，我虽侧面向他提过，他还不大听。”

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促使程潜左右一部分高级官员如肖作霖、邓介松等人也倾向和平起义。为了做程潜的思想工作，地下党已把程星龄同志从台湾找回。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我家成了余志宏、马子谷、程星龄定期聚会之所。他们经常在我家吃饭。参加这一活动的还有长沙市长蒋昆和醴陵同乡唐文骢。唐早年在北平民国大学读书，和黎澍友善，曾长期掩护资助黎澍，父亲和黎澍在茶陵办《开明日报》时，他也支持。这时他在长沙复兴银行工作。他们的集会，名义上是座谈时事，实则是研究湖南各阶层的动向，筹划湖南和平起义。余志宏除参加这个集会以外，还经常单独来找父亲。如果客人来了，他便端着一杯茶，避入我房内闲聊。我因病在家疗养，一般客人是不会到我房里来的。

当父亲在秘密从事湖南和平起义活动的时候，黎澍在香港经常寄信来。有时，还寄来中共的文件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论边区土改的文章等。一九四八年底，发生了一起对湖南和平起义几乎造成严重

后果的事件，经过是这样的：

安化蓝田来了很多山东烟台联立中学的流亡学生，休息时唱延安的进步歌曲。湖南大学、一师、清华中学等校学生联合会组织了慰问团去慰问，不料代表们却被蓝田镇公所扣押。消息传来，河西学生群情激奋，纷纷结队过河，拥进省政府向程潜请愿！人数上万。程潜立于台上，学生质问，咄咄逼人，程潜甚为尴尬。为了防止学生闹事，台上两边架起了机关枪，形势十分危急。绥署主任秘书伍忠道慌忙跑来把此事告诉父亲。父亲正患感冒，发高烧，我们儿女在床前招扶。他老一听这消息，马上爬起来就走。见程潜僵持在台上，连忙走上去，请程潜暂入内休息，然后高声对台下喊道：“我是绥靖公署秘书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能够办的，一定办！”当时学生欢呼起来，学生代表立即提出五条要求：一、立刻放人。二、学生代表立即跟蓝田被押学生代表通话。三、向学生代表赔礼道歉。四、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五、枪毙蓝田镇公所所长和联立中学校长。父亲大声说：“前面四点可以照办，至于第五点，只要按法律该枪毙，当然枪毙！”父亲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欢呼起来。

第二天，程潜为了妥善地处理这一事件，还派了市警察局局长李肖白陪同父亲和学生代表一起去蓝田。风潮终于平息。事后，父亲说：“如果这次再闹一次流血惨案，事情就难办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共和谈破裂，五月，白崇禧桂军撤退至长沙，一天，白崇禧由绥署副主任唐星陪同来拜访父亲，父亲正卧病在床。白崇禧走后，父亲冷笑一声，对身旁的伍忠道说：“白健生还负隅顽抗，做划江分治的梦哩。”

六月间某天，父亲忽然坐飞机去香港。他回来后，我们才知道是程潜考虑到他和刘斐的关系，派他和程星龄去找刘斐商谈和平起义的有关重要问题。我记得，他老回家没多久，便陆

陆续续开来许多小汽车。第一个进来的，便是李默庵。父亲叫我送茶进去，只见客厅里坐满了人，都在听父亲谈香港方面的消息，气氛热烈。我只听见父亲在说：“为章（刘斐号）有一次在北平和毛泽东一同跳舞，为章边跳舞边笑着问毛泽东：润之先生，你打牌喜欢清一色吧？毛泽东笑着回答说：我只要和牌。说完哈哈大笑（意思是搞统一战线）……”接着，父亲又转述章士钊的话道：“章行严先生说，毛润之先生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人物……”正讲到这里，李默庵笑着用开玩笑的口吻对父亲说：“你这不是帮共产党宣传吧？”话未说完，满座的人都笑起来。

第二天上午，一辆军用吉普卡车开来了，原来是陈明仁。他和父亲关着门在里面谈了许久，然后带着严肃的表情匆匆而去。和平起义的活动在秘密地紧张地进行。大约在七月初的一天凌晨三时，我忽然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房里电灯大亮，一伙身着便衣的暴徒，抓着一个被打得满脸血污的人冲进来。他们见我惊醒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是来查户口的，把你吵醒了。你睡，你睡！”接着四处张望，又朝我床下看了看，就退出去了。第二天上午，我听见父亲在打电话给白崇禧控制的完警机关，问为什么派这么多人深夜到我家来搜查？对方答复仍是“查户口”；父亲笑了笑，说：“你们莫搞什么查户口、查户口啦……”就把话筒挂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谣传李明瀚来长沙了，由于他跟父亲要好，怀疑他躲在我们家里，特务便以“查户口”为名，深夜突击搜查。那满脸血污的人，是我家所在地藕芽冲的保长，特务半夜叫他起来带路，行动慢了点，被打了一巴掌，打得他口鼻喷鲜血。

有一天余志宏匆匆来到我家，刚好在门口碰见我，问我父亲在不在家。我说不。他便细声地说，“怎么搞的！陈明仁态度是不是有变化？你听你父亲说过没有？”我说：“未听

过。”他又匆匆地去了。这时，关于陈明仁的态度，外间有所猜测。我想，如果陈明仁的态度一变，和平起义就会变得困难。一念及此，竟不揣冒昧，打算写篇文章来“激励”他，便将这种想法告诉父亲。父亲一听，马上点头。随即又说，“陈明仁不会变，写写文章是可以的，但下笔要注意。”就这样，我以《我怀念傅将军》为题，撰文颂扬傅作义以人民利益为重举行起义的作法。该文同日在长沙《中央日报》、《湖南日报》、《中兴日报》上刊登了。

从我父亲的一生，可以看出：那怕象父亲这样与反动派有很深渊源、做过于人民不利的事情的人，一旦觉悟，也能择善而从，为民族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长沙文史资料》第二辑）

